

集古村思飲

印



www.duxiu.com

集古村恩仇記

集古村村史編寫組編寫

賈浩義插图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1/32 4 7/8印張 83千字

1964年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0 定價(5)0.35元

目 次

序.....	3
万恶汇集古.....田春义	5
“三閻王”和“瞎腸子”.....赵生才	13
“黑毒虫”.....赵生才 田春义	20
“朱家大院”.....田树茂	32
“娘娘庙”.....张青云	37
“人集”与“粪場”.....王毕軒	44
我家三代.....朱来金	51
我這大半輩子.....程全有	58
长工生活十六年.....赵聚才	68
工錢.....王长发	75
五亩三分地.....何根杰	82
穷妇恨.....侯云侠	88
土地改革到了我們村.....朱生福	94

枯树开红花.....	赵聚才	100
风吹不散穷汉心.....	田春义	108
打掉歪风.....	赵茂林	115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朱生福	123
穷棒子办了个王牌社.....	赵茂林	132
水的故事.....	杨永安	137
娃呀,千万不敢忘本.....	郭清仪	144
后记.....		151

序

集古村在陝西省富平縣，現在是城關公社集新大隊。提起我們村（算得上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溫泉河日夜不息地流經這裡，灌溉着河川土地，除了出產小麥、棉花、油菜，還有蓮菜（蓮藕）、大麻、水稻。春天桃花盛開，夏季荷花清香，金黃色的稻波緊跟着金黃色的麥浪，無人不知：好一個“洞天福地”！）

可是，翻開集古村的歷史看看，在吃人的舊社會，這“洞天福地”並沒有給我們窮苦人帶來半點好處，帶來的只是更多的血和淚。全村共一百三十四戶人，二千零三十畝土地，四戶地主、七戶富農，以及外地的“惡煞凶神”就霸占了一千五百三十一畝地，占百分之七十五。九十六戶貧、下中農，僅有二百五十來畝“紅坡地”、“瞎瞎田”。全村一百多畝產蓮菜的“寶地”，根本沒有窮人的份。窮人有的只是受苦、賣力、挨打、受氣。

本村的地主、偽保長勾結外地的土豪官僚，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吸干了我們的血，榨碎了我們的骨頭。全村有五十七戶給他們拉過長工，打過短工；二十三戶拉上棗杆討過飯；外出逃荒的八戶，有四戶至今生死不明；多少窮苦人被他們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那時候，也有人想到官府去告狀，但是，

官僚、老財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县里的狗官都是本村地主、伪保长的至亲好友，穷人縱有一千张状紙，哪頂人家一句話呵！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下去，有过一些反抗和斗争，但是，刀把子握在人家手里，到头来还是穷哥們吃大亏！……穷人究竟啥时候才能出头，誰来砸碎这封建势力統治的鎖鏈呢？

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一九四九年富平解放，穷苦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組織起来打倒了地主老財，土地回了老家，穷苦人成了“洞天福地”的真正主人，再也不給地主富农当牛馬了，再也不受老財官僚的欺侮和压迫了。一九五四年党又领导咱們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一九五六年以后，我們高級社被人叫“王牌社”，旧社会那种飢寒交迫、奄奄一息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公社化后，变化更大哩！实现了电气化，安装了抽水机，把塬頂上的旱地也变成了水浇田。只說今年秋季，藕丰收，麻高产，秋粮比去年增产了一倍多。看着这些丰收景象，人人充滿无比的喜悅。貧农赵聚才說得好：“想想过去，看看現在，真是两个人間！”田树茂老汉也說得好：“生活这样美气，十匹大馬把咱的心也拉不走！”

是啊，心可不能走呵！在这幸福的日子，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血和泪。忘了本，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就会变心。我們編写村史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这些“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教育后代永远記住阶级斗争，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鬧革命，坚决走社会主义的幸福大路。

中共城关公社集新大队支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万恶汇集古

田春义

我們集古村，跟着“九眼藕”一起出了名。这里的蓮菜就是特別，不管大小，都长着九个眼眼，切开来白生生地惹人爱，保存好长時間不变色，吃着又嫩又脆；用来磨藕粉，出粉格外多，算得上是咱县的特产。

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这些好处穷人哪能沾上边？集古村反倒成了“惹事生非”的地方，地主、恶霸、官僚、軍閥，真把咱們穷人害扎啦！

就从我自己的伤心事上說起吧。

一九二八年，我还不滿十八岁，就去給富农朱怀經拉长工。朱怀經看我年紀小，身体弱，別人一年工錢二十五、六元，他只給我十五元。因为他住在塬上朱家壩，当时言明一不下河担水，二不往塬上抬藕包子。上工三个月，我使用了一些工錢，这可叫朱怀經抓住了小辮子，知道我“擦不了套”，硬讓我干起了重活。夏收大忙的季节，白天我在地里、場里做了一天活，晚上回来，他还叫我成半夜地从河里向朱家壩担水。这家伙心真毒，专门做了一副大水桶。来回挑一趟水，要走三里路，担水走的是上坡路，肩膀压肿了，腰压弯了，难受的直流眼泪，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到了十冬腊月，挖开了蓮菜，他又叫我把装满蓮菜的藕包子往朱家墙抬。一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干着壮年人的活，工钱少拿将近一半！

就是这一年十五元的工钱，还要养活两日人。我和弟弟知道钱来的不容易，一个钱一滴血，过日子能省尽量省，从没糟蹋分文。这样一点点、一年年，总算积攒了几块钱，怕守不住，就置买了三分“狼不吃”的渠岸地，虽说种不成庄稼，可是有了三分地，就算有了一份家业嘛！我在这三分地里插下了二百多棵白杨树，给地主、富农干完活，有点空闲，就偷偷摸摸地捎带着把树护一护。过了几年，树长的两把多粗，两丈多高，我看着真高兴，心想：这一下，咱这穷光棍可以解点“渴”啦，指望拿它换点收入。

这时候，伪保长、外号叫“黑毒虫”的张瑞柏，看咱做活踏实，常找我给他推粪、犁地。做完活干瞪眼，不给工钱，你问他要，他就给你出鬼，说你“不务正”，让你“坐堆子”（即炮楼）巡夜放哨。咱心想，人家是保长，咱惹不起人家，还是离远些。没想到，你离他越远，他把你缠的越紧。

那是一九三七年，“黑毒虫”假装善人，介绍我给一家姓邓的掌柜的当了长工。一上工，他就跑来对我说：“叔给你办了一场事，叫叔使上三块钱。”

你看要脸不要脸？真是“阎王不怕鬼瘦”。咱怕人家出鬼，只当少挣了工钱，叫这不要脸的东西使唤了三块钱。

“黑毒虫”用了我的钱，吃上了甜头，认为咱老实好欺负，二次找上门来，说是要买蒜籽，向我“借”十块钱。我知道他的

人品，說借，实际是敲榨，“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我給他使了个計，說：“掌柜的不給。”

“黑毒虫”不肯罢手，老着脸皮跑去找到掌柜的問：“人家娃給你拉长工，为啥不給工錢？”

我根本沒問掌柜的要錢，掌柜的不知內里，被問的愣住了，忙說：“沒見春义說。”

这一下，惹恼了“黑毒虫”，气冲冲地跑來找我。我刚推毕磨子，正在洗脸，他手里拿了个棍棍子，叫着我的小名說：“居儿，快洗，我和你有两句話要說！”

我沒理他，心里也鼓了鼓劲，准备和他干一場。

“黑毒虫”見我沒有言传，沉不住气，张口罵了起来：“日你媽的，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欺哄我赫赫有名的张瑞柏、张保长呀！”动手打了我一棍子。

我沒有松火，拾起砖头向馱日的飄过去，跟着跑出了集古村。

从此，我不敢回村了，到县城周围給人家做零活。“黑毒虫”虽然給我装上了气根子，想方設計給咱出鬼，我沒回去，他抓不住，也沒有办法。

攬了几年零活，人在外，心在我那白楊树上，有时候偷偷跑回去看一看，护一护。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六是我們村的龙王庙会，趁着赶庙会的人多，我也混在里面，溜回村里，悄悄跑到地头一看，不知誰在我的树上刻了几个字：“周公甫的树。”

周公甫是县城里的大恶霸、伪保安团团長。我气得心能

从口里跳出来，狠狠地骂了一句：“谁舔他周爷的尻子咧！”

这话正被周公甫的狗腿子、“黑毒虫”他哥张培基听见了，他“咚”地往我面前一站，说：“居儿，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什么！这块地在周团长的地头，明明是周团长的！”

我说：“你凭啥说这是周公甫的地？他的地在渠南，我的地在渠北；他的地买的迟，我的地买的早，有约有据，你不能血口喷人！”

给周公甫种过地的周怀茂、朱怀春也来了，当面作证说：“周公甫的地我们很熟，东西南北，四至分明。春义的地根本不在他的地内。”

狗腿子气极了：“去，去，你们知道什么！”说完，甩着手走了。

狗腿子跑到县城里，在他周爷面前告道：“居儿这小子吃硬不吃软，不给点颜色，不死心。”

周公甫一听大怒：“世上哪有缠不小的脚！”话一落点，即吩咐左右，奔赴集古村。

周公甫带着一群伪保安团的“黄狗”，扛着长枪短枪，还背上丈量土地的竹尺，威风凛凛地进了村，气势汹汹地说：“把田春义给我叫来！”

听说周公甫叫我，知道没有好事，找出地约揣在怀里，去和他面理。一见周公甫，倒把我吓了一跳，这家伙恶煞怕人，光秃秃的脑袋，猴儿三角脸，活像神庙里的夜叉小鬼。

狗腿子狐假虎威，张口问道：“田春义，你说那块地是你的，凭啥说是你的？”



我說：“我的地是民國十九年買的。”

周公甫接了腔：“可有約嗎？”

我說：“有。”

周公甫魔爪一伸：“拿來看看！”

他手里拿着我的地約，賊眉賊眼地看過來看過去，忽然像看出了什麼麻達似地，鬼臉一吊，問道：“為什麼買地和印契的年干不一樣？”

我說：“因為沒錢，契印的遲。”

周公甫慢慢從口袋里掏出他那塊地的契約：“你把我的契約看一下，我是頭天買地，二天就印契的。”

我說：“你能辦到，我辦不到，我怎能和你相比。”

“放屁！你偽造契約！”周公甫賊眼一瞪，向“黃狗”喝令一聲：“丈地！”

狗腿子忙拉起竹尺丈量土地。他們先從南頭丈起，故意拉下一塊，我說：“你要把南邊的地丈上。”

他們早安了鬼心眼，根本不理我。這還有啥說的？明明是睜着兩眼奪地哩！

量完地，狗腿子忙向他周爺報告：“不外十畝。沒問題，居兒那地就是你的！”

周公甫像滿有理地問我：“你還有啥說的？”

我說：“你要是不長良心，誰是你的地吧！”

“好嘛，看你有多大本事！”周公甫說完，領着一群“黃狗”走了。

過了四天，狗腿子和五、六個背着槍的“黃狗”，帶着木匠，

拿着鋸子，坐兩輛大車來到我的地頭。乡亲们看見，跑來給我說：“春義，人家伐樹來了，你不擋去？”

我嘆了口氣說：“老哥，咱窮人脖子上沒舉勁，光棍不吃眼前虧，鬧不過人家，還會引起大亂子！”

在那個世道，咱窮人有啥辦法？滿肚子的委屈對誰言？我鑽在破窑里抱頭大哭，十几年的血汗，仅有的命根子，被惡狼吞掉了！

豺狼惡虎到集古村奪地，不只是這一件。早在一九三七年，就發生過一宗搶房奪地的事：我們村的地主朱懷吉，外号叫“三閻王”，和县城里的偽商會會長党耕九結拜為燒香弟兄，親熱的像一個狗肚子里養出來的。“三閻王”把剝削來的糧食，一車車運到县城里給他干哥，在集市上投機倒把；党耕九又從他的商号“大德公”里，把一包包大烟土交給他干弟，在村子里放賬賣錢。他們就這樣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大發橫財。党耕九也看上了集古村的地，想置塊地賺點甜頭。“三閻王”懂得他干哥的心意，又知道咱村里的蘇元德欠党耕九一筆賬，就給他干哥出主意說：“蘇元德欠你的錢，你把他的地和房折算了，這不兩全其美？”

蘇元德是我村的窮苦人，雖說有二亩四分地、兩眼窑洞和几間房子，一家八、九口人咋能糊住口？生活逼得沒辦法，這才搬動了“三閻王”，从党耕九的“大德公”商号借了點錢作小本生意，想着補貼點生活。誰想生意亏了本，几个月後一算賬，本加利、利滾利，欠了“大德公”整四十塊大洋，吓得蘇元德不敢見党耕九的面。冤家路窄，蘇元德偏偏碰上了党耕九。

这天，苏元德到县城去卖棒子，走到“三闾王”门口，正碰上党耕九，他想走走不了，想跑不敢跑，只好硬着头皮上去打招呼：“党先生来了！”

党耕九哼了一声，问道：“还我的钱，准备好了没有？”

苏元德提心吊胆地说：“没有。”

党耕九张口骂道：“几个月了，不还账，你想咋哩？耍白眉呀！”上去打了苏元德几耳光。

“三闾王”由屋里慢腾腾地走出来，假惺惺的对苏元德说：“元德呀，你这娃太不懂道理了，你不还钱莫要说起，为啥还要惹你党叔生气？”停了一会，才接着说：“我看，干脆把腰带勒紧，把账给人家还了。不然，就把你咧房地折价卖给你党叔。”

苏元德一听要折房、地顶债，简直是晴天一声雷，忙说：“党先生，这房和地是我全家人的命根子，要是折了账，我一家就不得活……。”

党耕九把头一转：“咋呀？舍不得？那好，还我的钱。”

“三闾王”拿出早已写好了的约据，硬逼着苏元德划了押。

就这样，苏元德的全部家业被抢走了。当天下午，党耕九和“三闾王”就逼着他腾房子。苏元德一家人哭成一团，被撵到村外一眼烂窑里。为这事，苏元德气的得了脏症，没吃没穿，哪有钱治病？到冬天就死了。跟着，他大哥和二哥也冻、饿死了。他妈一看儿子死光了，寻根绳子上了吊……

回想起我们集古村这些凄惶事情，真叫人眼泪汪汪，也真叫人咬牙切齿！在旧社会，地主、富农、恶霸、官僚，真是万恶汇集古，逼得我们多少穷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三閻王”和“瞎腸子”

赵生才

咱集古村的穷哥们，世世代代忘不了地主朱怀吉和朱德才这两个恶棍。朱怀吉小名叫三保，心毒手辣，剝削压迫穷人惨的可怕，大家替他起了个外号，叫“三閻王”。他的儿子朱德才，坑害穷人的瞎心眼比他老子还多，大家都叫他“瞎腸子”。解放前，穷人们从他家门前过，都要提心吊胆。那时的“三閻王”家，两间宽的門楼，丈几宽的大黑門，密密麻麻釘着銅錢大的黑盖釘子，一边臥一个张口大石獅，猛不防就会从門里扑出大恶狗。

在吃人的旧社会里，有錢便有势。“三閻王”凭着有錢，和县城里的伪商会会长党耕九結拜了兄弟，又和伪保长、外号叫“黑毒虫”的张瑞柏結了儿女亲家，交往的尽是一些官宦人家。遇到四时八节，“三閻王”就把这些“达官貴人”請来作客，抖抖威风。这父子俩仗势欺人，以富胁穷，逼得很多人傾家蕩产，骨肉分离。我家两代的血泪史，就是“三閻王”父子鑄成的。

一九二九年，遭了大年饑。财东家吃肉喝酒，穷人们叫苦連天。我家穷得擰繩，有几升小米，一直舍不得吃，后来实在沒得办法，为了求个活命，才把它拿出来，包成粽子，想卖了粽

子多买一点粮食糊口。粽子包好了，放到鍋里干瞪眼，沒柴烧。我們几个娃娃就去拾柴禾，我表哥年紀大，跑的快，他从垃圾堆里拣了块烂板板回来。誰知道这下闖了大祸。

原来，“三閻王”早就看上了咱咧几亩地，只恨无处下手，这一来，就找到了把柄，硬說我表哥拣的那块烂板板是他家的东西。粽子還沒煮熟，“三閻王”和他儿子“瞎腸子”如狼似虎一般，撞进了我家門坎。

“三閻王”刚进門，就沒头沒脑地罵道：“土匪！狗日的穷疯了！你把我朱家先人祠堂里的神門拿来烧了，把我先人辱沒尽了！这次非和你见个高低不可。”

我們一家人弄不清是咋回事。我二大說：“啥事嘛？咧是娃們在垃圾堆里拣的烂柴。”

“狗日的嘴犟！”不容我二大把話說完，“三閻王”奔过来，一把扯住我二大，抬手就是两耳光。“瞎腸子”跟着赶过来，父子俩把我二大捺倒地上，一頓飽打。

当时我大沒在家，我大媽一看心里急了，上前去拉“三閻王”。“三閻王”胳膊一甩，我大媽跌倒地上。我媽一旁护着我，吓得直哆嗦。

“三閻王”和“瞎腸子”不肯罢休，扯起我二大要去見狗保长“黑毒虫”。你想，“三閻王”有錢有勢，又和“黑毒虫”是儿女亲家，到了那里，穷人会有好下場？正在这时，邻居朱五长赶来拦住劝解。“三閻王”这才說：“好，不去也行，罰你六十块錢，再出一根枪。”

我二大不答应：“那块烂板板就算是你家的东西，我賠你

一块新板板就对了，你还想咋呀？”

“三閻王”硬耍白賴：“你放屁，想的怪好。你不干，走，馬上去見保长！”

“三閻王”和“瞎腸子”死扯活拉，把我二大硬扯到伪保长“黑毒虫”家里，說是我家偷了他們家族的門神，要罰錢，不給还犟嘴。

“黑毒虫”一听，馬上給亲家撑腰：“不承認？好嘛，拿馬棒来！”

朱五长也跟了来，一看狗保长要动刑，忙劝說：“算了吧，还是先罰，等他不出了再說。”

这还有啥理講？地主、官僚穿的一条褲子，穷人有啥法子？我二大只好說：“那叫我先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

“黑毒虫”放下馬棒：“限你两天時間，拿来六十块大洋，长枪一枝。”

我二大回到家里，对大家一說，家里人哭的哭，叹气的叹气，只好卖地。狗地主們一个鼻眼出气，对穷人毒的很，他們知道我家正在难处，急需用錢，就把地价压得很低。地一时卖不出去。

两天的期限到了。“三閻王”打发他儿子“瞎腸子”来逼錢。一看沒錢，就要把我二大带去他家。我二大不敢去，求他先回去，容自家想办法。

“瞎腸子”回去，不知对他老子咋样“奏”了一本。不大会儿工夫，只見“三閻王”气冲冲地来了，进門便罵：“你这穷鬼架子頂大，我叫娃叫你，为啥不来？走，到我家說理。”

我二大还是不敢去。“三閻王”和“瞎腸子”扯住我二大的衣袖楞拉，就这样拉拉扯扯地上了朱家塢。“三閻王”和“瞎腸子”二话沒說，把我二大按倒在地，一頓毒打。我二大疼得厉害，不由气上心头，咬紧牙关說：“你就是把我打死，还是个沒錢，看你今天把我咋呀！”

“三閻王”父子一听，忙取来麻繩，把我二大捆起来，綁在馬尾巴上，要上县城去打官司。

“三閻王”騎在馬上，我二大双脚被綁在馬尾巴上，身子躺在地上，被馬拖着走。我二大直痛得哭天喊地，在地上不住打滾。

家里人听說我二大被綁在馬尾巴上拖走了，忙追出来。我大鑽进小路，拚命地跑，搶到前面去，截住了馬头，求“三閻王”把人解下来說話。“三閻王”騎在馬上不答应。正在这时，“黑毒虫”的哥哥，狗腿子张培基走来了，假惺惺地求情說：“亲家，今天你看在我的面上，把这劣鬼解开，重重处罚。”

“三閻王”說：“他不受罰，这才去打官司。”

张培基扭过头来对我大說：“再限你三天，拿出六十块錢算了局，要不就吃官司。”

我大急着救人，顧不上那許多，一口应承下来。我二大被拖得渾身皮破血流，衣服撕成烂絮絮，被抬回家里。

我大只得托人說情，卖了全家的命根子——四亩八分地，賠了六十七块銀洋，才結了“案”。生活沒法过，全家人被迫鑽进北山討飯。我二大經了这事之后，气得疯疯癲癲，害了“疯”病。后来，我旺儿哥又被“三閻王”誣說成是“揭墓賊”，逼得跑

了出去，死在外头。二媽想念孩子得了“臆症”。狗地主害得我一家好苦！

“三閻王”和“瞎腸子”仗勢欺人，敲榨勒索的事情何止这一宗，受害的何止我一家！他那三院“閻罗殿”，沒有一院不是敲榨勒索盖起来的，这当中就有赵茂林祖传两院九間房的砖瓦木料。一九三一年，茂林他大欠了財主家的“閻王債”还不起，祖父、祖母紧跟着病死，沒法埋葬。“瞎腸子”計上心来，給老狗“三閻王”献了一策，要乘人之危，霸占房屋。

一天，“三閻王”吊着冬瓜脸，找着茂林他大，眨着老鼠眼，假惺惺地說：“老弟，顧人要紧，你沒办法的話，我給你用几个錢。”

茂林家出于无奈，用了“三閻王”的錢。

誰知过了几个月，地主的鉄算盘一打，算了一大摊。“三閻王”先上軟的，哄騙茂林他大說：“房是一把傘，地是刮金板，有地就不愁生活，还是先把房子卖了还債吧！”看着軟的不行，“三閻王”又搬来伪保长，带着狗腿子，耍硬手段，當場把九間房拆了。“三閻王”用这些砖瓦木料給自己盖了房，却害得赵茂林一家无处安身，逃进北山要飯吃。

夺走赵茂林家全部房屋后三年，“三閻王”又夺走了貧农周金奎老汉的全部土地。

那年春天，因无錢看病，周金奎老汉借了“三閻王”二十块錢。过了五个月，“三閻王”把周金奎老汉叫去，立逼还一百块錢的賬。周老汉吓得倒退几步，惊慌地問：“明明借的是二十块錢，怎么成了一百块？”

“三閻王”嘿嘿一笑，搬着指头算起“賬”来：“当初你借了二十元，加五利息，到第二月是三十元，第三月是四十五元，第四月是六十七元五。现在五个月已过，給你只算一百元，还便宜着你哩！这是集古村你三爷的老規矩！”

“三閻王”算完这笔剝削賬，馬上吩咐狗腿子，拉着金奎老汉在早已写好的地契上盖了手印。金奎老汉全家仅有的土地，就这样按地主們吃人的“老規矩”，落到“三閻王”手里去了。金奎老汉气得當場昏了过去。

“三閻王”和“瞎腸子”就这样明搶暗夺，发了橫財，置起家业来，成了占有一百多亩土地，三院房屋，五、六头牛馬的大財东。他把这么多的土地，有的租出去，有的雇工做。他盘剝佃户和雇工，手段同样狠，名堂也很多。租种他家上地，不仅要出租子，遇上过年过节，遇上“三閻王”家生娃、死人、娶媳妇，还得送礼。收租时，大斗进，大秤收；給长工粮时，小斗出，小秤称。长工們終年四季不得闲，稍不留神，不是挨打，便是挨罵，活重得頂不下来，年年要倒換。搬着指头算算，差不多全村的穷人都給“三閻王”做过长工和短工。就連妇女們，每到秋收大忙季节，也要給“三閻王”去剝綫麻。有一年，王彥章的婆娘給“三閻王”剝了两个月綫麻。本来說得明白，每月三块工錢，可是“三閻王”另外还有个“老規程”，每天必得剝够十八斤綫麻才准下工。月底了，王彥章的婆娘把剝的綫麻送到“三閻王”家里去領工錢，賬房里的“算賬先生”用大秤一称，整整“短少”綫麻二十五斤。“三閻王”罰了十块錢，扣过六块錢的工錢，不要說起，还給“三閻王”賠了四块“綫麻錢”。这哪里是

剝錢嘛，这不明明是剝穷人的皮么！

“三閻王”用剝削来的錢財，肥吃海喝，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九四四年得了“噎食症”死了。穷人們拍手称快。“三閻王”死了，留下了个“瞎腸子”，仍然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黑毒虫”

赵生才 田春义

提起“黑毒虫”张瑞柏这个瞎东西，集古村方圆几十里的群众，人人咬牙切齿，个个恨之入骨。在旧社会，他上通官府衙门，下串地主恶霸，和他们结成狐群狗党，称霸一方。他残害的群众无其数，他作的恶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黑毒虫”从小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念了几天书，别的没学会，敲榨勒索、写“黑呈子”的歪本事练的可精了。常常无事生非，挑起纠纷，帮助地主富农欺压农民，自己从中混水摸鱼，大发横财，是富平县有名的讼棍和“刀客”。他咧笔底下，把白的能说成黑的，不知道害了多少穷苦人，弄了多少冤枉钱！

集古村西村有个穷苦的农民，名叫罗振义。他的妻妹子嫁了一个小女婿，受尽了婆家的气，时常哭哭泣泣的。

今年春天，他的妻妹子到集古村来看他姐姐，田妹子把在婆家受的罪，向姐姐哭诉了。姐姐听了很难受，心想这样下去，不是活活把人呕死呀！不如干脆离了婚，另找个合适的婆家。姐姐听说村里的张瑞柏“呈子”写得好，输官司都能打成赢官司；她也知道“黑毒虫”不是个好东西，但为了把妹子救出

火坑，还是合計着找他写“呈子”，上县城打官司。

第二天，姐妹俩早早吃了飯，来到“黑毒虫”家里，把来意向他說了。“黑毒虫”把田妹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見她二十来岁，长得很标致，就起了歹心。停了一陣，他开言道：“这件事，我給你办。就是時間得多几天。”

姐姐忙說：“只要你能尽心，一月半載也行。”

“那就不要讓她回去了，候着打官司。”“黑毒虫”接着大吹大擂：“不管啥官司，只要搭上我姓张的手，保險能打贏。”

过了几天，“黑毒虫”带着“呈子”上了县城，找到他那群酒肉朋友，在衙門走动，結果打贏了官司，判決了离婚案。田妹子沒有錢財送礼，到张家帮“黑毒虫”的老婆做了几天針綫活，“黑毒虫”趁机糟踏了田妹子。“黑毒虫”把人推下井，还要投下石，又勾結地主惡霸，把田妹子卖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地主，八十块現洋装进了自己腰包。这个受害的年輕女人不久就呕气死了。

在一九三一年的“皮条”年饑上，“黑毒虫”当上了“怀德渠”的副渠长，多了一份权势，多了一个弄錢的門路。修渠、看水，錢是农民出，活归农民干，可是放水的时候，財东的田地浇不完，农民就不要想沾边。財东的田地又多，水勢又好，輪到农民浇地的时候，不是水小，就是沒水。“黑毒虫”不管你水大小，浇沒浇，每亩地收两块錢水費，一文不能少。財东們看他是条好“看家狗”，接着讓他当上了“惡排头”。“惡排头”，这是村里的地主、富农委派的头目，专管村里的治安，派壮丁、坐堆子(炮楼)，給地主守夜站崗。



不久，“黑毒虫”当上了伪保长。他爬的越高，给财东跑的腿越勤，对农民整的越狠，发的财也越来越大。他一家四口人，有七十来亩地，四间新瓦房，两面窑，齐齐整整的一大院子。吃的是白米细面，鸡、鱼、大肉，炕上的“炮台灯”常明，大烟瘾一天不知要过多少遍。冬天穿皮袄，夏天穿绸衫。出门行动时，挂上文明棍，戴上墨眼镜，长短枪跟上，威风得很。他过这样豪华的生活，是有成百上千个农民垫背哩！他一个发家了，村里好多农民却破产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恶棍、地痞、流氓，地方上的害，自当了“恶排头”和伪保长以后，害人的机会更多了，害人的本事也更大了。敲诈勒索，是他常用的一手。

一九三〇年前后，红军在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活动，可把村里的财东们吓扎啦！买枪，修炮楼，闹得乌烟瘴气。他们怕红军来了要“共产”，办起了“堆子”——炮楼，这些“堆子”都修在地主家里，却要穷人轮班去“坐堆子”巡夜。咱穷汉们受了多少年的剥削和欺侮，巴不得红军早点到来，谁还乐意去“坐堆子”，替财东家卖命、看家、打红军？

“黑毒虫”借这个机会敲诈勒索穷人。他规定每个“堆子”一晚四个人，谁不到，一挨打，二罚油，三罚买枪。

有一天晚上，单安发“坐堆子”来迟了一会，一进门，“黑毒虫”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捺倒，厉声问他：“你挨打还是受罚？”

单安发当时只有十五岁，一下被吓楞了，只得答应受罚五斤油。

后来，“黑毒虫”又打听到单安荣手里还有一点油水，就在他身上打主意。事有凑巧，一天，单安荣家里有事，“坐堆子”来迟了，被他搽倒就打，单安荣受痛不过，用仅有的三十五块银元买了一支“馬拐子”枪给了他。

在“坐堆子”的前后一两年里，许多人都挨过打，受过罚，罚的钱都进了他的腰包，喂饱了这条恶狗。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在富平一带征兵，又给了“黑毒虫”一个敲詐勒索的机会。村里那些财东有三兄四弟，给他塞了“黑拐”（行賄），可以一个不去；穷汉們沒有这些“能耐”，那怕你是独子，是唯一的劳力，也要被捆绑鎖拴，犯人一样的被拉走。有些被拉走后当了炮灰，留下父母妻子儿女无依靠；有的为了贖人，卖身卖地，傾家蕩产；有的为了“避丁”，逃到外乡，至今沒有下落。

富农朱先荣弟兄四个，給“黑毒虫”塞了“黑拐”，“黑毒虫”强拉田春义替富农朱先荣家当了壮丁。田春义受不了国民党军队里的折磨，逃跑回来。不久，富农朱怀經弟兄七人，給“黑毒虫”买了五亩地，要田春义頂朱怀經的名字去当壮丁。

“黑毒虫”于是派保丁去逮田春义。那天，正巧春义到三原去看他弟弟，沒有被抓走。半个月以后，春义回来了，进了村，便去找老伙伴单安荣談天。单安荣一見春义，惊叫了一声：“春义哥，怎么还不快跑？賊保长派人到处逮你咧！”

春义莫名其妙，我刚回来，为啥要抓我？再說，我是集古村人，能逃到哪里？在外边說不定还要被国民党抓壮丁。打定主意，他对安荣說：“我寻他講理去，看賊保长把我怎样！”

当天晚上，春义走进了“黑毒虫”的家里。“黑毒虫”一看春义“自投罗网”来了，嘻皮笑脸地说：“兄弟，你回来了。”顺手把水烟袋递给春义，春义没接。他又接着说：“回来了好，老哥正寻你哩。”

春义问：“啥事？”

“多时没见，想的很。来，坐一坐。”“黑毒虫”要他坐下，闲谈了一阵，才提出要他顶替朱怀经一家去当壮丁。又派人把朱怀经找来了。

春义明知道自己逃不脱，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答应了。

朱怀经还假惺惺地说：“娃你去，日后回来成个家，有我哩！”

第二天，“黑毒虫”派保丁把春义押走了。朱怀经为了报答狗保长的恩情，用一百二十元买了一条骡子给他，还送了九百斤莲菜秧子。只是苦了咱们穷人，春义一去受了四年罪，才从国民党军队里二次偷跑回来。

“黑毒虫”还借着伪保长的权势，当上了“娘娘庙”小学的理事，同“三闾王”一起霸占了校产。学校的地打的粮食，倒进了他的囤；学校的公款，他们放眼，本利一齐装进了他们的腰包。光在修理学校一项开支上，“黑毒虫”就弄了一千多块银元，他们借学校的名，自己抢了个红，把穷人整了个扎！他们还用自己的钱，借着学校的名放高利贷，把好些人整的倾家荡产。

翟北京借了学校三十六元的“闾王债”，六年翻利一百六十块，“黑毒虫”怕他还不起，不断地到翟家去逼债。翟北京他

媽受不了这种折磨，在牛槽上边吊死了。“黑毒虫”还硬把翟家的地折了一百二十元，抵了债。下欠四十元，用房子做抵押。到期还不起“閻王債”，“黑毒虫”和“三閻王”叫了一伙人，把翟家的五間大房一鍋端了。拆房的时候，掘地三尺，連一块砖、一扇門都不給留，害得翟北京一家三口当下沒有立足之地。

王昌七間大房，砖鋪地，被“黑毒虫”他們看上了，借給了六十元，几年工夫也一鍋端了，王昌半夜里气死在街道上，老婆帶上七岁的娃改嫁到湾渡村。

你以为他們拆了債戶的房盖了学校嗎？人家起意就不是这样。拆来債戶的砖瓦木料，都被他和“三閻王”二一添作五分了，連墙土也沒給留，当做肥料上了自己的地。“黑毒虫”就这样弄来了砖瓦木料。可是，盖房子的材料还不够，咋办？“黑毒虫”于是借故“罰”了单安发五棵树，又砍了王德仁的十五棵树；沒有瓦，从砖瓦匠周师那里敲来了六千块新瓦。事情的經過是这样：

周师租了一个瓦窑，請了一些临时工人，帮他烧瓦。“黑毒虫”誣說周师“招人不正”，有通“共匪”的嫌疑，派狗腿子拿着长短枪，抓了几个人，又是吊打，又是要办罪。

周师一看不得了，忙着四处求人，打圆場，自己打了酒，割了肉，到“黑毒虫”家里“送礼請罪”。

“黑毒虫”一見周师来了，把弦上的稀硬，他說：“这一向世面紧张，上头有命令，凡是来路不明的生人，一律要扣起来。这次算饒了你，以后再招闲人，你可要小心！”

周师一見狗保长开了恩，連忙称謝。

“黑毒虫”咳嗽了一声，問道：“你窑上有瓦嗎？”

周师这才看出“黑毒虫”耍的鬼把戏，心里害怕，惹不起人家，只得說：“张保长需要多少，你就来拉。”

“黑毒虫”名义上說“买”六千块瓦，实际上一文不給，白送啦！

“黑毒虫”就这样給自己盖起了一院新房。这院房的一砖一瓦，都沾滿了农民的血和泪。他一家住进了大房大厅，許多家的农民却无家可归。这就是旧社会的真相，这就是伪保长的“德政”！

“黑毒虫”对別人这样敲骨吸髓的剝削，对一家骨肉、亲哥嫂同样毒狠。他哥是个务菜的能手。有一年，务了两亩白菜，长的又大又好。“黑毒虫”讓他婆娘去偷菜，他哥說了几句，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窝，“黑毒虫”扛着一把鋤，把他哥务的白菜鏟了个一千二淨。他哥惹不起这虎狼般的兄弟，只好忍气吞声，把眼泪往肚子咽。后来他哥死了，他嫂子守着三十五亩地，五間房。“黑毒虫”看上了这份家产，把亲嫂子赶出了家园。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孤独一人住在菜园的竹庵里，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实在沒法，拄上拐杖到“黑毒虫”家里，向这个弟弟要点粮食。“黑毒虫”一顆粮食不給，还連打带罵的把亲嫂子赶出了門。老太婆連气带餓，病死在庵子里。老太婆一死，“黑毒虫”得了这份絕业，这是他早盼望着的。

“黑毒虫”家业大了，雇的工也多了，对长工、短工的剝削更狠了。他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心狠手辣的吝啬鬼，剝削雇

工，心重的像吃了石头。他常说：“干驴蹄子也要榨出四两油来。”在这上面，他说得到，做得出。他给活给的扎，饭食给你吃的瞎。你把活做的再好，他也要“鸡蛋里挑骨头”，给你找岔子，不是打骂，就是克扣工资，整得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死也要脱层皮。

“黑毒虫”雇了一个长工，名叫刘立诚，人很老实，活做得好。挖莲菜是个技术活，要靠把式。“黑毒虫”明知刘立诚挖莲菜赶不上村里几个老把式，那年腊月二十六日一早，“黑毒虫”把刘立诚和几个老把式叫到一起，要他们分片挖莲菜，各挖各的，不准弄乱。

大伙摸不清“黑毒虫”耍的什么花招，只得照办。

收工的时候，“黑毒虫”叫狗腿子把每个人挖的莲菜分别过称，结果刘立诚挖的莲菜比老把式们少二十来斤。

“黑毒虫”鬼眼一瞪：“咋少了二十多斤？走，回去再说。”

刘立诚胆战心惊地跟在后边，回到“黑毒虫”家里。

“黑毒虫”一进门，抄起马棒楞打刘立诚，骂着问：“你偷下莲菜给谁啦？”

这才是天大的冤枉！地里那么多人挖莲菜，监工的狗腿子一天没离身边，咋能偷走莲菜？刘立诚有理说不出口。

“黑毒虫”一边打骂，一边逼他说：“你偷下莲菜给了王老顺，你还不敢说！”

原来，王老顺家的白莲菜今年长得好，“黑毒虫”红了眼，才想出整治长工的办法，把脏栽到王老顺头上，好敲竹杠。立诚受刑不过，屈打成招。

“黑毒虫”馬上派了保丁，深更半夜把王老順从被窝里拖出来，拉到了“黑毒虫”家里。

一照面，“黑毒虫”破口大罵王老順：“你这賊娃子，这几年偷了我多少蓮菜？”

王老順沒偷他的蓮菜，自然不認賬。

“黑毒虫”一声喊，狗腿子拥上去，把王老順一頓飽打。接着叫立誠对質。

立誠万般无奈，才說：“人家硬叫我說，我把蓮菜給了你啦。”

赶来护威的“三閻王”，一旁連忙接上腔：“老順，立誠都証實了，你还不承認，寻着挨打哩！”轉过身去，又对“黑毒虫”說：“算了吧，罰他三百斤白蓮菜。”

长工刘立誠白白挨了一頓打，王老順挨了打，还貼了三百斤蓮菜。村里的穷汉們背后給“黑毒虫”編了兩句話，唱道：“餓死餓活，千万不要給‘黑毒虫’做活。”穷汉們給他家做活，不是干滿一年坚决不干了，便是半路偷跑了。

“黑毒虫”雇不上长工，便使出了保长的权势来。他看上了那个，就放出話来要拉他的壮丁，你怕拉壮丁，就得給他做活。

一九四四年上，单安財給他做活，年底时，右胳膊出了个疮，不能动弹，在家里歇息着。“黑毒虫”叫婆娘来叫单安財上工挖蓮菜。

单安財苦苦哀求說：“你看我病重成这样，还能去挖蓮菜？”

你猜“黑毒虫”婆娘咋說？她气势汹汹地說：“我拿錢雇

人，你死也要死在我藕田里！”

人家財大气粗，那管你穷人的死活？单安財处于无奈，只得白白掏了三十块钱，雇了一个“頂工”，給“黑毒虫”下田干活。

有一年，“黑毒虫”看上了王金崗，要他挖蓮菜。王金崗不願意干，“黑毒虫”把話說的很硬：“咱咧是干錢現票子！（意思是开現錢。）”王金崗惹不起伪保长，只好答应了。

王金崗一連挖了五天，眼看快要完工了。下午，“黑毒虫”来到地里，四处看了看，說了句：“你把我的蓮菜小叶踩完了！”王金崗一听話里有話，吓得工錢也不要了，再也不敢露面。

第六天吃早飯的时候，“黑毒虫”赶来了。一見王金崗就罵：“你咋不見了！你把我五、六亩蓮菜給踏的不成样子，糟踏人哩！”拉住棍子就打。

王金崗一看事情不好，撒腿就往外跑。

“黑毒虫”掏出二十响盒子枪，吼道：“你跑，我非把你送終了不可！”

王金崗吓得不敢跑了，被“黑毒虫”拉到家里，又是拳打，又是脚踢。

狗腿子一旁对王金崗說：“你太不像話了，把保长的蓮菜踩坏，叫人日子咋过呀！干脆賠上三百斤蓮菜。”

“黑毒虫”还假装不願意，糾纏了半天，才算“勉强”答应了。

王金崗干了五天活，分文工錢沒領到，挨了打，还貼了三百斤蓮菜。

“黑毒虫”剝削雇工，还有一个窍门。本来应当雇两个长工，他只雇一个，这一个有时还是童工。这样，他就可以少出錢。只一个长工，活路做不完咋办？天天叫短工。你以为他是用錢叫短工嗎？不，白拉差！每天下午，他大烟癮过足了，端上水烟袋，蹲在門前槐树底下，看是那个农民下地回来了，老远喊道：“来来，在大叔这里抽袋烟！”你一来就把你套上了。“大叔明天活忙的很，你給咱帮个忙。”你給他干完活，他“白吃枣还嫌核大”，說你这里沒做好，那里沒做好，还要把你套到明天，他說：“这活做的很不过眼，明天再来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又明天，沒个完，誰要是拒絕不做，答应得慢騰一些，不出几天，他就要想法子治你。全村的穷汉差不多都給咧白干过活。后来人們宁肯多弯些路，也不願从他門前走，把那里叫做“閻王坡”。穷汉們都說他将来不得好死！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罪大惡极的“黑毒虫”眼看大势已去，連吓带病的死了。群众都說：“死了一祸害，只可惜太便宜了他。”

“朱家大院”

田树茂

“集古有个朱家院，祖祖辈辈手遮天，如今阴魂还不散，怀着鬼胎想夺权。”这是社员们给“朱家大院”地主编的顺口溜。提起这家地主，年轻人摸不着他们的底细，不留神还会上当。我今年五十八岁，旧社会就是在“朱家大院”当牛做马过来的。我一家三代，侍候过他家两代人。他家的根根梢梢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朱家大院”是官宦世家，靠当官时贪污、敲榨发家。他家祖辈在岐山县作官时，运回来的银子，白花花地满箱满柜。以后看中了集古村的好地方，好风光，便买地盖房，置起了家业。他一家霸占的地盘大得怕人，光住的地方，就有正屋，有偏院，有書斋，有客厅，有馬房，还有花园。庄头修起了几丈高的炮楼子，派民伕给他家守更巡夜。这个庄院占去了朱家壩近半个村子，穷人都叫这一摆子为“朱家大院”。

我在二十八岁那年，进了“朱家大院”的高门楼，给人家拉长工。那时候，朱家的祖业已经传给“立”字辈。“立”字辈弟兄三个：老大立志，外号“卡球算”，敲榨勒索穷人有一手好本事；老二立中，外号“笑面虎”，是个笑里藏刀的恶鬼；老三立

誠，外号“三桃桃”，是鞭打繩拴穷人的残火手。这弟兄三个，剝削穷人的味道，我都尝过。

在“卡球算”家里，我当了五年伙計。他家的活重鞭子硬，我当时虽不到三十年紀，仅只五年時間，就累成駝背。你想嘛，他家一百多亩地，“卡球算”以“伙种”的名义叫我种了七十三亩。在他家，样样活儿都得干，天不明起来，給他家水缸里挑滿了水，背着日头上地，頂着月亮回家，半夜三更，还得喂牲口，連他家磨面也是咱的事。一个人怎能顧得过来呢？我大和我媽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累得不成样子，便帶着我弟弟和两个妹妹，都住进了他家的馬房。全家人吃的自家飯，干的他家活。干活的人多了，派的差事也重也多了，就連送他家的少爷公子上学堂，也是我弟弟的差事。我父亲每天还得跑到县城上，給他的亲戚家里挑水磨面。

一年到头，“卡球算”的算盘珠儿一响，想方設法，总得給你出个鬼主意，扣掉你的工錢和粮食。原来說的明明白白的，他家出地我出力，打下粮食对半分。但“卡球算”的門道真多，头一年，他硬說与我伙种的沒有七十三亩地，河川里的五亩水地，塬上的二亩場地，是替他家捎种的，不分給我粮食。世上哪有这号道理，雇工就雇工，伙种就伙种嘛！他偏偏要以“伙种”的名义，再“捎种”他的地来勒索你。有啥办法，天下是人家的，人家說出的就是“理”，这口气不咽也得咽。

第二年，我怕他再和我耍賴皮，想了个办法，找了三个“中見人”，刷了一张約，双方押了指印，心想这一下看他还有啥說的。嘿！鬼名堂真不少。粮食一上場，“卡球算”头戴瓜皮帽，

手拿“要命賬”，夾着“鉄杆算盤”來了。他說：“我替你納官糧，糧食先得分給我。”沒防備又來了這一着，他盤子珠兒劈哩啪拉一撥，什麼“皇倉糧”啦，“募捐糧”啦，“壯丁糧”啦，……連編帶捏，名堂說了一串串，糧食算了一大攤，三下五除二，白白的扣走了五石糧。趕到種麥時，我分的糧食早光了，連種子也沒有了。咋辦？只得又向他借。從他園里剛要裝麥，他眨巴着眼，偏着腦袋說：“田相，這糧食來得可不容易，利息得按駝打滾算。”這真是嘔死人的話呀！有什麼辦法呢？借一斗還三斗，一料麥種的把賬欠下了。就是這樣，一年又一年，盤剝得我家年年不夠吃，我家六口全變成他的伙計，一直干了十來年，後來連我家住的馬房，“卡球算”也要算房錢。

我媽得了心病，吃不下飯。晚上翻來復去睡不着覺，白天還要照常給朱家干活，疾病、勞累、憂愁、凍餓加在一起，不久就死了。跟着我大得了“瘋”病，半身癱瘓，死在地主的馬房里。沒有棺板，沒有孝衣，我去尋“卡球算”給這長工想點辦法。白天找了一天沒頂事，晚上我在他家苦苦哀求，終究連一頁蘆席也沒要下。在窮哥兒們的周濟下，才算葬埋了父親。

在“卡球算”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這時我弟弟也大了，弟兄二人離了“卡球算”的門，進了“三桃桃”家當長工。

給“三桃桃”家拉長工，遭遇也同給“卡球算”伙種地一樣悲慘。“三桃桃”有大婦小妾陪着在上房吃飯，頓頓白米細面，雞羊烤肉。晚上半夜不睡覺，不是耍賭，便是抽大煙。當長工的要侍候到半夜，稍一不周到，他便駝臉一吊，動不動就打罵一頓。論他的勒索手段，和“卡球算”差不離，伙計吃飯限制

很严，用一寸半高的小茶盃按的小黑饅，一頓只准吃四个，多吃半个也不行。我的同伙赵聚才，年紀小，一次餓得实在沒法了，在厨房拿吃了半块黑饅，这下算闖了大祸，“三桃桃”狠狠的拳打脚踢了一頓还不算，到年底把工錢全扣了。“三桃桃”还講了句“人情話”：“算是白养了你这个穷光蛋。”他这样勒索穷人，誰能和他講清道理呢？記得有一次，罗拴牢他媽跟“三桃桃”家的吵了架，“三桃桃”便想出瞎主意，把拴牢他大叫到“娘娘庙”，又是罰又是打，气得拴牢他媽寻到“三桃桃”門口，在自己脖子上抹了一刀子。状子告到县衙門；县长老爷的小老婆，是“三桃桃”女儿的好朋友，“三桃桃”只递了一句話，官司就結了局。官僚、地主是一个鼻孔出气，哪里是穷人申冤的地方？

“三桃桃”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想想落不下好結果，不敢給他做活了，我又到“笑面虎”家去拉长工。做了一年，工錢被三折六扣扣光了，过年时还借了人家一斗麦，一块錢，凄凄惶惶过了个年。“閻王債”越滾越多，年年还，年年还不清，只得忍痛卖了两个亲妹妹，才算还了賬。丢下我老俩口和女儿，仍住在“朱家大院”馬房里。誰料想，“笑面虎”一家，嫌我年老力衰，覺得沒有油水可榨了，便撵我們出馬房。下午下了“撵断令”，当晚就得連“窩”搬。咱沒有一根椽，沒有半片瓦，往哪里去呢？我千求万告，也等不到第二天，緩走一步便要朝出扔鋪盖。到底还是穷人知心，幸亏咱現在咧支書赵茂林他媽，把我一家收留在他家的破窑里，度过了苦日子。盼星星，盼月亮，一直盼到了解放。

解放以后，鬧土改，搞合作化，办人民公社，路越走越寬，集体的家业越来越富足，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了这样的日子，誰个心里不高兴。現在，十匹大馬也把咱的心拉不走。

誰知道，前几年，“朱家大院”从外边回来个歪人，小名叫銀鎖，大名叫朱允臣。这家伙在解放前十多年，脚不沾家，別人也摸不清他是干啥的。他一回来，耀武揚威，歪的厉害，带着黑墨眼鏡，拄着文明棍，动不动就是“崽娃子长，崽娃子短”的乱罵人，挑拨党群关系，破坏集体經濟，誰要是回敬他几句，他便把胸膛一拍，說什么他是在外面干了“大事”的，大吹大擂，来吓唬人。

呸！誰相信那一套，咱清楚他的底細。“朱家大院”传到了“允”字輩，出了五只恶虎，压迫剝削咱穷人的本事，比“立”字輩的还歪，朱允臣就是恶虎之一。他在反动派的警察局里干过事，还跟他姐夫边益藩打过咱游击队。解放后，跑到外面胡混了一下，藏了狐狸尾巴，咋能哄得了人。他以为解放多年了，人們把他家祖祖輩輩作恶的事都忘了！不，这是做梦。我們忘不了，毛主席的政策把咱武装起来了，經過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貧、下中农的火眼金睛，把敌人的阴谋詭計一件一件都識破了，他是想“二返长安”哩！只要有我田树茂在，“朱家大院”作的恶事，咱穷人受的凄惶就要一代传一代，讓大人小孩都擦亮眼睛，你“朱家大院”甭想阴魂不散，兴风作浪！

“娘 娘 庙”

张 青 云

在温泉河的北岸，集古村的当间，有一座高疙瘩，塬顶上盖着高大的砖瓦房子，四周围着土墙。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全集古村、温泉河与两岸的蔬菜地。这就是“娘娘庙”。庙不甚大，名气不小。每年都有很多人到庙里来“烧香献供”，为的是“求娘娘保佑平安”。但是，多少年来，这尊“娘娘”给穷人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血泪，是苦难。“娘娘庙”的前后大殿变成了地主恶霸横行的阎罗殿，雕梁变成了“吊梁”，压檐石变成了“压人石”，神棍变成了刑具。“娘娘庙”是咱集古村穷人受苦受难受折磨的见证。

二十多年前，我和娃他大，带着儿子根长，逃难来到集古村，无处安身，村里的穷苦人王长发念我一家可怜，让我们搬到他家里住。王长发家在“娘娘庙”后边，挨着富农翟经信的家。我一家白天出外讨饭，晚上回到破窑里住。富农翟经信嫌我一家住在他家旁边太丢人，看见长发妈就骂：“你这死老婆，为啥把咧客客子招在你屋里，害人哩！早些叫咧滚。你还想寻咧的哈利呀！”见了根长他大就说：“叫你咧娃走远点，再到我门上来，和我娃耍，看把我辱没了！”我一家被富农逼得没

办法，只好离开了长发家，住到“娘娘庙”前边的“老爷庙”里。解放前多年，我围着“娘娘庙”转，对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有的看在眼里，有的听在耳里，这些我都记在了心里。

一九三二年，村子里遭瘟疫——“虎烈拉”（霍乱），得了这种病，上吐下泻，不一阵就要了命。“三闾王”的老婆病死了。这个地主婆子，早上得疫病，下午就死了，人死的快，来不及准备后事，可财东家顾体面，讲究大，找来阴阳先生“看风水”，说是“时辰不好”，不能埋，“三闾王”就把他的死老婆寄葬在村北塄畔上，要选个“皇道吉日”，大办丧事。第二年，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三闾王”要大办丧事，又舍不得自己拿钱，一时没有主意。正巧塄畔上的窑顶塌下来，把“三闾王”老婆的棺材砸坏一个角。“三闾王”趁机扬言，说他老婆的棺材叫人揭了，要拿住“揭墓贼”，到“娘娘庙”里去惩罚。是谁揭的呢，他在这伙穷人身上打主意。一天清早，“三闾王”带着“瞎肠子”儿子朱德才，到贫农王老五家里，硬说这个忠厚老实的穷苦人是“揭墓贼”。一边拉，一边打，要拉到“娘娘庙”里去审问。刚拉到地主“三桃桃”家的大门口，猛不防一条恶狗扑出来，把“三闾王”的腿咬了一口，他手一松，王老五撒腿跑脱了。从此流落在外，一直不敢回来。

没有抓住人，“三闾王”岂肯罢休，便又血口喷人，硬说是贫农朱五金和赵旺儿揭了棺材盖。其实，“三闾王”早就看上了赵家的二亩四分蔬菜地，乘机把“脏”栽到赵旺儿头上。朱五金得到消息，吓得逃跑了，至今没有音信。赵旺儿闷在鼓里不知道，从地里浇水回来，刚走到伪保长“黑毒虫”家门口，被

“三閻王”一把抓住，連拖帶拉，扭进了“黑毒虫”家里。

旺儿家里的人听说这件事，他三大赶去找“三閻王”，刚走进“黑毒虫”家里，沒等老人家张口，“三閻王”不問青紅皂白，順手从地上拿起一根硬木柴，狠勁打在三老汉的胳膊上。木柴上的刺扎进胳膊腕子，有一寸多深，鮮血直冒，痛的三老汉头上汗珠直淌，臉变得蜡黄，昏昏迷迷不省人事。

三老汉被抬回家里，旺儿他三媽一看事情鬧大了，惹不起人家，又不知旺儿犯了啥“罪”，忙和旺儿媽計議，想着到县城去找人說情。誰知事情已經迟了，“三閻王”早搬动了他的干哥、伪商会会长党耕九这群恶狼。聚在“黑毒虫”家里商議怎样办理旺儿：是送县受刑，还是折地賠錢？

这时候，旺儿被狗腿子們綁到了“娘娘庙”里，凤凰单展翅地吊起来，脊背上压了块百十斤重的条石。狗腿子手里拿着藤条、皮鞭，打得旺儿皮开肉綻，哭喊連天。

旺儿全家急得沒了主意。旺儿媽一会儿跑回家里，一会儿跑到“娘娘庙”前，一会儿又跑到“黑毒虫”家門口；回到家里惦着娃，跑到“娘娘庙”前不敢进去看娃，更不敢到伪保长家里去講理。她就像失去了魂一样，跑来跑去，东轉西轉。旺儿三媽跪在“黑毒虫”家的窑背上，叫爷叫婆地对天呼喊：“天哪！娃犯了啥罪，遭这毒手。好我的保长老爷哩，饒饒命吧！”

狗腿子拷打的皮鞭声，旺儿的哭叫声，像鋼針一样，刺在两个老人的心上。全村的穷苦人看着旺儿全家的凄惶，听到哭喊声，哪个不抹鼻子掉泪，气得渾身发抖！

旺儿媽哭了好长时间，伪商会会长党耕九才出来放了个

狗屁：“真偷还是假偷，神会审出来的。”

呸！这不明明是地主豪绅扭在一起审问穷苦人吗？狗腿子从早上一直打到日头偏西，旺儿疼痛难忍，屈打成招。等到抬回来，浑身被血糊了，三天不省人事。后来，家里只得卖了仅有的二亩四分蔬菜地，折了二百四十块白洋。“三阎王”拿上这笔款，杀猪宰羊摆席面，吹吹打打地埋葬了他老婆，还在“娘娘庙”里还了愿，感谢“神”给他“审”明了案子。

狗地主怕旺儿反抗，又出了“斩草除根”的毒计，三天两头来赵家寻麻达。吓得旺儿伤还未好，就在一个黑洞洞的夜里，偷偷溜出村子，鑽了北山，后来死在外头。那一年，这娃只有二十四岁，娶了媳妇刚一年。

在“娘娘庙”里，不知有多少无罪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多少人被绑在“神”前，下跪受罚；多少人被逼得妻离子散，亡命在外。扳指头算算：赵明儿被吊在大梁上，背了块压檐石，拷打了半夜，打昏过去又用冷水泼醒；王炳仁跪过青石板，逼跑在外，至今无音信；罗拴牢他妈，被罚了几桶油，逼得没法，寻短见，在自己脖子上抹了一刀子；王德胜被吊在梁上，几乎断了气；我娃他大还被捆过一绳子哩，害得我一家好苦。

地主、恶霸为啥这样克苦穷人呢？还不是为了那伙吃人的恶鬼发横财吗？我记得清清的，西村单安发的外甥，是个八、九岁的孩子，自己家里没有田地，有一次路过“三阎王”的地边，看见这一大片、一大片的麦子，多么心爱呀，就掐了几个麦穗，走着耍着。谁知道这下闯下了大祸，“三阎王”把单安发

叫到“娘娘庙”，不問三七二十一，吊在梁上用枣条打了一頓，放下来又要罰他一石麦。一个穷苦人，咋經得住这样整治呢？娃他大明知是地主老財耍歪，可是那个社会里，胳膊拗不过大腿。娃被打死了，自己又碰死碰活的，全村人看着都哭了。但“三閻王”还接二連三地派人来要那一石麦。你看寒心不寒心。

那时候，咱穷人沒指望，心里光有个“神”，靠“神”消灾免难。我一听到“娘娘庙”里“大呀，媽呀”地喊叫，就心惊胆顫，赶快跪到“菩薩”面前祈禱。有时，皮鞭、木棍响半夜，咱膝盖一刻也不敢离“菩薩”面前的蒲团。祈禱有啥用？咱穷人越信“神”，人家地主恶霸越仗着“神”来欺侮你。

“娘娘庙”的名字越听越害怕。我村穷人有句口歌：“宁願繞路河边走，不願經過‘娘娘庙’。”本地的凶神，外路的恶煞把个集古村的庙前庙后，直霸得路断人稀。伪保长“黑毒虫”还专门在庙边替伪县保安团团长、大恶霸周公甫务了个葡萄园。周公甫一来，在庙台上一站，看一看温泉河川的景色，到葡萄架下乘凉玩景。这时，滿河川干活的人，都看着庙，站得远远地咒罵。

咱穷人也不会甘心地乖乖受欺压。說起来，咱支書赵茂林是个好样的。

那时候，茂林在“三閻王”家当长工。一天突然下起暴雨，“三閻王”家院子里的水眼被烂泥堵住了，水流不出去，越积越多。“三閻王”怕雨水冲进地窖里，忙叫茂林去挖通水路。

茂林頂着暴雨，站在泥水里挖了半夜，水路还没有挖通，

他的腿痛病又犯了，肿得像碗口粗，回到家里，痛得喊大喊妈。第二天看看雨停了，腿痛得站不稳身子，就没有再去挖水眼。不料，晚上又下起大雨，雨水冲进地窖，淹湿了“三闖王”藏在那里的麦子。

第二天一大早，“三闖王”发现了，直着嗓子喊茂林，不见人影。

“三闖王”发火了，一蹦三尺高，赶到茂林家里，不问三七二十一，脱下鞋，用鞋底在茂林头上不住点地摔打，还硬扯着茂林的衣襟，要上“娘娘庙”。

上“娘娘庙”？茂林知道不会有好下场。心想：不去要挨打，去了要受罪，豁出这一吊子，和他拚了。接着，一拳头便把威风凛凛的“三闖王”打到门口的沟道里去了。茂林也顾不得腿上的疮疼，跟着跳下去，膝盖顶住“三闖王”的大肚子，没调合的“疙瘩子”，让“三闖王”吃了个饱。

“三闖王”躺在沟道里，哼哼唧唧地说：“走着看！”

茂林也对了一句：“咱就走着看。”

“三闖王”连忙跑去搬动伪保长“黑毒虫”，要把茂林弄到“娘娘庙”上刑。

过了一天，茂林家的门突然被一群人踹开了。茂林一看，只见七、八个狗腿子，手里搬动枪机“卡吧卡吧”响，走了进来，不容分说，把茂林带到了“黑毒虫”家里。

茂林眼看自己要被带到“娘娘庙”受刑。忽然心生一计，想起前几天“黑毒虫”找“三闖王”借麦子，“三闖王”把麦子藏在地窖里，却告诉“黑毒虫”家里没有麦子，不肯借给他。茂林

于是对“黑毒虫”說，“三閻王”打他是因为地窖里藏的麦子被水淹了。

“黑毒虫”一听有了气，觉得“三閻王”不講情面，不够朋友，就沒有把茂林送到“娘娘庙”去。不一会儿，“三閻王”来了，“黑毒虫”也給了他个不客气，說：“茂林有理。我已問过，不是他打你，是你打他，他跑，你赶，地上太滑，你自己跌到沟里的。”

“三閻王”不服“黑毒虫”的“裁判”，扭身走了。

茂林这样才免了一场苦难。此后，茂林随身帶了一把龟头刀，准备应付意外。“三閻王”一看茂林要豁着命干，拿他也无从下手。这一来，給咱穷人出了一口气，长了一下胆。穷人們一提起这件事，忍不住捂着嘴笑。

“人集”与“粪场”

王 平 軒

如今，走进集古村的西头，你会看到一院一院的新房，一座一座的新窑，排列得整整齐齐，收拾得干干净净。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以来，这里盖起二十三间新瓦房，打成五间新窑，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喇叭里不断传出嘹亮的歌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可是，这样一个幸福新村，解放以前，却是破破烂烂的“穷汉窑”。十三户人家，就有十一户给财东家拉长工；六十多口人，除过娃们以外，人人都卖过短工。住的地方，除了几间破房以外，全是烂窑洞。那窑洞，高粱秆做门，垒几页“胡基”（土坯）就是窗，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提起房子，没有一家不开“天窗”，抬头就能看见星星和月亮；下雨天更是遭殃，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抬脚就是水，院子里满是烂泥。因为这里的人是靠卖工度日的，这里积的粪也被财东们夺走上了地。地主恶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们就把西村叫做“人集”和“粪场”。

回想起那些黑暗的日子，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村里的财东们就出现在我们窑顶上，尖起鬼嗓子喊叫：“喂！明天

誰給我家做活哩！喂飽飯還給工錢，大人三毛，女人二毛，小孩一毛！”聽到這些吸血鬼的吆喝，我們窮人都氣得肚子疼。可是氣也沒用！那時，我們西村十三戶就有十一戶是從外地逃難一担一担挑來的，地無一壠，房無一間，兩個肩膀抬着一張嘴，開口要吃飯呀！莫奈何，忍氣吞聲，給財東家去干活。

要干活也不一定有活干，財東家還要挑挑揀揀。男人去干活，嫌你吃得多；女人去干活，嫌你慢騰騰；孩子去干活，嫌你沒力氣。真難侍候！財東家用人，咋樣有利咋樣來，彎道多着哩！高懷殿老漢就是他們害死的！

貧農老漢高懷殿，挖蓮菜是好把式。春、夏、秋三季，財東們都不要他干活，嫌他年老體弱，手脚遲鈍，榨不出多少“油水”來。老漢只得拖個棍棍，到處要飯吃。一到冬季，蓮菜賣的價大，出手快，為了嫌大錢，黑心的財東們都搶着叫老漢去挖蓮菜。

一九三三年臘月的一天，偽保安團團長、大惡霸周公甫的狗腿子張培基，懷里抱着小火爐，腳上穿着厚毡靴，縮着脖子來到懷殿老漢住的爛窩里，開口叫了聲“老頭子”，嘿嘿笑着說：“今天可要出差了，周團長有令：趕年前把地里的蓮菜挖完，全部上市。”

■ 害外地凍天寒，西北風直吼。老漢蹲在地上，悶著頭不出聲。

狗腿子見老漢不言傳，狠狠地說：“怎麼樣？窮小子還怕天氣冷？你不去，得罪了周團長，你可受不了！”

老漢沒辦法，憋着一肚子惡氣，穿着爛衣裳，抗起鐵鏟，浪

里浪当地走到蓬菜地。数九寒天，藕田冻起寸把厚的冰，狗腿子逼着老汉把冰打破，挽起裤腿，赤脚下田，一双脚冻得像红萝卜一样，被冰槎子划得一条条血口子。老汉站在冰冻的稀泥巴里挖蓬菜，从腊月十二干到腊月二十八，狗腿子不讓下工，老汉又冻又餓，栽倒在藕田里。乡亲们看見了，忙把老汉抬回村子。

高怀殿老汉受了一辈子苦，还是个单身汉，没有一个亲人。穷乡亲们說：“这些恶狼把穷人害成这步田地，老汉无依无靠，咱們穷弟兄們不能不管呀！”大伙把老汉安置在烂窑里，貧农单安財守在老汉身边照顧；单安吉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錢給老汉請医生、买葯；田春义穷得沒个啥，心里过不去，就烧些开水送去；我媽給老汉收拾窑洞，清洗屎尿。

穷弟兄忙了大半天，还是沒有救活老汉。老汉死的那晚上，村里的穷人們抱头大哭，都說：“老汉苦熬了一辈子，临死落了个冻死鬼！”穷弟兄們在塬上挖土筑坟，埋了老汉。

狗腿子听說老汉死了，連忙去給“上司”报告。周公甫靠在太师椅上，像沒那回事一样，連动都不动，白眼一瞪，狗嘴里吐出一句話：“死就死了，用不着大惊小怪。到‘人集’上再去叫一个！”

在財东眼里，穷人就不算人嘛！

我这穷骨头，和千千万万的穷人一样，也是从血水里捞出来的。我一家三代三口人，在旧社会的地獄里，死的死，逃的逃。我大和我大哥被餓死了。我二哥給地主“三閻王”拉长工，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給他家担水、喂牲口，虽說住在一个

村里，一年四季不得回家。天长日久，我二嫂得了疯病，被流氓拐走了。我二哥知道后，一下子气成了疯子，流落在外，沿門乞討，走在那里就在那里歇。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二哥討飯到了庄里鎮，就睡在城西北的一座庙台上，半夜被狼咬掉了两条腿，活活被疼死了。庄里鎮的乡亲们看見，找了个烂席卷起来，埋在了乱杂坟里。我听到这件事，一口气跑到庄里鎮，結果連我二哥一根骨头都沒有找見！三哥討飯，流落外乡，被拉了壮丁，至今沒有音信。咱怕丢了飯碗，給財东家楞干，人家还怕咱偷懶，跟在后面一个劲地催：“早晨趁凉赶紧干，中午晒草莫怠慢，下午溜坡日头搶時間。”根本不讓你有个喘息時間。逼得多少穷人累死在这些恶狼手里。全村就有三戶这样絕了“香烟”，兩戶逃亡在外，八个人被活活累死。

这些吸血鬼剝削了你的劳力还不够，連咱西村群众年年积攢的粪土，也逼得你非“卖”給他不可。俗話說：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时候，我們全村穷人还守着八十多亩烂地哩！粪土被他們搶去了，哪能打下粮食。更气人的是，咱穷人的房屋，也被当成粪土夺去。

貧农高連丰老汉，糊不住口，借了“三閻王”三块钱的“閻王債”，度过了年关。刚过了年，“三閻王”就催着还債，知道老汉还不起，便在他的房子上打主意。

一天，“三閻王”討債来到門里，非要馬上“刀下見菜”不可。老汉被逼急了，順口說道：“我別的沒啥，就这两間房子，要卖也沒人要！”

“三閻王”一听，正中他的心意，忙說：“卖不了房，不会把

房拆了卖粪？要是卖粪，我就给你讨个主，咋样？”不等高连丰老汉答话，他又接着说：“好，我就给你叫人说话。”

“三閻王”离开高家，拐弯进了隔壁王彦章家里，嘻皮笑脸地给王彦章塞了两个大烟棒子，硬要王彦章去给他说话。结果，“三閻王”用五斗麦，加上欠他的三块钱，就算“买”下了老汉的两间房。

第二天，“三閻王”用三角钱雇了两个短工，拆掉了两间房子，弄走了瓦和土粪，逼得高连丰老汉一家没处安身。

财东家看我们西村穷，地方烂，还把死娃子、烂狗往我们的窑背上埋。如今安装电磨子的那个地方，就是过去扔死娃子的地方。夏天，满地是绿头苍蝇，臭气难闻。简直是有意糟踏我们穷人。

咱人穷有血性，人穷骨头硬，决不甘心受欺侮。有一次，“三閻王”到西村来叫短工，他仗着财势，出口伤人，说这个太瘦，那个太弱，这个值三角，那个值一毛。把咱穷人当货架子上的货物，翻来倒去的挑拣。穷哥们都火了，别当咱们是好欺负的，咱死娃不怕狼啃，一下子围了上来，狠狠地捶了他一顿。“三閻王”被打得“大呀，妈呀”蛮叫唤，乖乖地夹起尾巴跑了。他家里的人见他满身泥土，一走一拐，问他咋的，他撒谎说：“不小心从岩上掉下去，摔成这样的。”穷人们知道了，高兴的捂着嘴笑。“三閻王”挨了打以后，总想找岔子报复，咱抱着“拚着一条命，敢把皇上拉下马”的主意跟他干，可是，权在人家手里，枪把子在人家手里，到头吃亏遭殃的还是咱们穷人。



貧农单安荣有一亩八分地，在澗水渠边。那年大旱，安荣把渠水引上来浇地。“三閻王”是渠长，看見了硬不讓浇。他对安荣說：“你咧地沒有福，浇不成。”

安荣說：“这么大的年饑，水从地边过，救救穷人吧。”

好說坏說，“三閻王”都不答应，还說：“哪怕水白流，你都浇不成！”

“你能活，我也要活。你吃了人的肉，还想喝人的血！”

安荣和“三閻王”頂了起来。“三閻王”动手要打安荣，只見村里来了許多穷人“救駕”，他觉着不对头，溜跑了。

大伙对安荣說：“浇，管他。再来把驴日的收拾了！”

“三閻王”轉回村里，找到“黑毒虫”、伪保长张瑞柏奏了一本，要暗害安荣。“黑毒虫”說：“咱这里最近社会治安混乱，叫安荣給保里买一枝枪！”

伪保长的命令发布下来，穷乡亲们紛紛議論說：“咧是官报私仇哩！”

有人劝安荣：“咱惹不下人家，还是給‘三閻王’回个話，就可以不买枪了。”

安荣是条硬汉，他說：“脫褲子当袄，买一枝枪，都不給‘三閻王’下話！”

安荣借了三十五块钱，买了一枝枪，整整給地主拉了两年长工，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賬。

我家三代

朱来金

一九二五年，“地方王”爭夺地盘，狗咬狗地打了起来。反动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大被他們活活地打死了。丢下婆婆，媽媽，五、六岁的我和一、二岁的弟弟跟来。老的老，小的小，怎么活命？

一天，“朱家大院”的地主“三桃桃”要我媽到怀阳城去，給他亲戚紀建堂家做短活——剝綫麻。一个月后，麻剝完了，紀建堂看我媽身强力壮，要留下来給他家做飯。我媽不允，生怕拿不动人家的活，明明知道这家的活重的厉害，不到一个月就逼走了好几个做飯的，你想，誰还敢在他家做活呢？紀建堂不放，硬要我媽先作一个月試試。我媽从此掉进了虎狼窝，一連給他家干了十年。

提起我媽在紀建堂家的十年，那是在“閻王殿”里过日子哩！

我媽給紀建堂家做飯，累死累活。这地主，城里有十大号生意，乡下有好几百亩土地。平时雇了成十个长工，七、八个奶媽，短工不断，还有专做針綫活的。六十多人的菜飯，都出在我媽一个人手里。地主給伙計吃瞎的，自己吃好的，一天三

頓，就得六回做。逢年过节，土豪劣紳来送礼，十大号的經理来交賬，人来人往，花天酒地，做飯更沒遍數。蒸饅、擀面、炒菜、烧火，案上千不完，鍋上又在催，忙得我媽从沒有坐下来安安生生吃过一頓飯。夏天，厨房里像蒸籠，热得我媽两眼带着血絲。冬天，滴水成冰，冻得我媽两手裂口、两腿疼麻。就这样，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干到深夜才出厨房，滿天星星又进了厨房。

我媽在厨房里做飯，不到两岁的跟来就跟着媽媽在厨房里睡、坐、爬，一天天长大起来。五、六岁上，他就跟媽媽烧火了；五进的庄院，地主还分出一半叫他扫。三、四里路，到菜园子去背菜，一天两回，一回二、三十斤。七、八岁上，又添了差事：替少爷背上書包，送到校門口，有时还要把少爷背到学校去。赶十岁上，連喂猪也是他的事了。狗地主硬是把娃往死里折磨，烏七八糟的家务杂活一齐往他身上堆。地主要喝什么“盖碗茶”、泡人参汁，叫跟来送。地主的小老婆喊腰疼，叫跟来捶背。地主的小儿子哭了，叫跟来抱。吃罢飯，叫跟来收拾筷碗擦桌子。这个也叫“灶娃子”，那个也叫“灶娃子”，一步赶慢，不是拳打脚踢，就是一頓辱罵。

伪县长、保安团长、联保主任、保长，都是紀建堂的座上客。这些家伙，常在地主家打麻将，一打就是通夜。遇到这种情形，母子俩更是忙上加忙。跟来站在門外边，等着給人家倒茶送飯。媽媽半夜里給人家擀銷子面，炒下酒菜。这些家伙，打着牌，喝着酒，商量些瞎事：不是那戶农民有片好地，怎样弄到手，就是派什么款，加什么稅，怎么刮地皮。天明，这些家伙

睡大覺去了，跟來和媽媽又要掃地、燒火、做飯、送少爺上學……。

我媽人在“紀家大院”，心里牽挂着婆婆和我。黑夜里，媽想我們把眼睛都哭腫了。

自从我媽進了“紀家大院”，丟下了婆婆和我。婆孫倆每天走村串戶，求爷爷、告奶奶，向人家討一口殘湯剩飯填肚子。婆婆領着我要飯，到懷陽城來了三、四次，婆婆都不肯到“紀家大院”附近去，不敢見我媽一面，生怕落下嫌疑，把我媽的飯碗涼了。可我心里想媽，一進懷陽城，就哭着要去看我媽。有一次，我正哭着，“紀家大院”的奶媽姨姨找我們來了，說我媽想我們想得直哭，要看看婆婆和娃。婆婆流着眼淚，橫着心不去，也不讓我去。奶媽姨姨百般好說，婆婆心軟了，才答應我去見媽媽一面。

奶媽姨姨引着我偷偷進了“紀家大院”，把我藏在偏院的粉房里。我媽這時候正忙着給人家做活，被地主家的人盯得死死的，脫不了身，又心慌意亂，要是露了馬脚就不得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托奶媽姨姨來看我，偷偷在我怀里塞了兩個饅頭，趕快送我出了“紀家大院”。到了還是沒有見到我媽一面。

這事不知怎樣被紀建堂知道了，把我媽叫去問罪，說：“你給我滾蛋！我養活了你們兩個人，還叫我養活你三個人呀！弄不成。”後來我媽求人講情，才算保住了飯碗。

那年冬天，一個黃昏，西北風呼嘯着，地面凍得裂開一條一條縫子，我婆孫倆跑了一天，沒討來一口飯吃，真是飢寒交迫，寸步難行。婆婆讓我先走，自己又討了一程，才拖着腳摸黑回

家。好容易来到双柏庙前，在一条餓狼出沒的路上，被什么东西絆倒了。爬起来，摸一摸，軟軟的。难道是小来金？果然是我！当时，我已經昏倒好久了。婆婆禁不住自己打自己，放声大哭：“不睜眼的老天爷！可怜的小来金！”

兵荒馬乱，大旱奇寒，飯是越来越难要了，婆孙俩常常几天几天啥也吃不上。可怜的婆婆就这样餓死了！

当时我还不滿十岁，到哪里逃生呢？我端了个碗，到县城里去吃“舍飯”。人小力单，搶不到手，又哭着跑回来。我睡在本村一口破窑洞里，五、六天沒吃一口五谷渣渣，昏昏迷迷，不省人事。邻家发现了，才把我救活过来。人們看着我这个有媽不能团聚的“孤儿”，心疼地說：“娃呀！看你瘦的丢下一把干柴了，咋不寻你媽去呢？”不是不想寻，可媽媽、弟弟連自己也顧不上了，哪里管得了我？但是不寻媽媽，又該怎办？我迷迷糊糊的向怀阳城走去。

半天時間，走完了四里路。天黑了，人家把城門关了。我只好进城門洞里蹲了半夜。我是多么想見媽媽呀！但是又怕紀建堂家的恶狗，怕紀建堂的三楞眼，怕紀建堂的吼叫声，不敢喊門。后来，一个替地主守城坐夜的穷人，引着我，輕手輕脚进了“紀家大院”。我見媽媽憔悴的臉，一下子扑进媽媽怀里。媽媽看我皮包骨头，眼泪像断了綫的珠子。可是不能哭，叫地主发觉了可了不得。媽媽赶忙把我藏了起来，又偷着給我拿块饅吃。好心腸的奶媽告訴她：“不敢給多吃，多吃了要胀死的，这娃餓的太狠啦！”

終究逃不脫紀建堂的賊眼，第六天头上，被他发觉了。他



跑来恶狠狠地說：“这是誰家討飯的孩子？給我滾开！”媽媽苦苦哀求多留几天，紀建堂一口咬定不行，三楞眼一瞪，嘴里不干不淨：“我家已經养活了你两个，还能养活你三个？不行！快滾！”母子們就这样又活活被拆散了。

离开媽媽，我又討了一陣子飯。到了十四、五岁上，我到怀阳城富农紀云祥家拉长工。虽說在一个村子，娘儿們成年累月难得見一次面。有时，更深人靜，我悄悄溜进地主大院，媽媽偷偷給我破衣服上縫上几針，惊惶得一句話也沒有敢說。地主家养了四条狗，叫什么大黄、二黄、花花、黑尾，前門后門，各拴一条，还有两条在庄院里头来回窜，条条歪的跟老虎一样，专咬穷人。我每次去都是提心吊胆的。

紀建堂真正是狼心狗肺，我媽和跟来在他家十年，拚死拚活地干，到头来啥也沒落下。当初，我媽进紀家門时，言明每月两块錢的工錢。到了月底，我媽向紀建堂要工錢，地主說：“你好好做活，只要麦子打到囤里了，少不下你的。”麦收以后，我媽又向他要工錢，他硬耍白賴，說：“我雇你一个人干活，你带来个只吃飯不干活的娃（指跟来），錢折算完了！”天哪，一个还在娘奶头吊着的娃，能吃他家多少粮？竟一連折去了三年的工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一天晚上，紀建堂把我媽叫去，假情假意地說：“咱把你这几年的工錢算一下，時間长了。”我媽一听，高兴极了，沒想到掌柜的今天发了善心。賬算完，紀建堂很大方的給了我媽十六元票子，分文不差。第三天，我媽拿出五块錢托紀家奶媽在县城里买点粗布針綫，想着

給我弟兄做件衣服，紀家奶媽到縣城買布，人家說這錢早兩天就不能用了，上邊下令作廢了。紀家奶媽回來一說，我媽氣得把票子擲在地上，要找紀建堂面理。奶媽忙攔住說：“這世道哪有咱姊妹們講理的地方？說不定還會惹出大亂子。他給你攔個罪名，咱可攔不起。”我媽除了忍氣吞聲，有啥辦法？

再也不能干下去了，我媽領上跟來，離開了紀建堂家。這以後，又到庄里、留古、金城、華朱、縣城里好許多地方，侍候過幾十個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吃百家飯，受百家氣。天下老鴉一般黑，到處地主財東一樣狠。記得有一次，我媽給縣城一家財東侍候月婆子，那月婆子嬌的要命，吃飯怕涼，一小碗米湯叫我媽分四、五回盛，喝兩口又叫倒了喂狗；饅切得紙一樣薄，一次送一片吃，送兩片都不行；拉屎怕風，不下炕，被子圍得嚴嚴的，拉下就喊我媽給倒。我媽說：“稍等等，我正吃飯哩！”她就破口大罵：“知道不知道，我是拿錢雇下你的！”在舊社會，真是臭錢逼死窮人。

跟來呢？十二、三歲，就給庄里張財東家拉長工。十五歲回到木村，給“朱家大院”地主干了半年。後來，跑到西安，討飯，打短工。從西安回來不久，富農買通偽保長“黑毒蟲”，要抓跟來去給他家頂壯丁。我媽聽到這消息，晴天一聲炸雷，瘋了似地直喊：“你家弟兄四、五個，不去當兵，偏要割我身上的肉，不行！誰來抓我娃，我就和他拚！”可是，跟來到底叫偽保長抓走了！哪里是窮人申冤報仇的地方，啥時是窮人出頭之日呢？

我这大半辈子

程全有

兵荒馬乱的年月里，我出生在河南淅川县李官桥一户貧农家里。

李官桥是个穷村庄，种的尽是沙土薄地。地虽薄，租子款項却不低。家乡有句話：“每人有了二亩地，生活勉强可維持。”我家六口人，只有二亩半地，根本糊不住口。官家的差人，地主的狗腿子，“白狼”的逃兵，一个紧跟一个来，見天踢得門檻响，害得我一家三天两头揭不开鍋，东挪西借过日子。我大挑着菜担子，卖了菜换点紅苕吃；有机会也捎带着给人家看牲口。

有一天，村里的地主王大胖子找我大給他看牲口。閑談中，我大說出了家里日子不好过。王大胖子一听，很大方地說：“老兄，你有这么大的困难，咋不早說？这样吧，今天你先装上斗半玉米，拿回去吃。日后沒有了，你就张口，难为不了你。”

我大穷的沒有办法，只說財东里也有一两个“好人”，能怜悯咱們穷人。誰知人家是叫咱“吃瓦礫，扇砖头”哩。我大先后从王大胖子那里借了二斗半玉米。快到麦收的时候，发了

一場洪水，我家的二畝半地沒有收成，日子就更難熬了。正在這時候，王大胖子差人來叫我大，說是去給他看牲口。

我大到了王大胖子家裏，只見他手裏拿着算盤，劈哩啪啦地算了一大攤。借的二斗半玉米，按大價折成錢，再來一個“駱打滾”，本利加番。我大拿不出錢和糧食，王大胖子的狗眼一瞪，立逼我大把全家的命根子——二畝半地頂了債。

深夜，我大從地主大院裏回來，看着妻子兒女一個個面黃肌瘦，想想六張嘴馬上要吊起來，忍不住落下淚來。一家大小聽說把地頂了債，“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我大是個誠實人，這一竹杠也給敲醒了，嘆着氣說：“原來他才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早就沒安好心！”這口惡氣咽不下去。我大心想：“死娃不怕狼啃”，你害了我一家人，我也要讓你知道窮人是不好欺侮的。

第二天白天，我大狠着心，把我十二歲的姐姐送到了她婆家。晚上趁着月黑，摸進王大胖子的馬房，用鐮頭打斷了他的牛腿，趕緊跑回來，叫醒了一家人，商量着連夜逃走。往哪里逃呢？我大說：“聽說陝西年光好度，就往那里逃吧！”

漆黑的夜晚，爹挑着副担子，一头是行李卷，一头是四歲的弟弟，我媽拉着我哥兒倆，一家五口，踏上了苦難的路程。從我九歲起，逃到二十四歲，十五年落腳過八處地方，最後才逃到集古村來。這段路，每走一步，遭一次殃。

頭一步，踏進陝西雒南一個窮山溝，住在一個破廟裏。半夜時分，猛不防一群穿“黃皮”的刮民黨軍隊闖進門來，不開腔，先解鋪蓋卷，把仅有的兩塊錢給翻出來了。一家人苦苦哀求，我大拉着他們不放，問他們：“你們這不是搶人嗎？”豺狼們

說了句：“就是搶人，你能把我們怎么样！”把我大一脚踢倒，返身溜跑了。媽難過得放聲大哭，大氣得直頓腳，連聲罵道：“這是個啥世道！這是個啥世道！”

這個地方活不下去，爹挑起担子，領着我們又起了程。一路上，我們沒錢沒糧，全靠要着吃。在那荒年災月里，討飯吃也是難呀！窮人想給給不起，財東不光不給，還放出惡狗來傷人。

有一次，我們路過一家財東門口，正要走上台階，大門“咚”的一聲關上了。我們要第二家時，大門開了，一條大黃狗撲出來。我走的慢，小腿被狗咬了一口，鮮血順着腳腕流下來。

狗地主還神氣十足地站在台階上哈哈大笑，財東的小少爺樂得直喊：“小叫化子掛彩了！小叫化子掛彩了！”

我氣得挽起袖子要打這伙狗雜種，媽媽拉着我，眼淚汪汪地說：“俺們還能惹得起這伙地頭蛇！”

就這樣，又氣、又餓、又累，苦難的路程，把一家大小拖得皮包骨頭。特別是我媽，路上走不動，要來吃的，總是先讓我大和我弟兄們吃，自己却空着肚子。日子久了，她瘦得不像人，走路直晃悠。沒辦法，大橫着心，把我的小弟弟賣給了人。兒是媽身上的肉，弟弟被抱走的時候，嘶聲哭叫，媽難受得熱淚滾滾。我大忍痛勸我媽說：“跟着咱也是死，不如給他找條活路吧！”說着說着，自己也忍不住流下傷心淚。

我一家沿途乞討，流落了兩個多月，來到蒲城一個叫大連莊的地方。大和哥給地主連燕娃干活，媽帶着我挖野菜，討飯

混日子。这連燕娃是出名的吝啬鬼。剝削长工，弄麦皮也要榨出油来。他欺負我們是外路人，剝削更加厉害。我大是做庄稼的能手，“扶耨撒籽入麦秸，吆車打的回头鞭。”样样都会，外加还能看牲口病；我哥膀粗腰圓，一个人頂一个半人用。可是，工錢却低得可怜，全年只有九串銅錢。媽和我們在破庙里餓着肚子，我大去向連燕娃要工錢，給我們买粮食。狗地主不給，嘴里还不干不淨地罵罵咧咧：“我养活了你们父子俩，还能养活你一家！”

我大气不过，拿理問他：“我們做活，是凭下苦吃飯，可不是靠你白养活；我們做活，你給工錢，那是拿血汗換的錢，你凭啥不給！”

地主被問得啞口无言，气得臉紅脖子粗，只是发邪威說：“再鬧，送你們当壮丁；再鬧，叫你們滾蛋！”

我大想了又想，地主瞎心腸，啥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把一家人引到虎口边里，迟早会招祸的。“三十六計，走为上計”，我大又挑起担子，帶領一家人起了程。

实想到陝西会好一点，沒料到穷人到处受苦难。在陝西沒法定脚，又逃难回到河南灵宝县。走投无路，到处瞎碰冒撞。碰来撞去，到底还是沒离开地主家的門。在灵宝，三口人給地主干了一年活，掙了不到一串錢。我当时只有十一岁，財东家把我当大人使喚，累得我害了一场大病，几乎把命送掉。不等过年，我們又起了程，“二返长安”，来到陝西蒲城。

在蒲城党集，我們凭着三个好劳动力，租种了地主丁海田的一些地。“丁家大院”有地三頃多，开的大字号，到处放有

賬；四弟兄，老大当家，老二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老三领工，老四当校长。有钱有势，有枪杆子，连乡镇长都怕他三分。咱家“饥不择食”，给丁家当了佃户。

讨吃要饭难，当佃户同样难。我家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付担子。种地，要牲口没牲口，要农具没农具，要种子没种子，要粪土没粪土……，有的就是三双手。这一切都得向东家借，甚至吃的也是吃一天借一天。打下粮食说的是和地主对半分，可是，三下五除二，给地主还了种子，牲口、农具租用钱，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一个萝卜几头切，剩下的粮食吃不过年，全凭糠菜哄肚皮。

到第三年上，下了几场好雨水，麦子长的绿油油的，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眼巴巴盼望有个好收成，能多分点粮，日子好过些。一家人五更头下地，天黑实了才回家，一天到黑锁在地里苦做，连吃饭都在地里。这一年，我才十七岁，跟着一家人拚命地做，连耳朵都挣聋了。

眼看要搭镰收麦了，可是屋里连一颗粮食都没有。咋办呢？只好向东家借了一石麦。我大上过地主的当，吃一颀长一智。这次装粮时，要讨东家一个实话：有利没利，有利是多少？

东家糖样的嘴说得怪甜：“伙计吃掌柜的麦，我拿陈麦换新麦，还说啥呢！”

我们一来等粮下锅，二来听东家说的蛮好，放心的把粮食背回了家。

碌碌一卸，新麦刚晒干，地主丁海田穿着白绸衫子，戴着

凉草帽，领着三、四个跟班，坐着大車来了。我大忙着招呼人家，媽手忙脚乱地把准备了好久的鸡蛋炒上，酒燙上，白面擀上，我一碗一碗地端了上去。人家吃了以后，嘴一抹，馬上叫跟班們装車。

这一伙子狼吞虎咽的吃飽了，把新麦一袋一袋的装上了大車。場里剩下的麦堆越来越小，我大心里一盘算，剩下的粮食又混不过年了。

“麦前借的那一石麦，这一回先不要装吧？”我大跟人家商量說。

地主打了一个飽嗝儿，望了望給我家留下的小麦堆，說：“不行！你有新麦就得把陈麦賬还清。”

我大想了想，留下陈粮賬也是祸根，橫了心，說：“好吧，再装一石，清賬。”

地主“哼哼”冷笑了两声，恶声恶气地說：“一石，想的便宜！你們穷小子紅口白牙，吃了我的麦，还想賴賬！”

我大气得直喘粗气，質問他：“誰賴賬？”

“你借一石，还我一石，我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地主翻脸不認賬，把說过的話当作放了屁，硬装走了我家一石三斗麦。

前后不过十天，他一石麦净賺了我家三斗麦去。我一家人拚死拚活做了一年，眼看剩下的粮食連秋都接不上。我大又气又急，一天到晚唉声叹气。

真是祸不单行。麦后不几天，地主派人来抽了佃。一家老小馬上失去了营生，我哥气得跳起双脚，大罵狗地主黑了良心。

牆外有耳，狗腿子把我哥罵的話，加盐加醋地报告了地主。这下可惹了大祸。

这天晚上，一家人刚刚睡下，忽听得一片敲门声。全家人又惊又怕，深更半夜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大和我哥赶忙披上衣服，还没来得及下炕，“哐”地一声，门被踢开了，闖进来一伙穿黄皮的国民党匪兵，伸手拖住我哥，取出繩子，五花大綁，拖起就要走。我娘們吓得大哭大叫。我大一看，急了，一把抓住那个当官模样的人，气呼呼地問：“你們凭啥半夜三更抓人！”

那家伙一甩手：“凭什么？你家应当出一名壮丁！”說着走出門去。

我媽坐在炕上，見娃被搶走了，急得直拍腿，忙对我大說：“你赶快撒去，不行就和他上衙門告状！”

我大这才明白过来，連忙抬脚跨出房門。

夜深了，四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見，传来几声我哥的哭叫声，跟着什么声音也听不見了。

到哪里去找他們？哪里是我們穷人申冤告状的地方？

六、七天以后，一个晚上，我哥突然回家来了。他說壮丁不是人当的，他受不了那种罪，偷跑回来了。我大和我媽忙把我哥藏起来，一連好几天不敢讓他露面。說也奇怪，那些日子，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我家来串門子。我大怕露了馬脚，白天不敢讓他在家里，天不明就打发他躲在野地里，晚上才敢回家吃飯。

这件事，不知怎样被伪联保处知道了，串通了国民党軍隊，二次来抓我哥。那天晚上，我哥回到家里，刚端上半碗稀

粥，便被国民党押走了。

几天以后，有一个邻居从县城回来，說是他亲眼看見我哥的死尸被人抬出去，扔在“万人坑”里了。这恶耗炸雷一样打在我们全家人身上，我媽吓得哭不出声。我大連夜赶到县城，站在几丈深的“万人坑”边，連我哥一根骨头也找不到。我大哭了一夜，从地上抓了一把土回到家里，埋在門旁，算是尽了做老人的心意。

后来才知道，我哥被抓壮丁，是“丁家大院”搞的鬼。狗地主夏天收租那回，我大同他頂了嘴以后，一直怀恨在心。他弟兄四个，本来應該出一个壮丁，他却給伪保长塞了“黑拐”，把我哥拉去頂了数，来了个“一箭双鵬”。

我大怀着滿腹怒火，常对我說：“总有一天要报仇！”丢下丁家的地，又挑起那副担子，带上我娘俩来到肖吉村，給大財东侯老九干活。

天下烏鴉一般黑，这个“侯家大院”，像地獄一样，阴森可怕，經常毒打长工，欺压穷人。我大是个耿直人，最看不慣那些邪魔歪道，見了不講理的事情，就帮长工們說几句公道話，这可成了侯老九的“眼中釘”，想法設計整治他。

有一次，侯老九派我大去看玉米。我大前面走了，侯老九又暗地派了几个狗腿子，从地另一头用馬棒悄悄打倒一片玉米，然后溜走了。

我大在窝棚里一夜沒合眼。

天明时，侯老九来了，走到那片被打倒的玉米地边，假装大吃一惊，抓住我大領口吼叫着：“狗日的，你敢偷懶，讓人家

糟踏我的庄稼！”

我大和他辯理說：“我一夜沒合眼，就沒听到一点动静。”

“你敢犟！”說着，一馬棒打在我大的腿上。我大当下倒在地上，脚骨拐被打断了。

我听說大被打伤了，气得眼里直冒火，一口气赶了来，豁出一条性命，要和侯老九拚了。狗腿子見来势不对，一下拦住我，推倒在地上。长工們害怕我遭了毒手，从四面八方赶来。

侯老九看見长工們都围上来了，不敢久留，吼了声：“快上工去！”領上狗腿子回家去了。

我“哇”的一声，扑到大的身上，哭了起来。大摸着我的头說：“娃呀！鸡蛋碰不过石头，暂时不要去碰。君子报仇，不在三年。”

这口气我忍了下来，但是我記住了大的話：“总有一天……”

我們回家商量着，不干了，走！可是，大受了伤，手脚不灵便，怎能上路！只好留下来，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我媽只得进了“侯家大院”，做日子活。一天，侯老九硬說我媽拆洗被子时，把他的棉花抽走了，还扯了一块被里。我媽开口和他辯了两句：

“我們穷人有穷人的志气，哪会做出这样見不得人的事！”

“你个穷婆子好大胆，敢和我頂碰！”侯老九怪眼圓睜，随手打了她两耳光，接着又是一脚。

我媽遭到地主毒打，呕气在心，不久含恨死去。

究竟哪里是穷人落脚的地方呢？我一家五口人，逃难在

外，死的死，卖的卖，到如今只剩我大和我两个人。我大宁肯餓死，不再进地主家的門。老人一瘸一拐的，挑上副担子，到城里卖菜謀生。生活的折磨，使他血气衰退，头发全白了，被地主打伤的腿又伤势发作，走不了路。肚子都塞不飽，哪里有錢看病呢！

有一天，我大挑着菜担子，正走在半路上，被地主打伤的腿忽然疼起来，我大摔倒在地上，疼得直打滾，不一会就咽了气。那时，我正在地主家里做活，穷哥們跑来报信，說我大死了，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响，擲下活就向大路上奔。我扑到大身上，失声大哭；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死了！穷哥們劝着我，帮我把我大抬回村里。

就这样，逃难的路还没走完，一家五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掩埋了大的尸体，扛上唯一的家业——大留下来的一副打胡基的模子，来到了富平县集古村，进了新的地獄——“朱家大院”。在这个地主家里，我一連干了十五年，当驴当馬，总沒逃出火坑。我头发白了，腰身弯了，眼昏花了，沒有成过家，沒有半片瓦，吃人的旧社会喝了我的血，还要在我的老骨头里榨出油来。我躺在財东的馬圈里，整夜整夜的想，什么时候才能报我心头恨呀！我程全有就这样过一辈子嗎？这世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变呢？

长工生活十六年

赵聚才

我从十二岁起，到临解放时，给地主、富农整整拉了十六年长工。地主、富农没有一个好的，对长工又苛刻，又狠毒，真是越富越坏。我前后给八家地主、富农拉过长工，就说说在集古村给地主朱允年和伪保长“黑毒虫”拉长工的苦水吧。

我的头一个东家是地主朱允年。

我十二岁那年，从外边讨饭回到了集古村，被朱允年家里看上了我这个“便宜长工”，把我叫到“朱家大院”，话说得蜜样甜：“你给我做零活，管吃管穿。只要你好好给我干，别的事都好说。”

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听说他管吃管穿，就答应给他干活。可是一进朱家门，地主就变了卦，说是做零活，实际当长工使唤。朱允年家有一百多亩地，打常得两个长工。我算一个数，却不给一个工钱。

我是拉枣棍长大的，十二岁的人，看起来不过九、十岁，个子小，力又单，人家可不管你咧，做得了要做，做不了也得做；地里、场里、屋里、槽里……那里忙，那里使唤。五更头下地，半夜里上炕，一天到黑忙得团团转。天晴闲不下，雨天也不得



閑，不是叫我燒鍋，就是叫我磨面，人家還興了個怪規矩：磨面不算活。每次磨面時，頭天晚上把麥拾掇好，已經到半夜了。被窩還沒暖熱，就叫起來套磨子，趕明要磨二斗麥。天一明，馬上下地。牲口做累了，還有歇的時間，拉長工連牛馬都不如。逢年過節我更忙，人家走親戚串門子，我給人家拉馬備鞍子；人家擺酒席宴賓客，我給人家端茶送水，侍候到底，一步不到，不打便罵。

有一天，耕地的鄉親們都回家歇晌了。我一個人還在高塬的後溝里割苜蓿，忽然聽見有人喊狼，我怕的心里蹦蹦直跳，轉眼一看，一隻灰狼拖着尾巴，豎着兩隻耳朵，一個箭步竄到我身後。我着了慌，把手里的鐮刀向它甩去，沒有打中。灰狼就蹲在我面前，和我睜白眼。我吓得沒了主意，打不敢打，跑不敢跑，只好也看着它發呆。幸亏遠處一個鄉親趕來，喊着打狼，把狼吓跑了。

我吓得出了一身汗，從地上拾起鐮刀，要割草，又怕狼再來；想回去，又怕地主打罵。只得硬着頭皮提心吊膽地割草。誰知剛割了兩把草，又有人喊狼來了，這時我也顧不了許多，撒腿就往村子里奔。

回到村子里，我才舒了口氣。剛走到“朱家大院”門口，被朱允年看見了。張口就罵：“看把你的狗命貴重成啥啦！狼吃你？狼還嫌你噁心哩！去，非給我割把草回來不可！”

吃了人家飯，咋敢不跟人家轉？我只好又走到高塬後溝里，胆戰心驚，摸黑割了一籠草回來，地主才給飯吃。

我從小在外討飯，身體不好，經常肚子疼，流鼻血。有一

次鼻子出血，整整流了一天。到晚上，听人说用冷水浇头，就不流鼻血了。我就弄了一桶冷水往头上浇，这下可坏了，鼻血是止住了，人却晕倒了，等醒过来，肚子又疼起来了，躺在炕上直打滚。天还没亮，朱允年就叫我去割草。我说肚子疼得去不成，他说：“你能吃饭就得干活。”没法子，我捂着肚子去割草，疼得太厉害了，就在地上爬一会儿；疼得轻一点，便勉强割草。就这样，回去朱允年还骂我割的草少了。

朱允年家有一口水井，十二丈深，身强力壮的大人摇一次水，还累得直喘气。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娃娃，怎摇得动？地主一定要我干。我只得用尽力气摇轱辘，摇两圈，用肩膀抗住轱辘把歇一下，摇一桶水得半天，累得浑身冒汗，出气都不匀。有一年，朱允年雇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摇水，一桶水摇到半截，力气使尽了，手一松，轱辘把打得他头上出血，胳膊也肿了起来。

进“朱家大院”的时候，地主说是“管吃管穿”，更是鬼话！人家吃的是白米细面，我一年四季都是黑面加麸子，地主还生怕我吃的多。人常说，长工是“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实际上吃的比猪狗还不如哩！

记得，有一回，我饿得实在没法了，从狗食里拣了一块馍吃。正吃着，被朱允年看见了，他赶过来就是一顿没头没脑的饱打，还边打边骂：“看你这个狗杂种，还敢和我的狗争馍吃不！你把馍吃了，难道叫我的狗饿死不成！”

逢年过节，人家大吃大喝，我不用说沾点油荤，连块白馍也难见面。说到穿的，朱允年没给我缝过一件衣服，买过一双

鞋。渾身上下，几片碎布胡乱縫綴起来的衣服，連丑也遮不住。冬天，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顏得像篩糠；夏天，赤着双脚拉耙，麦茬把我的双脚刺得稀烂，疼得我一走一拐，我稍微换了口气，朱允年就大声罵起来：“狗日的，想偷懶嗎？想的倒好！”我只得咬着牙干下去。不久我挣了一身病，病一来，渾身出水汗，肚子疼的像刀絞，叫娘喊大滿地滾。朱允年看都不看一眼，还罵我是“想方設計偷懶哩！”逼着我起来干活。这哪是人的生活啊！我真想大哭一場，可是，我不敢哭，如果被朱允年看見了，少不得又是辱罵和毒打。只有在山坡上，在野地里，沒有人看見，才能痛哭一場。

三年过去了，連一个錢也拿不到手。我向他要工錢，他錢不給，还把我赶出了門。我白白地給他当了三年牛馬。

出了朱家門，只說逃出了狼窩，誰知又掉进了虎口，伪保长“黑毒虫”要我去給他拉长工。“黑毒虫”还有个外号叫“长虫吸蛤蟆”，是敲詐勒索，明爭暗夺发家的，七十多亩地，亩亩来路不正。他双手沾滿了穷人的血汗，对待长工的手段，比朱允年更要毒辣。他要誰去做活，如果不答应，便想法子陷害你，不是拉你壮丁，便是敲你錢財。长工做的活，他总要鸡蛋里挑毛，不打就罵，“黑毒虫”想叫长工給他多做一些活，常常是白天睡覺，晚上監視长工們干活，要是你一打盹、睡覺，他提起文明棍給你当头一棒。有的长工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偷偷逃跑了。刘玉成沒逃脫，被誣說偷了他的蓮菜，吊在树上拷打。刘玉成忍受不住，答应給白干一年活，才算了事。

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不干，要馬上餓肚子；逃跑，又

沒地方可去，只得在他家干下去。我东山太阳背到西山，累得腰痛腿酸，晚上还要陪他到半夜，甚至到天明。每天晚上他稳在炕上过大烟瘾，和村里的地主、紳士一起唧唧咕咕，不是謀算誰家的财产，就是商量拉哪个穷人的壮丁。他过癮一遍又一遍，我喂牲口一槽又一槽，还要給他烧水熬茶。他坐到啥时候，你得陪到啥时候。有一夜，乏得实在撑不住，我給牲口添了一槽草，身子靠在槽边上，不由得睡着了。“黑毒虫”叫了我一声，沒有应，他輕手輕脚走到我跟前，劈头劈脑就是几耳光，边打边罵：“看你狗日的还敢偷懶不？”

地主富农看的一本書，就是不想叫长工歇一下。好像长工成天到晚都給他干活，不用吃飯，不必睡觉才合他們的心意。这“黑毒虫”更加一等，連你拉屎屙尿，也嫌占了他做活的时间。可是吃飯呢？怕你吃的多，还給你吃的迟，常常是早上飯，日头端，晌午飯，日压山；晚上飯，鸡叫喚，总叫你給他在地里多干一会儿。你要是早回来一点，免不了一頓臭罵，又把你赶回地里去。你肚子餓得像唱大戏，可是端出来的飯食，黑馍論个个，黑面論条条，全凭稀湯灌飽肚子。一口鍋里做着两样飯，人家吃的是飞罗面，白蒸馍！如果給他做活出了錯，可就惹下了麻达。

有一回，我給他家耕地，不小心，把他家的鐮打烂了。我提心吊胆，一步挨一步回到他家，悄悄把犁放在一边，生怕叫他看見，偏偏他这时走过来，看見犁上的鐮沒有了，就恶声恶气的問：“怎么鐮不見了？”

我答了一句：“我不小心把鐮打了。”

“啥咧？你把鐮打了，老子今天要了你的命！”

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鞭子，狠狠地一鞭又一鞭，打一下罵一声：“我要叫你看看我的厉害！”他一鞭下来，我身上一条血印。我越哭，他打的越狠。这时候，很多穷人都来解围，“黑毒虫”的劲也用完了，他把鞭子狠劲一扔，到房里过瘾去了，嘴里还嘟嘟囔囔罵着：“今天算饶了你，要是以后再毁坏我家的东西，非叫你見閻王不可！”

晚上，我渾身痛得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长久这样下去，我的命非送到“黑毒虫”手里不可。我盘算着怎样才能逃出虎口？

事隔几天，“黑毒虫”叫我一晌耕完三亩老苜蓿地，还得耙完三亩老苜蓿地。一晌还能耕完，耙完？这不是在整人嗎！兔撵急了还要回头咬你一口，你坑人，我还能不回敬你！我拿定主意在他的牲口上出气。揭老苜蓿地，犁重，难拽，我就狠狠地抽牲口。等到揭完、耙完，牲口已經累得不行了。虽然我的肚子餓得前皮貼后皮，但出了一口恶气，心里暢快了些。

当我回来的时候，已經晌午了。我还没进门，“黑毒虫”的婆娘拦在門口罵起来：“日你媽，你不嫌累，我牲口可嫌累！”

我回了她一句：“掌柜的叫我一晌揭完，耙完，我有啥法？”

她沒話可說，可是不給我飯吃。

我越想越气。去他媽的！我把鞭子一扔，半年工錢不要了，再也不給他們当牛馬。我勒紧褲带，一气逃到西乡山里去了。

工 錢

王长发

旧社会，那些地主、富农，真是吃人的肉，喝人的血，把穷人给扎了。光那克扣长工工钱的方方窍窍，说起来就得三天三夜。

让我从搬家的一段辛酸历史说起。我家原住臥龙村。一九二九年遭年饑，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天天有埋死人的哭声。就在这一年，我大病死了，给我妈留下我弟妹这五张只会吃饭的嘴。我妈没钱葬埋我大，没钱养活老小，借下一摊子账。没啥还账，仅有的三间房，连同日用家具都被债主一锅端了。

家在哪里？这个破庙住一夜，那个破窑歇一天，哪里都有家，哪里也不是家。吃什么？野菜、树叶、榆树皮，什么都吃，什么也没得吃。那日子没法提了！

冻饿难忍，我们兄妹一天哇啦、哇啦喊着要吃饭。万般无奈了，妈要卖掉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弟弟。这时，我才八岁，虽然不懂事，一听要卖小弟弟，也哭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阵子也不觉得饿了。我说：“妈，不要卖弟弟，咱哪怕饿死，也要在一起。妈，我不饿，以后我也不喊饿。”

谁舍得割掉自己身上一块肉呢？为了让小弟弟逃个活

命，讓我們多活幾天，媽還是把小弟弟賣給县城一家財主了。在人家來抱娃的時候，泪水把我媽胸前的衣襟都洒濕了，她給小弟弟喂了奶，把臉向後一擰，讓人家把小弟弟抱走了。

有了米，幾天誰也不想吃，不住地向下咽眼淚。我把飯端到媽手里，勸她吃一點。她把飯看了半天，剛往嘴里扒了一口飯，哇的哭出聲來：“這哪里是吃飯呀，這是吃我身上的肉哩！”

賣了小弟弟，並不能救下全家的命，媽只好領上我們討飯。

有一天，我跟媽討飯路過县城，聽到街巷里有幾個人正在議論什麼，有的說：“你既不爱人家娃，你就干脆別要。要了來，可經常折騰人家娃哩！”也有人說：“呸財主的心到底是個偏偏子。”

我媽一打聽，才知道是我小弟弟到財主家以後，少吃沒喝的，被財主家折磨的失了人形。這一下，可把媽心疼死了，万万沒有想到娃會落到這個下場。第二天，媽就找人把娃从县城財主家要了回來。

媽因為累、餓，加上又氣又急，病倒了。家裏的事情就落到我身上。白天，我抱著小弟弟玩，給他找吃的，弄喝的，晚上就摟着他睡覺。我心里更喜愛小弟弟了，一時不見就想的了不得。

可是，媽有病，一家人沒有飯吃，生活過不下去咋辦？媽只好答應人家，二次把小弟弟賣掉。你想，我咋能再讓別人把小弟弟抱走呢？媽對我好說歹說，說啥我也不答應。

我對媽說：“媽呀，你咋能把小弟弟賣掉？你就不心疼

呀！”

媽听了我的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說：“媽的娃，媽咋不心疼？媽也是被逼得沒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呀！”

我看媽还是要卖小弟弟，就悄悄地把小弟弟抱到邻家的屋子里躲起来，一天都不敢回家，生怕人家来抱走小弟弟。直到晚上，邻居們才把我劝回家里。

第二天清早，一个老婆子来到我家。一看是来抱娃的，我赶紧抱上小弟弟就走。媽一把把我拉住了，不讓我出去。

老婆子对我媽說：“长发媽，把娃給我吧！”

媽硬从我手里把小弟弟搶过去，含着眼泪，把娃交給了老婆子。我急了，拉住老婆子的衣袖，就用拳头捶她，不讓她走。媽使劲把我拖开了。

老婆子抱着我小弟弟一出門，我媽就哭起来了。我拉住媽，追出門去。

老婆子抱着我小弟弟前边走，我和我媽哭着跟在后边，不知不觉走到了梁家村城边，眼睁睁地看着老婆子把小弟弟抱进城去了。我們母子二人抱头大哭，边哭边往回走，一直哭到家里。

隔了几天，媽把卖小弟弟的十几块現洋，拿出八块交給我，領我到了堂兄家里。媽对我堂兄說：“侄儿，叫你媽暂时把长发管上，以后有了办法，我再叫人来接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說：“娃呀，你要乖乖的，听你大媽和你哥哥的話，过几天我来接你。”

我哭着不讓媽走，媽也流着眼泪，不忍心丢下我。母子二

人对面哭了一场，媽还是走了。

离开了媽，我一天到晚心神不宁，睡觉也梦见媽給我餛吃，醒来却不見媽，我直哭得成了个泪人。

乡亲们千說万說，媽才下了决心，改嫁到集古村。过了几天，我也回到了媽身边。

集古村还不是一样苦。繼父王忠奎家里，也是把鍋当鐘敲哩，他給地主拉长工，常年不得出地主的門，也管不上我娘們的吃穿。媽的担子并没有減輕，只好又領上我們，东村串西村，求爷爷、告奶奶地討飯混日子。

到了十五岁上，我再也不願出去討飯了，我要去干活，掙了工錢好养活媽媽和弟弟，媽看我皮包骨头，又瘦又小，胆怯地說：“娃呀，你还小哩，財东家的活，你拿不动。”我說，“能行！再苦也比求爷爷、告奶奶强，再苦也能掙点錢养活你們。”

誰知道，給地主、富农拉长工，一样要受苦受气，干到腊月三十，也一样两手空空，人家在你骨头里也要榨出四两油来！

头一年，我給臥龙村地主、伪营长何明皋做活。活重的怕人，累得我直不起腰。天不明上地，半夜不得睡觉，要是迟起一会，那个猪声就吼开了，“狗日的，鸡都叫了，还不給我下地！”我一动嘴，便被他頂回来，“吃我的熟的，拿我的生的，你当咧錢好掙！”半途上，我腿出了个疮，他說我是装下的，硬逼着下地。有时候，疼的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到年头算賬时，他把这件事喊的怪响，“你想的倒好，还想要錢？把你这个瘦驴喂到我馬槽上，养活过来了，装病耍奸，不找飯錢，就算輕饒了你！”我做了一年活，一个錢沒拿到。

第二年，我給一家外号叫“球皮”的地主做活。这家伙对长工看得紧，生怕給他少做了活。这年麦收后，場里一碾毕麦子，跟着就堆麦秸。“球皮”他娃站在麦秸堆上，我站在下边往上擲麦秸。你想，几十亩地的麦草秸积起来有多高、多大！我一个人往上擲，哪能都恰好擲在他脚边上？稍微擲偏了一点，这小“球皮”就罵开了：“不中用，你能做个啥？光知道掙人的錢，咧錢就咧好掙呀！”

他一开口就沒个完。我越听越生气，这小子和他大活像一个狗肚子里剝出来的，小小毛娃娃，就想跑到大人头上耍点子来了。我順口說道：“咋呀，我是用苦身子熬哩，是用人肉換的吃猪肉哩，又不是白拿你的錢！难怪人家管你大叫‘球皮’哩，我看咧对的。”

“騰”地一下，小“球皮”从麦秸堆上跳下来，抬手就打了我一杈把，我伸手架住他举起来的杈把，要跟他干一場。他看眼下要吃亏，再沒有言传。

收工回到地主家里，“球皮”把我罵了一頓，工錢也不給了。我拿他沒办法，只好回家了。

以后，我媽为这工錢，不知跑了几十回，每次去他家，“球皮”都避不見面，我媽从前門进去，他从后門溜走。有一天，我媽老远看見他站在城門外，正在和一伙人拉閑話，我媽怕他跑了，就拐了个弯，从他身后边走过去。“球皮”当着众人的面，不好耍白賴，給了我媽两块錢，这两块錢，就算我給他家干了大半年活的工錢，以后再沒耍下分文。

集古村富农翟經齋的算盘也不松火。我給他拉长工，言

明收麦后給一半工錢。到时候,我要給媽买粮食,去向他討工錢。他假仁假义地說:“不要到別处去买了,咱囤里就算有你两石吧!”

新麦上市,价錢便宜,我拿一半工錢就換下两石麦,心里还蛮高兴哩。

誰料想到了冬季,粮价上涨,我去要麦,習經書就翻臉不認賬了:“沒有麦,給你錢!”

麦是我打下的,囤是我装下的,他还要睜眼說瞎話!給多少錢?按原来的麦价折算,結果只买一石麦。真把人肚皮气破!

說来叫人难以相信,我給地主做活,还倒找过錢呢!那是給本村“朱家大院”地主拉长工时的事情。晚上,我从河里往朱家壩給牲口担水,一个来回二里多路,一夜担上二十几回,把腿都跑硬了。白天,我在蓮菜池里捞草,把腿都泡肿了。夏收大忙过后,我的腿疮病犯了,疼得要命。一晌沒下地,地主直吼叫:“我是拿錢雇来的;能吃飯就能干活!”我讓他看腿疮,你猜他說啥?他說:“要想歇,你就得出錢雇頂工。”

沒办法,我先請忠奎伯去作頂工。老汉干了四、五天,实在撐不住了,回来对我說:“我干不下来这活,你看咋办?”

我想想沒法,只好出了三块錢,又雇人去頂了五天。病沒好,再雇不起頂工了,正在为难中,地主气冲冲地跑来,硬把我从炕上往下拉,說什么“非給我干活不可,拿鉄錘扛也要把你扛到年底”。

我說:“去你的吧,工錢是倒找了,活也是不干了!”

还有一等地主富农，死乞白赖的不给工钱。臥龙村富农姚子厚就是这等人。言明春上给一半工钱，收麦后给一半。春天我的破棉袄脱不下身，向他要工钱换季，他说：“没有钱，等些天吧！”过几天再要，还是这两句话：“没有钱，待些天吧！”热得我光脊梁干活，一直到收麦以后，还是这两句话：“没有钱，等些天吧！”看看这工钱是无法“等”到手了，我一横心，高低不干活，再干也是白干。你看，到处的地主、富农一口腔，这个姓姚的也说了：“不行！你非给我干不可，拿铁绳扛也要把你扛到年底！”我说：“拿铁绳扛，也是不干了！”

在旧社会我拉了二十多年长工，地主、富农克扣工钱的事多着哩！咱那时是穷光蛋，有理向谁去说？咱那时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

五亩三分地

何根杰

說穷人“命苦”，是騙人；說地主心瞎，是实情。瞎心腸还有个“巧”手段，把你整得家破人亡，你还得給他出力卖命。我父子两輩給“朱家大院”把苦下扎啦；地主为了謀算咱那五亩三分地，也把手段使尽啦！

我大原是华州人，在老家穷得站不住脚，討飯来到集古村，进了“朱家大院”，給外号叫做“卡球算”的地主朱立志拉长工。我大一連干了九年活，积攢了点錢，零零星星买了五亩三分地。有了地，就算有了家业，我大出了地主門，打算回家过自己的日子。

那时候，人們把地按照土質好坏，分成五等：金、銀、銅、鉄、錫。出“金粮”、“銀粮”的是好地，財主家霸占着，沒有穷人的份。我大拿长工錢买来的是最差的“錫粮地”，又薄又陡。穷人家做庄稼，沒牛、沒粪、沒种子，缺这少那，难場可多啦，我大把心操扎啦，把力出扎了，才把地侍弄得像个样子，遇上好年景，还能收个四、五石粮食。这时，財主們眼紅了，“卡球算”为了謀算这五亩三分地，使出了瞎心眼。

有一天，“卡球算”把我大叫到他家里。我大一进門，他装

着人样子，装烟倒茶，客气得不行，对我大說：“何师，我看你年紀大了，也該成家啦！”

我大叹了口气，回答說：“咱穷得把鍋当鐘敲，还能成起家？”

“你給大叔做了几年活，是你遇合好。大叔想給你成全了終身大事，你看怎样？”太阳竟从西边出来了，“卡球算”很“大方”地把他大在岐山县作官时带回来的一个丫头，許給我大了，还說：“从今向后，你我两家，就是外甥舅家了！”

我大万沒想到这里头有鬼，对东家帮助自己成家，很是感激。当“卡球算”要这个“亲戚”去他家“帮帮忙”时，我大便带上这五亩三分地，又进了“朱家大院”。

我大在“卡球算”家里，吃自己的飯，干人家的活，热身子躺下，給人家楞干，那五亩三分地收下的粮食，也倒进了人家的囤。当时我大沒有計較，因为是“亲戚”嘛！但是，这“朱家大院”活重鞭子硬，对待穷“亲戚”同过去一样的冷酷无情。我大实心实意地給人家苦干，人家还是嫌你做得少、做得慢，动不动就給你摆脸子、发脾气，罵得你祖宗三代都不得安宁。我大到五十年紀上，就已經累得腰弓背驼，走起路来两腿打閃閃。

“卡球算”見骨头里再也榨不出多少油来了，就把我一家三口赶出門外，住在偏院一眼破窑里。我大二十多年的长工錢，“卡球算”一文不給；五亩三分地二十多年收的粮食，一顆不給；就連那五亩三分地，我大把好話說了三百三，才算从他手里要了出来。当家里揭不开鍋，我大去向人家要点米面时，

“卡球算”翻脸不認人，罵罵达达地說：“狗日的，不能动了，还能吃！”

我五岁那年，我大連气带餓，再加上劳累，死在“朱家大院”的烂窑里了。“卡球算”名义上是我“外家”，实际上是我的死对头。我大的尸首在烂窑里停了一两天，沒法埋葬。我媽找上“卡球算”，苦苦哀求地說：“你不念亲戚，也念他給你苦做了半輩子。帮点忙，不給棺板，給一頁席也成。”

“卡球算”把驴脸一吊，哼了一声：“我管了他的活，管不了他的死。他活着吃了我熟的，拿了我生的，死了还能带我的！”

这家伙橫不講理，气得我媽說不出話来，娘俩哭死哭活，連一頁席也沒要下。幸亏和我大一起拉过长工的朱五长，給我們买了一頁席，才算把老人埋葬了。

那年正遇上大年饑，五亩三分地顆粒不收，庄稼全被旱死了。腊月間，“朱家大院”准备过年，杀猪宰羊，紅火的很；我娘們揭开鍋盖沒米下。“腊八”那天，“卡球算”悶家吃“腊八面”，我娘領着我兄妹，頂着风雪，挨門要飯吃。

日子实在过不前去，我媽带上妹妹到北山逃难去了。当时我才八岁，孤苦伶仃地留在村里，討飯混日子。我拉上枣棍，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一天要不下一块干粮，餓得我走路抬不起步子，瘦得皮包骨头。村上的穷乡亲们看我这样凄惶，去找“卡球算”說情，要他看在“亲戚”面上，把我管上。起初，他嫌我是个累贅，死活不答应。后来，他脑子一轉，对来人說：“要我养活他也不难，除非把那儿亩地带过来。”

狗改不了吃屎的性，財主总是要謀算穷人的产业，“卡球

算”又打上这五亩三分地的主意了。为了活命，我懵懵懂懂进了“朱家大院”。谁知他铁算盘一打，地归了他，马上把我送进“贫儿院”吃舍饭去了。

我十岁那年，他看我能做活了，便派人把我叫回来，给他当了小长工。十岁的娃娃，人小力单，能做多少事？他却什么活都要我干：放羊、喂猪、割草、烧火、送饭、看庄稼……那样做不到，都是一顿饱打。有一回，我割草回来，正在灶房吃饭。他嫌我草割得少，进门就打了我一耳光，接着把我手里的饭夺过去，倒给狗吃了，还怒气冲冲地骂道：“我拿饭喂狗，狗还给我看门。你吃了饭，连草都割不了！”

在旧社会，咱穷人连狗都不如！在这个“亲戚”家里，我没到过一天好日子。夏天，我赤身子顶着毒太阳；冬天，光着脚板在雪地跑。吃的是残汤剩饭，睡的是破草棚子。我挨打受气、作牛作马地干了六年活，“卡球算”没给过我一文钱，还说“白白养活”了我，你看多气人！

十九岁那年，我懂事多了些，心想：那五亩三分地是我大用血汗换来的，白白被地主占了去，咱做活不给工钱，还落了个“白白养活”，越想越气，越想越划不着账，便托人向“卡球算”去要地。

“卡球算”一听上了火，倒打一钉耙说：“娃心瞎了，把你养活大了，翅膀硬了，倒和我要起地来了！”还说啥“虎养大了伤人”，要撵我出门。

我说：“我是在‘虎窝’里长大的，也不愿在‘虎窝’里再停了。”

我出了“朱家大院”，二次托人去要地。“卡球算”尽做亏人事，在村里人人憎恨，他占地不给，人们指着他的脊梁骨骂。他为了护住“面子”，又想出了“强夺不如巧取”的诡计来。他一面把地还给我，一面又串通了伪保长“黑毒虫”向我要“皇粮”，说我种地多年不纳粮，应该受罚。真冤枉人，这地刚刚要回来，“卡球算”种地多年，打的粮食全倒进了他的囤，他不纳粮，为啥向我要？伪保长受了“卡球算”的“黑拐”，才不跟你讲这些理呢！他把几年的“皇粮”一下算到我名下，立刻逼着要粮食，没有粮食，就要折去二亩地。我连嘴都混不住，哪里来的粮食呢？

有一天，“卡球算”引着差人来了，指着我对差人说：“粮你向他要。他不给，就把他拴走。”

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借了两块钱给了差人，才没被拴走。

晚上，“卡球算”又来了，好像在替我着急，对我说：“唉，穷人脖颈没犟筋，你把地卖了，把粮交了，就没事了。”

我没答理他。

“卡球算”放了火，又泼上油，支使差人三天两头来敲打我，这个弄了几个钱走了，那个为了弄钱又来了。我越想越不是事，“皇粮”一颗少不下，先喂不饱这些狗。旧社会就没个穷人讲理的地方，我一张嘴，人家就动武，捆绑锁拴，往“黑庭子”送。没办法，咱只好鼓着肚子，含着眼泪，在人家早已写好的卖地契约上盖了指印。契约上言明由买主代我还清“皇粮”，后来才知道，“卡球算”一颗粮也没有纳，原来是和伪保长串通一气，敲我的竹杠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到底夺走了我

的二亩地。

地少了，一家人的日子更难过了。我 只得“吃百家饭，做百家活”，卖工度日。一年忙到头，糊不住口，还背了一身债。说来真气人，我卖工挣不了钱，还倒找人家钱；这是财东为我那剩下的三亩三分地，使出的鬼门道。

一九四二年，我给富农朱先荣做月活，言明每月工钱二十八元。月初，屋里没吃的，我找这个富农商议，用我的工钱按照当时的粮价，从他家里装了四斗玉米。到月底算账时，粮价涨了一倍，富农翻脸不认账，说是我的工钱只够装二斗玉米，另外那二斗玉米要按涨价折成钱，算作本，加上驴打滚的利，到年底，本赢利，利作本，倒欠人家一石粮。我还不起这笔账，富农逼着我立下契约，写明第二年夏季连本带利要还他一石五斗小麦，并以三亩三分地作抵押，他才放我回家过了个年。

第二年，地里打了三石麦，碌碡一卸，债主们纷纷来到场里，把麦子装了个光，连一簸箕麦糠都没有留下。富农朱先荣迟来一步，没有装上麦子，手里拿着口袋生气地骂起来：“你红口白牙吃了我的，如今不还，想咋的？”

当天晚上，朱先荣便着人来催账。好话说尽，才限了我三天期；到期不还，就要夺地。我一个穷光蛋，哪里能想到办法？三天期到了，只好把三亩三分地抵了债。

为了这五亩三分“锡粮地”，我何家两辈受尽了折磨，受尽了气。到头来，还是落得家破人亡，财净地光，一家人为了活命，被迫东逃西散，各奔前程。

穷 妇 恨

侯云侠

在旧社会，黄连有多苦，穷人就有多苦，咱妇女的苦，比黄连更苦。我老家住在商州，家里穷，被地主逼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我三岁那年，父亲挑着我逃难来到咱富平的怀阳城。怀阳城是个地主成堆的虎狼窝，村里的穷人，不是给地主纪建堂那些吃人的恶鬼拉长工，就是佃种他家地。我父女俩一落脚到这里，就成了人家的佃户，租种土地维持生活。那当儿，妇女是不下田干活的，我看到大累得不行，就成天跟上我大担呀、挑呀，什么都干。到十五岁上，挑水、磨面、喂牲口和地里的一般活儿，都能干了。一看见我大腰驼背弓的身骨，我就心里一阵难受，把内外的活都承担起来，好让他来歇歇。我大被地主折磨得力尽气衰，他看着我慢慢长大了，能顶门立户了，准备给我招个女婿，指望我养老送终。

偏偏在这个时候，从天外飞来了大祸。怀阳城的地主为了向官府衙门买好，给伪县保安团的副团长王奉元递了个话，说我年轻长的好。王奉元立刻起了瞎心，派人要买我作丫环。天哪！只有这一点子骨血，我大咋能依从呢？给人家磕头作揖，把话下尽了。咱当时年幼，不省世道，心想我不去，你能把

我怎么样。可是，王奉元家里有大妇小妾，长工伙计雇了十几个，在庄里镇北乡称霸一方，又在县上作大官，手下那穿“黄皮”背“盒盒炮”的，一来就是一长串。他们放出话来，允了就好，不允就要抢人。眼看骨肉要分离，我父女抱头哭的死去活来。他们却像阎王催命似的逼着要人，一个刚走一个来，任你父女不从，有啥办法呢？三石麦子和五个光洋硬往我家一扔，我便被拉进了王奉元的家王家庄。

谁晓得，地主恶霸的诡计真多，心肠真是坏，我一进门便被王奉元糟踏了！在这虎狼窝里，哭天天不应，叫大大无声，我的心像刀绞一样，多么想见我大一面，诉说我的委屈呀。但是，“收来的丫环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人家咋能叫你离门一步。打这以后，我便掉进了阴森森的魔窟里，把个人活活逼成了鬼。

王奉元的父亲，是个吃喝嫖赌惯了的恶棍，晚年得下了瘫痪症，吃喝屙尿都要人来侍候，这件事便成了我的顶门差使。这个死猪懒重的家伙，要我喂吃喂喝，背出背入。成天背上他上茅房呀，晒太阳呀，哪里有热闹事，也得背上他观光。夏天，把他背出来放在凉亭底下的圈椅上，咱站在一旁不住手给摇扇。不需要摇扇了，就端上一把茶壶，直挺挺的站在椅子旁边，但见老东西张口，赶快递壶到他嘴边。

任你有满肚子的怒火，那敢差错一点，怠慢一步？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个脸盆沿打碎了二寸长半寸宽一个小口儿，便闖下祸来，王奉元他妈那母老虎眼一睁，大喊一声，喝令咱跪在那个小小的脸盆里。盆子那么小，底儿那么圆，怎能跪得

下，跪得穩；向左边一倒，母老虎的皮鞭子打来；向右边一倒，王奉元他哥手中的棍子搯过来。就这样一直折磨了我半夜，他們也打累了，还是沒有跪端正。他們又想了处治的法子，拿来了一些碳碴，讓我挽上褲腿跪在碳碴上面。这碳碴滿是尖利的楞楞槎槎，向上面一跪，就像百把錐子扎，就这样直跪到天明，两块碳碴被血染紅了。

地主惡霸心眼比蠍子还毒，比狼还惡，对咱穷人是杀人不眨眼的。有一回，我端着个盆儿，給王奉元他大送洗脚水，稍微走的慢了一点，王奉元的哥哥举起三条齿的鋼杈，狠命的照着我的脊背刺来，我当时沒有感觉到疼，只觉得渾身一陣子麻木，待回到房里，血把渾身衣服已經染紅了，渗透了。我的伙伴儿替我把衣服撕下来时，在我的左边膀子和后心窝里，露出了三个二寸来深的血洞。血洞止不住，血水流了一脚地。此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懵懵懂懂只觉得耳边嗡嗡地响。待我清醒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怎样来到隔壁瞎眼老婆婆的家里，她把我紧紧的抱在怀里哭。我只觉得心口一团火往上攻。这一鋼杈一下把我戳清醒了，我万分伤心地哭着，哭着。我对着自己說：“云俠呀云俠，你的眼太混了，掉到狼窝里，你不打狼，狼总会是要吃你的。”瞎眼老婆婆只是对着我流眼泪，想不出个好主意来。

他們既然使出了吃人的心，我还有啥求活命的念头呢？咱不能活活的等死。豁出头滾西瓜，我要和他們拚了。回去后，我躺在炕上，两天不吃他家一口飯，这飯是敲榨下穷人的血汗，我不能吃。疮伤疼的了不得，我不能站起来和他們講

理，便睡在炕上，大吼声的哭着罵着。

这哭罵声把王奉元从三十里外的县衙門里招回来了。一家人奈何我不得，要这个劊子手整治我这个“賤”人。王奉元进得房来，不問青紅皂白，从腰里掏出“盒盒炮”，对着我就要扳那“催命鬼”。眼看死期已到，什么也顧不得了，我心里一横，猛一下，抓住了王奉元执枪的胳膊腕，狠力向上一推，只听“砰”的一声，子弹穿过了天花板，把房頂冲了个窟窿。枪沒有打中，手腕不得脫，他急了，使出狠劲撕拉。我也想不到，两天沒吃飯，哪里来这样大的力气，拳头不住点的打在王奉元的身上，吓得这坏蛋东躲西閃。

这一枪打得好，一下喚来了十儿名伙計，还来了許多同心的乡邻亲里，大伙看見我被撕打成这个样，都被激怒了，一拥而上，围住王奉元講理，瞪眼睛，伸拳头，立逼着王奉元給我治伤看病。

看到受压迫的人这样心齐，我的胆子更大更壮了，心里亮堂了，我想，受折磨的不是我一个，有这样一群人，这群人擰結起来多好。你看，王奉元不是夹着尾巴跑了！这一次，我也看到了，地主就是欺軟怕硬，你軟了他把你踏在脚底下，你硬了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把你怎么样。看起来，只有和他干，才能拉出一条活命。

好，看你跑到哪里去。我一直赶他到衙門口，要和他干到底。咱知道“衙門口不为穷人开，有理无錢莫进来”，我不进衙門口，就坐在衙門前边那个张口大石獅旁边蹲着。直候到王奉元出了衙門，忙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扯到众人面前講理，

当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我冤屈的眼泪收不住头了，一串一串往下流。他一家所作的恶事，也一件一件从我口里迸出来，我哭着，诉着，骂着。王奉元当着众人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他跑回衙门时，扭过头来说了句：“走着看。”

气算是出了一口，可这天下是人家的，这条命咋样拉扯得出来呢？我回到王家庄上，没敢进村，在水窟边转了一圈又一圈，想自尽。可我又一想，我娘家没有哥儿弟兄，我这样死了，谁替我伸冤报仇呢？我大那么大的年纪，怎么办呢？不能死，我死了倒便宜了他们。我壮着胆子又回到这虎狼窝里。谁知我刚一踏进门，王奉元把他的勤务兵派回来了，跟着我左右不离，这明明不是要瞅空子害我么。正在焦急处，一个姓谭的伙计，悄悄给我递了话：“跑。”

趁他们没有防备，天刚黑，我溜出了城门，翻沟越岭。半夜时候跑进娘家门。哭得半傻了的大，抱着我这个蓬头散发的女儿，再有啥话可说呢？不住的哭着说：“娃呀，是我害了你！”

娘家没办法站立，他们是会找到的，父女商量了一阵，便借着亲戚关系，跑到集古村来，在这里埋名隐姓，单怕人家打听到我的底细。这时已经是临近一九四八年，咱们解放军的大炮在山里头响开了，国民党那伙当官作老爷的谋计着逃自己的狗命，再也没有顾得上到集古村来查访，捉拿。日子久了，我打算在这里成家立业。左挑右拣，挑中了王毕轩这个正在“朱家大院”拉长工的穷苦人。他家里只有半截破窑洞。成亲那天，衣服被褥全是借来的。毕轩上工做活去了，我在家里

吃的是清水煮野菜，住在这穷窝窝“人集”上，哪里能有好日子过。有人說咱痴了心，挑了这样个穷光棍。咱說，人穷咱不嫌，咱看上的就是他和咱一条心。

直到解放，苦日子終算盼到了头。

土地改革到了我們村

朱生福

“聽說快土地改革了。”

“穷人这回翻身可有个眉眼了。”

“你沒看啲一伙財东家，見了穷人臉上也帶笑紋了。”

“他們騎在咱們头上的日子过去啦。”

集古村的穷苦农民个个喜笑颜开，地主、富农可吓破了胆。

—

一九五〇年夏收，我給富农朱德福做日子活，这狗口的真鬼。有一天，場里碾了二十多石麦沒揚出来，天黑了，我还陪着他在場里揚麦。正揚着，朱德福給他弟弟朱德坤說：

“不揚了，算啦。人家小伙和咱說的是日子活，天都黑严了，咱还叫人家小伙給咱熬到几时去呀？”

我一想，对着哩，就順口說：“我也說嘛，該到收工的时候了。”

朱德福背起鋤，把我肩膀一拍：“不說了，走，喝茶去。”

我同他兄弟俩，走进他家，坐下来喝茶抽旱烟。歇了一

会，朱德福对我說：“兄弟，你喝飽抽足了，再帮一下忙，把大房底的扁豆給咱捐到后窑里。”

我想，出点力怕啥？放下茶碗，把旱烟袋往腰带里一插，就到大房底下动手捐扁豆。他兄弟二人拿着鍬，走出大門，到場上接着揚麦去了。

等我把十几石扁豆捐完，快多半夜了。我走出大門，到場里一看，二十多石麦子都沒影了，場里光光的，就朱德坤一个人在扫場。我心里很奇怪，就問他：“揚完了？”

朱德坤說：“借有风，全揚了。”

我想不通这鬼把粮食弄到哪里去了，我在他家，沒見他們往回捐嘛。

事后农会才弄清楚了：原来这家伙听到土改的风声，怕給他訂成地主成分，偷偷把粮食分了，他俩把麦子連衣服全埋在場房里。直到他們的富农成分定了以后，他俩兄弟才从場房里把粮食刨出来。你看，地主、富农的鬼点点就是多。

二

土地改革的风声越刮越大。我們这些祖祖輩輩受尽剝削、压迫的穷苦农民，成天盼着土改工作组下来，一个个眉开眼笑，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那些日子，村边、田畔到处在議論着土改的事情。人們一溜一串地跑到村政府，打問啥时候土改，工作组多会来？村干部們忙得更是团团轉，又是办农会，又是組織民兵……一天忙到黑，也不知道累。

土改工作组终于来到了我們村。那是九月的一天，我刚

吃过早飯，一群毛娃子就像老鸛窝里被人戳了一扁担，嘍嘍呱呱，亂喊亂叫地跑來報信。我忙放下飯碗走出來。毛娃子們一邊喊叫，一邊引着村里的大人擁向到縣城里去的大路上，迎接了一行七人的土改工作組。

土改工作組來后，就住在我們貧農家里，訪貧問苦，個別串連，宣傳政策，發動群眾，成立農會，組織民兵，很快就和我們貧苦農民結成了一團。

可是回想起當時那工作，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工作組沒來時，這個打聽那個問；工作組來了，動員窮苦人參加農會組織，有些人却叫不到場。

有的用好話推托說：“參加不參加都一樣，你們咋做咱跟着來就是了。”有的你對他磨爛兩片嘴唇皮，也是白擗，貧農白金錫、白金榮、楊柏林幾個人，在舊社會苦大仇深，可是，那陣却不願意來開會，勉強到會場，也不言傳。這些窮兄弟，真叫人把難作扎了。

到底是咋回事？仔細一查，原來村子里有股“妖風”在作怪，說什麼“中央軍從四川反攻過來了，已經到了廣元！”“國民黨來了，當干部的和當黨員的都要挨整呀！”“共產黨在這裡時間不得長，誰分財東家一畝地，將來要賠十畝。”

貧農朱應文，對他咋說都不加入農會。我知道他被人家吓唬住了，地主朱允生的女人對他說：“你是咱自己人，可不敢跟人家轉，中央軍還在秦嶺山里打仗哩，你胡鬧，他們打回來你該咋哩？”

有一天，我碰上了朱應文，就問他，“你為啥不入農會？”

他說：“入喇能咋？”

我說：“你心里有鬼，大概是害怕！”

“我害怕啥？”

“害怕中央軍回来。”

应文再沒言傳。

我接着說：“你爰邪听邪信，觉得喇是自己人，給你办事哩。你做梦！你原先給他做活，他說你成家时那怕掙断腰都要給你鼓劲，等你成亲时，他給你拿一文錢来沒有。”

朱应文还是不言傳，也不說入会。你看急人不急人！

干部們开会，工作组同志帮大家分析謠言，指出这是地主、富农的阴谋詭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我們腰干撑硬，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我听了这些话，心里亮堂一截子。本来嘛，土地改革，要消灭封建，这是我們跟地主阶级一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怎么能和和平平沒有斗争取得胜利呢！

开了会以后，工作组的同志和农会干部們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把报纸上的消息念給大家听，使大家認清了逃到台湾的蔣匪，不光永远不会卷土重来，他的命运还朝不保夕，消除了群众的顧慮。經過深入宣传教育，群众的眼睛也都擦亮了。正好，又传来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这些謠言一下子彻底揭穿了。大家气愤地說：“财东家才盼望老蔣回来哩！这都是狗养的放的謠言。”

三

謠言被揭破，地主、富农又要了新花招，想用小恩小惠收

买人心。

有一天，民兵赵聚才跑到农会，报告富农朱先荣的活动，他说：“朱先荣昨晚鬼鬼祟祟叫我到他家里去，我没去。不知道又想搞啥鬼。”

原来，这家伙想拉拢干部呢。前几天，富农朱先荣听说村主任赵茂林没啥吃，准备了几斗麦，捎话叫茂林去取；听说农会主席田春义栽蒜没有蒜籽，就打发他娃给春义送来蒜籽。地主分子也不瞎火，“朱家大院”“卡球算”的儿子朱允文亲自跑到农会，对田春义说：“只要不把我订成地主，把我河里畔树多伐下些，给咱农会修盖咱学校。”气得田春义教训了他一顿：“你的成分，按政策算下啥就是啥，用不着你献殷勤。农会的事不要你管！”地主分子，“朱家大院”“三桃桃”的儿子朱允年，还想用木料拉拢赵茂林。提起这件事，还有一段来历：

一九二九年遭了大年饑，茂林一家日子过不下去，奶奶不久又死了，地主逼着茂林大卖了房子又卖地。茂林大觉得对不起娃，对娃说：“丁有（茂林小名），你记牢，咱院里那十根木料，我在你朱立诚叔家寄着。过几年，等咱有了法子，再搭两间草棚，一家人好蔽风遮雨。”

不久，茂林和他大被迫上北山逃荒去了。几年以后，他们才回到集古村。这时“三桃桃”朱立诚已经死了，由他儿子朱允年继承家业。茂林他大去找朱允年要那十根木料，朱允年硬耍无赖，不给还不说，还要拉着老汉上“娘娘庙”“辩理”。气得茂林大拍着两手喊：“这是啥世道嘛！”木料也不敢要了。

到了解放后，茂林当了村的行政主任，领导大伙搞土改。

一天晚上，已是掌灯时分，朱允年悄悄来到茂林住的窗外，低声问：“丁有他大在家吗？”

朱允年进了窑洞，几句闲话过后，话头一转问道：“啥时把那几根本料给你搬过来？”

“啥木料？”茂林他大一时楞住了。

你看地主多狡猾！解放前求着要都不给，眼下穷人掌了天下，他给送上门来了。

茂林唬着脸，没好气地说：“木料，那是姓朱的，搬来做啥？”

茂林他大这时才想起来了，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

地主碰了个钉子，灰溜溜地走了。

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斗争情绪一天天高涨起来，农会像久旱逢甘雨的禾苗，呼呼呼地发展起来。大伙都憋足了劲，要和地主进行斗争。

枯树开红花

赵聚才

一九四九年春天，霹雳一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富平。从此乌云消散，青天露头，红艳艳的太阳照遍了家乡的山川河流，照遍了温泉河畔的集古村，祖祖辈辈受地主恶霸压迫、剥削的穷苦人，才得扬眉吐气，斗地主，整恶霸，闹翻身。

我一家受“朱家大院”地主和伪保长“黑毒虫”的迫害，家破人亡，东奔西散。我大流浪在外，整天求爷爷告奶奶的沿门乞讨。我妈领着两个弟弟，不知去向；至今没有音讯，可能被旧社会早已吞吃了。我呢，鑽进西村的山里，给地主拉了十几年长工，受骂挨打，忍气吞声地混日子。家乡一解放，我就大胆地扔下地主家的活，离开了西乡，找到了我大。我对他说：“大，现时解放了，社会变了，回咱集古村吧？”

我大满口答应：“对，‘好出门不如瞎在家’，有共产党给咱穷人撑腰，回去也不怕了！”

八月间，我和我大一块回到了分别十几年的家乡。刚一进村，男女老少的乡亲们，把我父子围了个严严实实。有的老人惊奇地说：“十几年在外没音讯，我当你们父子回家是没有指望了！”

有的邻居高兴地說：“这下咱們穷人可有活路了！”

你問这，他問那，熱鬧一团，真是乡亲们久別重逢，穷哥们相見，显得格外亲热。我和我大心里又是甜，又是酸，看着解放了的乡亲们，想起我媽和小弟弟，父子两个不住地抹眼泪。

你想，一个傾家蕩产，在苦水中熬日月的穷苦人，得到党的解救，获得新生，咋能不高兴呢？那年我已是二十七、八岁的大人了，一閑下来，就夹在娃娃群里扭呀、跳呀，由一个愁眉苦臉、不爱言传的人，变成爱說爱笑的熱鬧人了。記得有一次，我正領着几个娃，坐在場院里唱《东方紅》，一个同年同岁的相好伙伴听見了，老远就指着我喊：“真是我們穷人的天下了。聚才，鼓劲地唱吧！”对，我要唱《东方紅》，至死不忘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一九五〇年九月，土改工作组来到我們村，发动群众，組織了农民协会。

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农会决定召开大会，斗爭“瞎腸子”朱德才。会场就选在旧社会地主恶霸拷打坑害农民的“娘娘庙”里。

开斗爭大会的那一天，刚麻麻亮，“娘娘庙”就挤滿了前来参加斗爭大会的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显得格外有精神。当民兵把“瞎腸子”押进会场的时候，“打倒封建地主！”“打倒吃人肉喝人血的朱德才！”口号声喊得震天响。看到这个陣势，不由他不渾身打顫。我們看着“瞎腸子”那副松像，心里想，現在可不是你要威风、騎在农民头上拉屎拉尿的日子了，印把子在我們手里，你敢不規規矩矩！可是，当群

众叫“瞎腸子”向大家交代罪惡时，他却吞吞吐吐地說道：“我——我——我屋里有一点点剝削，不太多……”“都是我大手里的事，我不知道……”他詭辯了几句，群众的怒火就压不住了。

“朱德才放規矩些！”

“这不是交代，这是狡賴！”

“我們不要朱德才这样交代，我們要揭发，我們要控訴！”

赵茂林头一个走上台来，把这“瞎腸子”和他老子“三閻王”吃人肉喝人血的根根底底，都刨了出来。茂林的話还没說完，王德胜就跳上台来，控訴了“三閻王”夺走他家三亩六分宝地的罪行。接着，被“三閻王”父子害得家破人亡的旺儿他娘，一字一泪的訴說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老大娘越說越伤心，不由放声大哭起来。穷人心連心，会场里多少人都流下了眼泪。旧社会的苦，变成了仇恨，对“三閻王”和“瞎腸子”的仇恨，变成了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仇恨。这个声討地主阶级的大会，由早晨开到日偏西，誰也不觉得肚子餓，直到亲眼看見剝削鬼交械投降为止。

斗倒地主不久，一天中午，农会的負責人向我說：“聚才，下午在场里开群众大会，穷人們的土地要回老家了。”

我听了这話，喜出望外，心里乐滋滋的，痒抓抓的，像鸡翎扫着一样。像我这样拉枣杆、扛长工的穷光蛋，心里根本没想过土地回老家这回事。不是嘛，在旧社会里，不要說自己手里沒有錢，就是有錢，把錢堆成山，也难在地主手里买回一寸土、一片瓦的，还不是水里捞月一場空嗎？如今土地回老家，全凭

救星共产党和英明的领袖毛泽东。

太阳偏过了头。虽然是数九寒天，小北风吹着，可是来开会的都不觉得寒冷。我唱着没字乱弹走进会场，坐在人堆里，巴嗒巴嗒地抽着烟，单等着开会。

农会主任见人到齐，就走到一张条桌跟前讲道：“今天这个会不是别的，是我们穷人翻身的大会，从今天起，被地主夺去的田地、房屋、庄基……都要回到我们穷人家里来了。”

听到这里，会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互相递眼传意，欢喜不止。我的心里更激动，怦怦地直跳，但又立时平定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讲话人，静静地听他再往下讲些什么。农会主任接着念：“……赵聚才，被地主朱怀吉（“三闾王”）抢夺去的二亩半地和一亩三分老庄基，现在仍归原主赵聚才所有。另外，再分给赵聚才河里水地一亩零二，房屋三间。”

听了这话，我乐得心里开了花，这下子对了，沿门乞讨，无家可归的穷光蛋，也有了地种了，有了房住了，在人世上也能说起话了。真是解放区人民所唱的：“千年枯树开红花，如今土地回老家。”

我从农会主任手里接过黑字红印、写着我名字的“土地证”，不禁鼻子一酸，热泪盈眶而出，落在土地证上。当时我又感激、又气愤，悲喜交集。感激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重，气愤的是旧社会的地主恶霸，当权霸道，骑在穷人身上耍威风。

我记得，开罢会已经是鸡上架的时候了。我嘴里含着烟袋，脚下踩着风，像疯子一样，一个弯儿不拐，匆匆忙忙地往家



里跑。刚来我家不久的我老婆见我手握土地证，面堆笑容，欢喜若狂，还没来得及开腔问，我就把土地回老家的事儿说起来了。我老婆听得高兴，拍着双手蹦跳。

我大正在当院坐着，听见我在门口说土地回老家，“忽”地站起来，连拐杖都没顾得拄，低着白苍苍的脑袋，背绑着手，脚底下挺有劲地向我们走来，颤抖着银白胡须：“白天盼，黑夜盼，盼来了共产党才有今天。共产党、解放军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大从我手里接过土地证，好像见到宝贝一样，爱不释手。最后，他把头偏向我老婆，带着低沉、郁忧、沙哑的声音说：“淑芹，你过门不久，对咱那些地内情不大知道，我就给你大模说一下吧。地主‘三阎王’的老婆，生了个孩子没奶吃，托人来说和，让你妈妈养活。我和你妈答应了，也就把聚才的奶断了。那时，咱家的生活苦，日子过不前去，‘三阎王’就给咱装了二斗大麦。以后他娃长大了，能吃饭了，你妈才把他娃送走。谁知狠心的‘三阎王’一接过娃，就立逼咱还那二斗大麦。淑芹，你想想，吃了上顿没下顿，哪能还得起账？再说，这账也还不得，‘三阎王’不能一文不拿叫人家干给自己养活孩子呀？他们这些不讲道理的王八蛋，只图自己肥胖胖，哪管别人瘦干骨。做事光照肘子里弯……就这样，咱的地被人家财主，白白夺去了……”

说到这里，我大再说不下去了，只是从内心深处流出往事的苦泪。最后，我大强鼓精神，呵斥我们说：“有地种了，有房住了，安家立业了，好好的干吧！”

那天晚上，北风呼呼地吹着，繁星扑閃扑閃地眨着眼。我父子俩躺在一个炕上，翻来复去，一夜不合眼。我不时的打开窗子，探头向外看，只盼天快点明，好在地里轉轉。我大呢，不断地擦火抽烟，不断地点灯，翻看土地証，有时痴呆呆的，望着土地証出神。

第二天，东方沒大亮，窑里黑漆漆的，我怕惊醒我大，悄悄下了炕，摸黑走出窑洞。

我出了前門，上了东坡，直往那二亩半地奔去。我只顧低着头走，猛一抬头，从蒙矓中看見前边走着个人。“是誰呀？起来的这样早。”我心里想着，三步并作两步往前撵，越走越近，越看越像我大的背影，我心里有些奇怪，嘴里还是叫了声“大”，果然就是我大，老人家回过头来答应了一句。

来到地头，我大站在南墩，向北望了許久許久；他又弯下腰，伸出手来，使劲挖了一把冻得僵硬的土，散在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指头，拨来拨去，思想来思量去，心爱的不願放手。随后，他繞着田坎走了好几遭。我沒吭气，脑海里盘算着今后做庄稼的事。临回来的时候，我大輕輕地自言自語道：“‘三閻王’，‘三閻王’，如今土地再不是你的了。土地呀，土地，从今向后就要重新为我們穷人出力了。”

腊月二十九，要过年了，我家半輩子沒貼过对联，那天我特意跑到县城买了一张大紅紙，回村請了一个返乡学生写对联。

那学生說：“我会写，可不会編对联呀！”

我說：“不用发愁，我不要你編，我編你写就行了。”

学生展开紅紙，提起大毛笔。

我口里念着：“土地回家莫忘共产党，穷人翻身多亏毛主席。”

学生又問：“橫額怎写？”

“橫額嗎，就写上‘永不忘本’四个大字。”

风吹不散穷汉心

田春义

一

土改斗争胜利了，咱穷人高兴极了，一个个心里像鸡翎扫。但，不久又作起难来了：刚刚开始建家立业，虽说有了土地，牲口农具却七差八糊，每到收时种时，不由人发熬煎。我们西村几户翻了身的贫雇农，几乎又被人家拴住了。

我分了四亩地，没有牛，没有车，眼看要种麻了，没牛咋犁地？我在西村挨户看了看，就数上中农单安吉的牲口硬帮。心想借来用用，谁料刚一开口，他便说：“我也难哪，地多人手少，也不知要种到哪年哪月？牲口車輛一刻腾不出来，等到……”

“等到天凉了，再借扇给你，是不是？”他没有说出口，我心里这样猜。

我刚一出门，碰见老五王毕轩也赶来借牛，我把他挡住说：“别去了，离了狗屎也能种黄瓜。”

他见我生气了，知道在这个“狠人娃”家碰了钉子，便说：“节令要紧，有什么办法？”他还要我再去和单安吉“搞磨搞

磨”，用人工換牛工。我執意不去，說：“到王家堡、權家庄去看看有向沒向。”

一到權家庄上，碰見趙茂林正在給一戶中農鋤草。一打問，他是用三個人工換人家一個牛工，等到給人家把地種完了，雜活做光了，才能給自己種地。

茂林把我倆叫到一旁說：“這條路走不得，叫人家把咱捆得死死的，得另想辦法，不然，這樣下去……”

可不是嗎，這樣下去不得了。我和老五回到集古村，剛一走上王家堡，碰見貧農翟北京蹲在“娘娘廟”階梯上，抱着头嘆氣哩。問了半天，他只是直拍腿，後來才說：“咱盼來盼去，把共產黨盼來了，地也分下了。咱把地種不好莫說起，老跟在富農屍子後頭轉，咋對得起共產黨！”

事情是這樣：翟北京的伯叔哥哥、富農分子翟經信看到他分的地種不下去，洋洋得意地跑來說：“北京，你都是翻身的人嘛！胳膊腿都變粗了，還熬煎什麼！”北京不吭聲。他又說：“來，哥幫你的忙，把咱那頭大犍牛拉去用吧！”

北京上套了。不等把自己那二畝地犁完，翟經信跑來了，說：“說來說去，還是咱翟姓宗族親，從今向後，咱哥兒們可得互相照應了。”接着，他不叫北京卸套，趕上牛去給他家犁地。一直犁完地，種完麻。接着把担水喂牲口的雜活也給北京攔上了。北京覺得不對頭，這不是給人家又當了伙計嗎？心想撂手不干，又打不出圈套。就這樣被人家越捆越緊，成天受富農的擺布。自己地里的活也做不成。

我和老五一聽，又想了想茂林說的話，覺得不妙，得趕快

想法子。下了河川，来到新分的麻地边。老五是九分麻地，我是七分地。两块地紧紧连着畔。由于借不到牛，涸发过的地面已经干裂了。我俩对着这个情景发怔。

这回是我先开口，说：“老五，再不能等了，没有牛，咱们扛镢头挖吧！先挖你的。”

老五迟疑了一下说：“哪能行？我的地比你还多二分，挖毕咋……”

我没说什么，回去扛镢头。毕軒像是也有主意了，扛了把宽刃子“蛮镢”，抡得老高，挖得楞深。我们紧贴着身子，挖着挖着，觉得这样干起来怪得劲。毕軒突然开腔了，说：“联起来干活多好啊！啥时候咱们能联起来呢！”

“是啊！能联起来就好了！”我这样附和着，心里在这样想着、盼望着。

二

“要办互助组了！”

一九五三年春上的一天，一股春风在巷道传开了。接着茂林跑来对我说：“乡上来了通知，要开会研究办互助组的事，你和毕軒去吧！回来在你们西村先办。”

我和毕軒开会回来，把上级号召组织起来的好处一说，西村的穷人高兴地吼开了，三一堆，两一摊地交谈着，酝酿着。

和谁联在一起好呢？有的找穷伙知心的，有的找有牛有车的。我和毕軒是红辣子，不摘把，再联了两户贫农，组织了个临时性的互助组。全组共有一头牛，没有大车，其他像样的

农具也没有。但人心齐，劲头大，把生产搞起来了。

贫农周怀茂，本来要和我們在一起联，但当他姑母家送给他一头小牛以后，便被上中农朱光道、中农单安发拉过去，三户成立了个临时互助组。怀茂当时没看透人家联他是为了“装门面”，自己以后跟着中农、上中农，有牛有车，家具齐全，加入这个组还能得到点好处。但是，要拉粪了，他们答应先给周怀茂拉运。大车一上朱家墙大坡，就听见朱光道本家叔父、富农分子朱德文站在塄楞上飘凉的：“穷小子急疯了，光想吃甜头……”

这一说不打紧，朱光道马上不再给怀茂拉粪了，仅有的二亩三分地，肥没施满，便给光道自己拉。你说气人不气人，联组时只是三户，这时变成了四户，加入了朱光道的哥哥、上中农朱恩道。你们地多、肥广，一套上车没个了，怀茂陪上他们一直拉足三十多亩地的肥，种定了麦。这怎样划着眼？怀茂刚想提出来，光道先开了口：“怀茂，要不是我的牛大车美，你的麦还种不进去呢？”

这个临时组只起了“临时”作用，麦一种完，朱光道便说：“咱不想靠互助组吃饭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吧！”

中农组散伙了，周怀茂入了我们这个组。

吓！你再看我们这五户被人叫做“穷光蛋”的贫雇农，心劲可大哩！只有两头小牛，咱还舍不得多使唤，大半活儿凭人力干。冬季，就凭五把“地老鼠”手推車，黑地白日地推肥上塄。把窑洞的陈土刮下来，当追肥；把旧墙放倒，施麦田。鸡叫唤上地，满天星星下工。有一回，鸡刚叫头遍，老五把铁锨

在地里掄开了。朱家壩那伙地主、富农又唧唧咕咕罵开了：“穷鬼疯了，不要命了。”他們还給我們五个人都起了外号，把老五王毕軒叫“挣死驴”，把周怀茂叫“榆木根”，把我叫……。

地主、富农越叫罵，我們貧雇农干得更上劲。每次上壩去，都要穿过朱家壩，当一走到地主、富农門口，我們五个人就一併排走着，口里唱着“桃桃乱弹”：“不見烏狗心不恼，我一見烏狗心似火烧……”唱着笑着，看他們能把我們怎么样。

三

我們五戶貧雇农的互助組越办越好，吸住了不少人的心。这个問：“你們还吸收人不？”那个問：“啥时候全村都互助呢？”貧农官海亭更心急，牵上牛硬往互助組里挤。結果，集古村除了我們和赵茂林两个互助組外，官海亭又联合几戶貧雇农，成立了第三个互助組。

乡上的王支書，像是把大伙的心看透了一样，把十八村的干部，一下子集合到集古村西村来，要毕軒講互助合作的好处，要我介紹办組經驗。咱不会說啥，只講了兩句話：“独木不成林，单絲不成綫。”話一落点，王支書接上腔，要大伙学习五戶貧农的精神，要互助合作組織在全乡开花。

会后大伙表示态度时，翟北京喊得最响：“这一下，毛主席給咱指出了明路，西村做出了样子，再不受地主、富农的‘窝囊’气了。”

打这天起，集古村的西村里真熱鬧，今天你来參觀，明天他来“取經”。这哪里是取經，分明是給咱叫劲哩！你想嘛，这

多人看咱的样,要是組里再出个岔岔咋了呢?

偏不偏,岔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来了。

阶级敌人把咱摇不动,老天爷有意来示威。一九五四年夏收头一天,麦子刚刚割倒四亩,猛不防刮起了大风,麦穗被刮得直磕碰,眼看着就有落粒的危险。这时,翟俊民动摇了,他父子二人不再帮助别人干,夹上镰刀直往自己地里跑,我们喊也喊不回来。他父子跑到自己的麦地里,才回过头来,用手做了个喇叭,套在口上顺着风对我们喊了一句:“我们退组了。”

这一阵,我们也顾不了许多,还是人多主意稠,当即拿出来椽子、绳子,拉的拉,压的压,把熟了的麦子压倒在地,使麦子不再动摇、冲撞,顶住了狂风,避免了损失。

翟俊民一退组,全组仅有的两头牛只丢下怀茂这头小牛,困难更大了。这时,王支书闻风赶来,他给我们撑腰壮胆,说:“不怕,天塌下来,我们也得顶住。”当他试探性的征求我们的意见时,八只眼睛动也不动地瞅着支书,组长怀茂还像在四九年入党宣誓时那样,不自觉地举起紧握着拳头的右臂,坚定地說:“那怕风再大,把我們的心也刮不散。”我们三个人照样念了一遍。

这场风一刮,我們的心更齐了,亲热的像一家人一样。我和周树盈是单身汉,回到家没人做饭,毕軒的老婆侯云侠把这事承担起来了,赶时候把热腾腾的饭送到麦场上。她还带动怀茂的老婆子,上场做活。心劲大,没挂牵,一个更比一个欢。一头小牛拉不动石碌碌,我们輪着陪上小牛拉。牛拉累了,两

个人一帮，拉上碌碡轉。这场麦算是碾打出来了。

退了組的翟俊民哩，人少力单，沒有抗住这场风，地里落粒不少，場上活完的比我們迟。看看互助組还是原样，他父子跑来寻我們，又是道歉，又是表心，后悔的了不得。

夏收以后，随着組織“联組”的浪潮，三个互助組联合成立了一个大互助組，西村除过上中农朱光道一戶外，全都卷入了我們这个常年互助組，翟俊民回到家里，把牛又拉进了互助組。

打掉歪风

赵茂林

一九五三年冬里，政府为了保证人民生活，不准私商和富农投机倒把，破坏粮食市场，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那阵子，我是村行政主任，和村干部们从乡上开会回来，召集群众开会，给大伙传达政策。

我把统购统销的好处刚说完，大伙就讨论开了。贫农朱生福说：“党的政策真是朝咱心眼上来的。旧社会，奸商、地主、富农倒贩粮食，一家发财，百家倒台，坑害了多少人！我家过去就是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

他的话还没落点，火性子翟北京呼地站起来说：“这话对。如今，就要照党这办法做，把这条资本主义剥削路子卡死。要不，咱贫苦农民这身就翻不稳妥。”

大伙从心底里拥护政府的决定，说着当场就要报出售余粮的数字。

富农翟经书、翟经信兄弟两个，不知道啥时候钻进了会场，藏在墙角里抽旱烟。翟经信贼头贼脑地，从眼角里往外瞅

了一陣，慢慢站起身來，嗓門擦得高高地說：“共產黨為國為民，一點不假，這政策，我雙手擁護。咱日子雖說緊扎，可‘支援社會’，人人有責嘛，咋樣也要省下些。”他清了清嗓子，沖着我“大方”地說：“趙主任，給咱登記上：麥子二斗！”

場子里響起一陣噯噯聲。

貧農田春義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哼，裝洋蒜。才賣二斗余糧？老狐狸！”

我立起身，對大伙說：“今天咱們不報數字，各家回去合算一下，明天再說。”我瞥了一眼翟經書、翟經信兩兄弟，補充說：“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對不對？”

大伙齊聲說：“對呀，各家啥底子，誰還不亮清！”

會散了，好幾個貧農圍上村幹部，指點着富農的後背說：“呸，可是跟咱長得兩個心眼，嘴上說的甜，懷里揣着刀。咱得提防着點。”

翟經書、翟經信這兩個富農，又狡猾、又毒辣。人常說：“蝎子尾巴馬蜂針，最毒不過財東心。”解放前，翟經書當家，在村子里雇工放債，吃窮人肉，喝窮人血，毒到害死過自己的侄兒。翟經信更仗着他大哥在國民黨胡宗南手下干事的威風，跑天津，走上海，做生意牟取暴利。回到村來，夏天穿着綢衫子，冬天是毛毛領的皮大氅，還戴着墨眼鏡，佩着武裝帶，真是商不商、農不農、軍不軍、民不民。解放後，他面面上不敢胡擰刺了，身上換件老土布褂子，出來進去手里掂把鐮，像是多愛勞動呢！可暗里雇長工、叫短工給他種地，自己見天胡串，投機倒把。糧食一上市，你看吧，他鷄鳴溜出去，半夜溜回來，成

天不歇套，四鎮糧集，就數他忙，哪一年不摟個幾十石。就說他家里吧，七十多亩好地，打得糧食自家吃的只是零頭，要說他家沒余糧，鬼才相信。這底子，群眾一清二楚，賣余糧，他兄弟兩個是大頭兒。

工作組同志說得對：“統購統銷，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場階級鬥爭。階級敵人不光不會老老實實地賣余糧，還一定會破壞黨的政策。”

二

果然，事情照預料的來了。

一個貧農氣呼呼地找到村幹部說：“那天會開畢，我看見翟經書回到家里，把大門‘咚’地一關，震得門樓上的胡基蛋蛋嘩嘩往下落，還狠狠地對他弟弟說：‘哼，統購統銷，淨是掛羊頭賣狗肉，誰願意誰換戳去！’這東西心不死呀！”

還有一個貧農找到工作組同志說：“這兒晚，我在他家牆背後，總聽見里头有響動，燈影子忽忽閃閃，還有人細聲細氣地說話。我看，保不准是半夜里藏糧，再不就是打算往外轉移。他家有兩個地窖，少算也能藏個上十石。”說着，氣得拳頭都能攢出水。

工作組同志勸大家要冷靜，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群眾發動起來了，賣余糧的熱情真高，天天有人找會計、尋村長，這個報一石，那個報八斗；特別是貧下中農，不管是多是少，咱一聽就知道是實在的。

富农呢，假惺惺，来的遍数也不少，可总在一斗半斗上打轉轉：“會計，咱再献上一斗，連前共是三斗。光菜粮嘛，腰带再勒一勒，应该的！”

你看可恶不可恶？政府要他卖的是余粮，他偏說是要他勒腰带，叫人听了，真想上去給他两耳光。

一天，工作組同志和村干部們一起，找富农談話。翟經書迈进門坎，就点头哈腰地說：“咱村工作搞的不差呀！这可都是諸位的功劳，見天沒黑沒明，为群众服务，真够辛苦了！”

“用不着你給戴高帽，还是給你自己多操些心吧。”工作組的同志真有耐心，給这个富农翻来复去地講政策，渠渠道道全都說到了。

翟經書挤眉弄眼，連声說：“知道，知道。哎，同志，咱也多少認得几个字，訂了一份报，天天看报哩！党的政策，咱都知道。不說这陣，沒解放，我对共产党就有認識，共产党真是一心为国，大公无私。解放前，咱叫的剝削，实在呢，唉……这几年，村里人知道，我实心务农，叫咋就咋。群众对咱有些不爱，都只为咱有点犖性子，实在呢……”

田春义一旁早就憋不住了，打断他的話說：“快把你咧狗屎收拾了。还不老实！截脆些，就說你咋卖余粮。”

“对，对，咱还能不积极卖？能俭省的，咱都卖了，會計那儿有数字。你想嘛，粮食卖给国家，票子揣到自己怀里，又方便，又保險。粮，咧是个粗笨貨，不好挪动，要是有个事变……”

“你說啥？”

“噢……，我說，是这样，实在不行了，还有三斗綠豆呢，本想春上娃們上学要背饅呢。算了，不給他吃了，也祟了去！”

我看时候大了，对他說：“你还是老老实实，別想混，先回去吧。”

他忙抬起身子，走到門口又回过头說：“这下可实在沒有啦，一顆也沒有了，底子都刨尽了！”

我說：“这話你先不忙說。”

翟經書一走，早在外头听着的几个群众涌进來說：“哎呀，咧是本性难移，恨不得逮住党的干部戳几刀。跟他說那些道理，白費唾沫。”

一个青年生气地說：“干脆来硬的，搜！”

工作組的同志挡住說：“那不合政策。大伙沉住气，咱話說到，路指明，由他挑选。”

三

群众呢，那股热情真叫高。送粮的車天天不断，又打鼓，又敲鑼；車上插着旗旗，牲口头上系着紅纓；小伙子們鞭子用得啪啪响，心都要开花了。沒有多久，全村就卖了十来万斤余粮。

富农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村干部和工作組同志找他們談話沒遍数，到头还是跟牛筋一样，要么挤牙膏，要么死不开腔；嘴上不言传，心里咬牙呢！

一天，下中农王振海跑來說：“我在庄里鎮上，見翟經信拉着七八袋子粮食，朝鍾家堡子赶，必定是把囤在庄里的粮食往

他妹家藏呀。”

貧农朱生福也反映說：“我見翟經信在县城里搞黑市，高价出賣粮食，看情形至少賣了两三石。”

沒过几天，一个群众又气呼呼地找工作組同志說：“富农轉移粮食哩！今早天不明，我听见門外咕轆咕轆响。心想，这么早，誰做啥呀？跑出去一看，是一架鉄轆轆大車，車上裝得滿滿的。我問：‘是誰？’半天不听言傳；又一問，才应了声。我听得真真的，是翟經信的声音。我說：‘你做啥呀？’他怯生生地說：‘給庄里鎮拉些稻草。’鬼东西，哄得了誰？稻草底下明明是粮食袋子！”

不光是这呢。有一天，从南边村子里来了一个中年汉子，要找村干部。这人叫王新民，大伙都認得。他虽說解放前給翟經書、翟經信拉了多年长工，受尽了剝削，可解放后思想有点不清楚，被富农用一些小恩小惠蒙蔽了。他找到我們村干部，气呼呼地說：“翟經信这狗日的，太毒了！前几天，我在城里集上見他渠黑市粮。他一見我，馬上亲热地說：‘嗨，賢弟，这几天，你怕日子紧吧？沒关系，嚟，給你两斗，先拿去吃。錢，我这儿不缺，你就不給了。’偏不偏，那几天我就是揭不开鍋，正做难哩。也怪咱心里一时糊涂，接下了粮食。誰知背回家里一看，淨是些瞎瞎麦，霉成青的啦！看这东西可恶不可恶？硬是把麦子往坏里攔，糟踏了也不賣給国家，还拿到黑市上去坑害人！”

这些只是我們掌握的一部分情况。階級敌人是狡猾的，又是些笨蛋。人常說，雀儿飞过去也有个影影，他再狡猾也逃

不过群众的眼睛。可是，他们自己还以为做得顶严实，谁都不知道。一天到晚，神气大的太。翟经书站在街门儿上，见人来了就说：“说没有了，还总是不相信。政策讲的不伤口粮，这阵口粮都快卖完了，还是逼。春上叫人咋活呀？”

翟经书的婆娘趁势把娃打得哇哇叫，故意喊着给人听：“哭，哭，掐死算了，牲口料都快完了，还拿啥给你吃！”

村里人听了，一个个咬牙切齿。

还有更可恶的事呢！一天清早，村长刚起床，翟经书突然来找他，说：“村长，你昨晚叫我想呢，我想通了！”

村长开头还以为这人脑子转了过来。问他：“好嘛，你准备卖多少余粮？”

谁知这家伙却放了个狗屁。他恶狠狠地說：“要粮必先减口，我想把牛娃日塌了，省出粮食卖给国家。”

村长說：“叫你卖余粮哩，你把牛弄死做啥？不种地了？”

翟经书說：“哎，我是說我那小孩，他名字叫牛娃。”

村长一听着了气：“政府叫你卖余粮，誰叫你杀人哩！我看，你是死心跟党对抗哩！”

群众知道富农倒卖粮食，破坏統購統銷，誣蔑党和政府，都气得冒了火，三五成群地找工作組、找村干部，要求整治这两个不法富农。田春义說：“我看得开个群众会，斗他一头子。”翟北京也說：“对，不斗争，把咧邪气打不下去！”

我們村干部把材料查实以后，經過請示乡上，决定召开斗争会。

开会那天，人可多了，老年人拄着手杖，妇女們抱着娃娃

也来了。大家一件一事实摆出来，揭露了这两个富农的破坏活动。翟經信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承認說：“都是实，我知罪。”

群众質問他：“你說，为啥要破坏？”

“这，都怪我学习不够，認識浅。往后要好好向大伙学习。”

“胡說！”田春义站起来，“明明是階級仇恨不消，資本主义的阴魂不散，看到咱貧苦农民翻了身，你再不能压迫、剝削了，对新社会怀恨在心。告訴你，要想翻天，一万个办不到！”

群众斗争了这两个狡猾阴险的富农，打掉了他們的歪风，可是階級敌人并没有完全投降。大伙都說：“这次給咱上了一堂階級斗争課。建設社会主义还有階級斗争，咱們千万不能忘記！”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朱生福

一

“馬尖角成立了初級社！”

这个消息像风一样，飞遍全村。田春义对王毕軒說：“要轉社呢，不轉社咱穷人挨到啥时候去呢？”

轉社，咋个轉法？村里有个宣传貫徹婚姻法的干部周同志，大伙就要他领导办社，可他难为情地說：“领导要我来宣传貫徹婚姻法的，咋能领导办社？”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党指出的，你是党的干部，你不领着干誰领着干？”大家看他那个难为情的样子，又对他說：“至于乡上，这好办，我們去說。”

村主任赵茂林到乡上开会，見了支部書記，一說轉社，支部書記就笑嘻嘻地說：“那就讓周同志帮着你們干！”

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早已鑽到貧、下中农的心里。加上在互助組里，少車沒牲口的穷苦人，还受人的限制，又吃了不少亏，早就想轉社。一听说轉社，都来要求入社。

头天黑里，村主任传出話来：第二天早飯后报名入社。

第二天，东方刚放亮，天上还有星星，場上的人就嚷嚷开了。人們等了一陣子，只見抬来了一张桌子。貧、下中农馬上把桌子围了个风雨不透。这个喊：“把我写上。”那个喊：“把我写上，我来的早！”共有三十四戶报名入社，貧、下中农就有二十九戶。

人劣牲口弱，农具也不硬帮，地主富农就笑話我們。有一次，我們往地里送粪。我和富农的儿子朱維义打了个“头子撞”。他看社里的牛瘦，可跑的挺快，就笑話我們：“农业社就是快，牛的脊梁杆子比刀子快，牛尻子比錐子尖！”說罢，大笑一声，鞭子一响，車嘩的一声从我身旁擦了过去。我把牙咬的格崩崩的，恨不得上去打他两巴掌。

地主富农，把农业社看成眼中釘，一有空就想破坏，有一天晚上，我在飼养室里，突然听見“噎！噎！”的声音。天黑的像墨泼的一样，这么早，誰起来打胡基呢？我跑去一看，是富农朱德坤在剥椿树。我生气地問：

“你干啥？”

“家里沒柴烧，挖点树根！”

“这明明是椿树，哪是树根，你的眼窝瞎了！”

“……”富农沒啥說了。

“国家叫植树造林，你来破坏，走，寻队长去！”

我押着富农走。这时富农朱德福也从西沟里鑽了出来，也背了一籠小树，我一見，火冒三丈：

“你兄弟俩，真是想把我們农业社連根拔了，走！”

我押着他俩寻干部。后来一查，社里茶碗粗的树全叫这

两个富农给挖了。群众知道这事，就开会斗争，揭露了他们的罪恶活动，直到他们认罪赔了损失才罢了。

二

入了社，大家的干劲大的很。男人干活下力，婆娘女子也泼住命干，都互相比赛，看谁干的多，看谁干的好。社员们都关心社。贫农王毕轩，有次到地里去，看见地上有一堆牛粪，粪蛋蛋就是麦颗颗，他蹲下来，用手掬着摺到地里去。

又有一回，天没明，王毕轩就起来打门叫户，拉牛套犁。到了地里，天还黑呼呼的，看不见犁沟，等天亮，这浪费时间；不等吧，又犁不成。人急生智：“回家取几个手电筒来！”

“拿手电筒咋行？一手捉犁，一手掌鞭拉牵绳，咋样捏手电？”

“活人叫尿憋死了，把手电绑到牛犊角上，不就行了。”

大家说着，笑着，拿来了四个手电筒，一个牛犊角上绑一个手电。刹时，眼前都是一根光带子，把地下照得亮堂堂的。

人常说，从小看大呢，从这两件事上，你就能看出大伙的劳动热情来。

社员干劲大，活做的细，庄稼长的好。头一年麦就长得嫩的太。秆秆粗，叶叶宽，穗穗大，谁见了谁喜欢。那年收麦的时候，大伙干的更欢。有一天，我和大家一起运麦，我们村子在个半坡上，沟多路不平。在我前头走着个车，走得慢腾腾的。赶车的是个老汉，叫朱怀春，是个富裕中农，车上坐着一个老婆，是他的女人。走着走着，一个车轮上了个坎坎，车一

偏，“垮”的一声，車翻了。老婆被摔到地上，两手揉胯骨，哭着叫着，老汉围着車轉，干急没办法。我一看，事不对，就赶紧往眼前跑，很多社員也撂下活計，赶来帮忙。扶人的扶人，搬車的搬車，不多会儿，車扶正了，麦装好，牲口套好了。我把鞭子拾起来，交給老汉說：“叔，你吆吧！”

老汉眼里含着泪說：“农业社的人真好！”

农业社的打麦場和朱怀春的場挨着。有一天，早晨天晴得淨淨的，大家都攤了場。一吃晌午飯，天变脸了。先是风，接着烏云从山尖上向头頂涌来。我們社里赶紧起場。不多时，就把場揚出来了。这时候，雷在头上发威，格炸格炸乱响，滴开雨星了。朱怀春的場上，还是他老俩口，孩子小着呢，帮不上忙。他老俩口卸了牲口，可是，只有两把杈，忙得团团轉，只恨少生两只手，把場起不起来。这时候，社主任赵茂林大喊一声：“快帮老汉起場！”我拿了一把杈，急跑过去；大家也都拿起杈，帮老汉干起来了。三捶两梆子把場起起来了。接着又趁风把麦揚出来了。云翻滾着，雷轟响着，真怕人！我們把麦装好給老汉刚捐回家，銅錢大的雨点跟着来了。

老汉对老婆說：“狗娃媽，端喝的来！”

我和大伙都說：“不渴不餓，不要麻煩了！”

老婆端出来白蒸饅，提着釀茶。老汉說：“快来喝点，沒你社里帮忙，我今个不得了，一年的辛苦，就要飄洋过海了。”

老婆站在一旁說：“我叫你入社你不入，你看农业社对咱多好，用啥报答社里的恩情！”

老汉有点羞愧，把烟鍋嘔得吱吱叫，停了一会，認真地說：

“下半年，我一定要入社！”

我听了这话，也高兴地說：“我們就是要走一条路，坐一条板凳！”

說着，老汉哭了，他說：“我管了外，管不了内，車要我赶，水要我担。我六十多的人了……”越說越伤心，抱头痛哭起来。我們都紛紛劝老汉：“入了社，你有多大的力气，干多大的活，就不用受这份罪了！”

說着，劝着，老汉又笑了。

三

单安吉是个富裕中农，一建社，就跟着互助組一起入了社。可他的哥哥单安財沒有入社。有一天，单安財到飼养室把单安吉的牛拉去耕地。飼养員单安发攆到地里：

“你拉牛，給誰說來？”

“这是我的牛，还給誰說呢？”

单安发看事色不对，話也就硬了：“安吉入了社，牛是社里的，你拉不成！”說着，就拉过牛缰繩，要卸牛。一个要拉，一个不讓拉，嚷开了。

这时，我攆到跟前，田春义也赶来了。田春义說：“随便拉牛不对。社外人，要用社里的牛，也可以，得先招呼一声，牛喂飽了沒有？牛飲水了沒有？不招呼不对。”

单安財知道理亏，可嘴还硬得梆梆的：“我拉我的牛，要給誰招呼？”

我气得鼓鼓的，就說：“这是社里的牛。”轉过脸又对单安



发說：“把牛卸了，拉回去！”

社里人众，順順当当把牛拉回来了。

单安吉知道这事，就去寻队长官海亭說：“我要退社。我入了社，我哥連个牛也不能用？”后来又找到社主任赵茂林。茂林連批評帶劝地說：“你入了社，牛作价，这牛就是社里的，不是私人的。当然，社里的牛，社外的人不是不能用，但用也得招呼一声。这牛是你的，别人不給你招呼，还能用嗎？你是个明白人，若果人人都像你哥一样，社还能办不？”

一席話，說得安吉低下了头，也不提退社的事。他原先觉得入社吃了亏，所以鬧了这个别扭。后来，社里年年增产，他的收入也增加了，也就爱社了。

有一天，我去动员中农赵忠厚入社。我給他講組織起来的优越性，嘴唇都磨破了，而人家脸平心靜，对我說：“賢侄，你知道个啥，你哄我的啥呢？入了社，啥也不自由了！”一句話，說得能把人气死。

一时說不服，那就再等上一年。一九五六年是大丰收，一个劳动日二元五角，粮食分得屋里沒处放。一些单干戶眼紅了。赵忠厚又找到我的門上，他說：“賢侄，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一年累到头，也沒赶上农业社。你給社里說說，把我收下。”我給社里一說，大家都同意。老汉的申請書一递上去，就被批准了。他高兴得把扣子一解，亮了亮黑紅的胸膛，說：“我的心亮了！”

中农赵思明还是不入社。我觉得自己是个貧农，有責任帮助中农朋友进步，我就到思明家去說服。

我說农业社好，他同意；我說单干不好，他也不言声。說了个七七七，談了个九九九，問他：“那你入社吧！”赵思明說：“不是我不想入社，是你大婆不願意。我一入社，把老婆能气死！”話說不进去，我就走了。

回到家里，觉得应当繼續說服，不能見了困难退着走。一个下雨天，我拿了些茶叶，去找赵思明的母亲。老婆見了，喜孜孜地說：“啥风把俺娃吹来了！”

“我拿茶叶报大婆的恩情来了！”

“噢！俺娃在旧社会里凄惶地，一天沒处睡，老在大婆这里睡！”

老婆搭起火。茶煮好了，一边喝，一边就和老婆談起来。等一会，老婆起来給牲口去拌草，我說：“大婆，你年紀那么大了，該歇歇了，还一天喂牲口！”

一說喂牲口，老婆来了劲：“思明一天忙的鬼吹火，我能不动弹？我这份罪不知受到哪年哪月。”

我接口說：“忙不过来，还不如入社。你看农业社，牲口合槽，省操多少心！”

“社就是不錯。”

“那你咋不入呢？”

老婆把手一拍，說：“咱土拥到下巴上了，管得了那么多事。只要人家俩口願意，咱有啥說的！”

后来，赵茂林他媽去劝老婆：“咱的有（赵茂林的小名）过去能干个啥，現在說句話，誰个不听。今年分了六七百元，十一石麦，要咋呀！”一席話，說得老婆心热眼紅了：“他不入社，

我也要入社！”

隔了两天，我给社里卖豆腐去，思明去推炭，两个人走在一堆。我又抓紧作工作：“你推炭，谁给你种地！”

他生气地说：“我也没分身法，推炭咋能种地？”

我说：“你看我，担着卖豆腐，屋里自有人种地。”

老汉说：“你再甭宣传农业社的优越性，我明白了，我入社呀！”

我高兴得想表扬他几句，还没找到词，他又说了：“我的腿有病，可不下藕地，不出去卖菜。”

我大大咧咧地说：“藕地有人下，青菜有人卖，你不去就不去！”

“你可给我把话说到。”老汉又紧嘱咐了一句。

“没问题。”我应了一句，扁担就压在肩上闪开了。过了小坡，他跟我走上了大道。

穷棒子办了个王牌社

赵茂林

一九五三年，我們获得了好收成，就拿互助組的朱应武来说，以往一亩地只打四、五斗粮食，这一年打了一石麦。这以后，不少人都自动要求加入互助組。互助組很快扩大了，不久又并为五个联組。

但是，互助組虽然人多力量大，集体做活快，仍然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地多牛大的人喊吃了亏，地少人多的户觉得出了力气，誤了时机，并没占便宜。矛盾很多，新的問題也很多。我們正为这事发熬煎，区委派来了工作组，宣传建立初級社。三十多户貧下中农挤在窑里商量，有几户中农也跟来观风色。只討論了两个晚上，多数人成了一口腔，都说：“同意轉社。”几户中农也被这股热劲卷进来了。看着大家齐心的劲儿，有人提議社名叫“齐心社”。

一九五四年春，新的困难又来了，粮食不够，社刚建起，八字还没见一撇，哪来的粮食？不能解决粮食問題，社又难巩固。我們几个干部正急得沒法，有几户本来有粮的好中农也跑来要口粮，有的还拉牛退社，鬧了个烏烟瘴气。

正在不得开交处，区委書記来了。他說：“人总不能叫困

难吓倒呀！那样凶恶的阶级敌人，都被我们斗垮了，难道还能在这个困难面前退却？”不，我们并没有退心，不过眼下这个困难怎么解决呢？区委书记提醒我们：要教育群众认识目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同克服困难。我们几个干部在一起开了个会，把意见统一了，办法拿定了。会后，马上在全村开展了互助互借的救灾运动。一户一户动员，一家一家安排。

在这个节骨眼上，政府又给咱发放了两万斤救济粮，我们感激的要落泪。救济粮怎样给群众发放呢？干部开会一商量，一口腔说，要发放到最困难的社员手里。干部中“断顿”的也有好几个，但是谁也不考虑自己。发放以后，剩下九升粮，干部推来让去，都不愿要。最后，田春义把粮食送到我家来了。田春义自己呢？我到他家串门，问到家庭生活情况，他老婆叹了口气才说：“几天啦，把锅当镗……”不等他说完，田春义把话岔开了，一面不断地给她使眼色，一面急忙说：“饱着哩。”

春荒是度过来了，新的困难又来了。眼看藕将发芽了，肥料还不知在哪里。藕是集古村社员的一宝，自从土地回老家后，大伙琢磨，千方百计要把它发展起来。可藕这东西也怪，离开油渣不好好长。过去，财东家有钱买油渣，咱们的油渣从哪里来？富农又讽刺开了：“穷棒子还能种了富地？”

我们开会一研究，大家都说要自力更生，于是，有人提议上车站搞搬运，有人提议进城打胡基，也有的提议发动群众投资，把零用钱集起来，就会积个大疙瘩，解决大问题。

我们按照大伙的意见，一面投资，一面出外劳动挣钱。家

里留下一些犁地喂牛的人，青年小伙子都进城上車站去做工。朱生福和趙聚才趕着大車，給供銷站搞運輸。從北山畔到縣城，往返一次近二百里，路上要歇店。他倆一商量，住店要花錢，住一夜就是幾斤油渣錢，干脆把車卸在露天，大車底下就是“店”！就這樣，他們度過了多少個露天宿營的生活，給社里節約了開支，各項收入一湊合，共有兩千元，連同政府貸款，共買了四萬斤油渣。

地多油渣少，仍不夠用。大家又到處收集雞糞、鴿子糞來頂替。肥料雖少，大家侍弄得可經心。油渣上到地里，王振才老漢去看水，直等到池塘里的污水變清了，他才離開蓮菜地。這一年，集古村的九眼藕又豐收了，一根根壯得就像個胖娃娃，拿起來一稱就是十多斤。

藕豐收了，收入大大增加了，加上玉米、棉花長得好，年終一決算：每個勞動日淨分兩元二角。沒入社的中農也一個個要求入社。鄧金昌雖然原先入了社，但還養了條驢子，準備社“爛了”以後，自己種自己的地，這時，他把驢子處理了，和大伙組成一盤棋。原來想和社里唱對台戲的羅振海，悔恨自己打錯了主意，幫社里寫呀算呀，積極的不得了。

一九五五年春季，合作化的高潮來到集古村，我們決心和鄧家堡、白家窑一起轉為一個高級社了。消息一傳出去，就像當年弄土改一樣，全村熱火的不得了。正在大搞積肥的社員，只三天時間，就削平了一個楞大的豕疙瘩，把肥料厚厚實實地上到地里。

正在這個熱火勁里，有人却說：“日子過得像个樣子了，就

得拿出办大社的样子来，添些高骠子大马，赶几辆胶轮车；饲养室、办公室，也都该盖大房了。”咱一听，话不对劲，区委书记的叮嚀又在耳边响起来：“当日子过到上风头的时候，就必须注意铺张浪费的思想露头。要时刻注意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切莫忘了过去的穷日子。”

究竟怎样来办社呢？我们在社员中开展了大讨论。讨论中，贫下中农给大伙讲开了解放前穷人受凄惶的血泪史，说着说着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流。这样一讲，大手大脚的思想行为很自然地受到了指责。社员们纷纷议论：“穷印印还没划掉，就想扎起富日子的架子，那是想叫社倒塌哩。”“未穷先穷，永远不穷；未富先富，永远不富……”大家认识统一了，表示了发挥穷棒子精神，办起一个名符其实的富社。

勤俭办社的好风气出现了。作办公室的窑洞破破烂烂，会计原来喊叫太窝囊，如今自己动手修理。办公室没有凳子，自己动手砍了柳树枝条，编了六把“圈椅”。窑洞没有门窗，就用柳条编门，麻秆做窗。没有公文柜，便在土墙上打了土洞，架了块木板，大家叫它“保险柜”。

群众一看干部带头勤俭办社，都跟上照样办，事事都在勤和俭上想窍门。牲口要合大槽，但没有饲养室，大伙一讨论：自己动手。没花一文钱，打起了两面土窑洞，问题解决了。在四队盖保管室时，郭清彦老大娘背着一大捆麻秆跑来了，她说：“给我分下这些麻秆。当柴烧了怪可惜，盖到房上吧！还能给社里节省几串箔子哩！”

要说在一九五五年是搭好了底子，一九五六年就算爬上

了梯子。这一年，合作化运动结出了大果子：粮食丰收了，现金收入大大增加了。每个劳动日值达两元伍角多，全年每人生产粮食达到一千一百多斤，比过去哪一年都多。家家户户都有存款，粮食囤装得满满的，集古村的名产莲菜一节比一节长得美，平均亩产达三千多斤。从此集古村一下出了名，附近村子里的群众都叫我们“王牌社”。咱当时一听觉得有点慌，因为河对沿马尖角农业社，还暗暗下了决心，要和我们比个高低哩！可是又一想，有党的领导，只要大伙一条心，不松劲，我们就一定能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胜利前进。

水 的 故 事

楊 永 安

提起水，就想起了天旱。說起天旱，就想起了一連串的斗争……

一

先从解放前的事儿說起。

我們集古村，是个塬高水深的地方。全大队两千零三十亩土地，大部分是塬坡地。只有村前的温泉河湾里，有二百五十七亩肥沃的稻子、蓮菜地。这些好地，在旧社会里，哪有穷人沾的边呀。穷人不用說置不起地，掙断腰干买些地，也都是塬头、坡地、漏风塄。雨水要是順当了，多少还有些收成；碰到天旱，常常連种子也捞不回来。

一九二九年的大旱年饑，天干火燎的，地里寸草不生，可苦坏了穷苦农民。那时候，就是有点水，也輪不上穷人浇地呀！我們村里单安菜种的地边塄下，就是西塄水渠。滿渠的水，一天又一天不停的往东流，財东家的地浇了一遍又一遍，安菜只能眼巴巴地天天守着渠边轉，目送着水流过自己的地头，流向財东家的地里。財东家秋麦两料收了，安菜的地却仍

然是紅光地。日头照样紅，穷人的地照样干；财东家的地已經种上了小麦，安荣还是在地头渠边轉。

貧农田春义，租种了富农郑文成六亩水浇地。記得有一回，春义父子二人堵了埝浇地。“三閻王”来了，沒問三七二十一，就拔了堵渠的板子，說是犯了他們的“渠規”。那个世道能說啥理，地主富农宁讓水白流掉，也不讓穷人浇地。春义父子二人地沒有浇成，还得搬人說情，花了三十多块現洋，請人家进了一回館子，給人家买了些鴉片烟棒子，才算了局。

那时候，地主恶霸整的穷苦人沒有办法呀！說真的，那地主恶霸比旱魔王还恶十分呢！

二

解放了，封建地主斗倒了，渠道上的“霸王”也推翻了，穷苦人民翻了身，掌管了江山。

一九五二年春，党提出了改修渠道，扩大灌溉面积的号召。我們村前的那条温泉河，也开始修渠用来浇地了。当时农民們的干劲也不小。在修总干渠的閘口时，碰到的头一个困难是沒有材料。大家看看龙王庙，都說：咳，这不是好材料嗎！这家伙背个“管水”的名，不理抗旱的事，如今該給咱人民效劳了！

拆了龙王庙，大家又从古坟、烂庙里到处找石碑、石桩、石供桌，共找到一百二十多个。跟着，請来了两个石匠，一块干了六十多天，战胜了困难，修好了閘口。渠道也改修好了。可是，那时候，还是一家一戶过光景，地不能連片，扩大水浇地还

有困难呀！

党号召我們起来搞生产，真是說到我們心尖上了。一九五四年，我們这儿办起了两个初級社，一九五五年冬又合并成一个高級社，当时我被大家选为高級社副主任。組織起来以后，真是人多势众力量大！一九五六年春上，我們一队只花了几天時間，沒費多大劲，就打了一眼透水井。我們一打，其他队也都跟着打起来了。井打成了，一队和二队箍井沒砖，我想，人都入了社，咱还能三心二意嗎？就把我家的麻池拆了箍了这两眼井。这年春上，我們全大队一共打了四个透水井，把靠渠岸近的旱地全变成了水浇地，扩大了水浇地八十二亩多。从此，这些地再不是两年三料，而是一年两料了。看看水浇地能增产，人人心里开了花，一天都为扩大水浇地想办法。

一九五七年的一天，我和生产队几个干部在村东的地里轉，有个干部說：“我想，靠渠岸的地能打透水井，这块地虽然比渠边地高一台，把第一台抽上来的水引到这台檢下，也打个透水井，一节一节往上抽还不是一样嗎？”經他一提，我心里也开了窍，和大家商量以后，又得到了党支部的支持，二台透水井就这样动工打开了。打着打着碰上了“料僵石”。打了一天又一天，社員們个个震得手麻胳膊疼，有点松劲了，这时，党支部書記赵茂林来了，我們一块研究克服打井的困难，鼓足了社員們的干劲，二台井接着打成功了，浇地效果很好。这个好办法，又給全大队闢开了扩大水浇地的路子。这一年的春冬，接力井又打了眼，把水一級引上一級，提升到第三台、四台到五台。一九五八年夏季天旱，正遇大跃进，我們依靠集体力量，

人力、畜力一齐上，一、二台畜力拉水，三、四台人力推水車，手搬轆轤。又組織婦女用桶抬，臉盆舀，一台一台往上倒，一直把水倒到七台、八台。扩大抗旱面积一百八十多亩。这一年，我們全大队粮食、棉花都是大丰收。总产值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多元，超过合作化来的任何一年。就这，社員們还心不滿足地說：“水要是能上了疙瘩庙塬頂，天再旱，咱們不怕了。”

三

按社員們的願望，把水引上疙瘩庙塬上，光靠我們集古村，力量是不够的。由塬底到疙瘩庙塬頂共有二十一台，一九五八年的抗旱斗争，我們也不过上到第八台，还没达到塬高的一半呀！

人民公社办起来了，依靠公社化的威力，解决了困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党支部書記赵茂林对我說：“公社决定在疙瘩庙修一个电力抽水站，国家投資两万五千元，讓你去领导这个工程。这可是一项艰巨任务，是給子孙后代造福的一件大事啊！”我听了这話，又高兴又有些不敢相信。高兴的是真的上了塬，由西往东，多少亩旱地要变为水地呀！电力抽水，我在馬尖角生产队見過，美是真美。細思量起来，他們那里是一两丈高的塬，抽水当然容易些。疙瘩庙就不那么简单了。站在庙下塬根底，仰着脖子往上看，雾騰騰的，直径高六十丈，坡径高五十丈，水能引上这个塬嗎？

建立抽水站的风声，在社員当中你传我我传你，很快传遍全大队。一会，刘紅飞老汉跑來說：“修水站可不能把我忘了

啊。”我想他年紀大了，就對他說：“你算了，就在隊里勞動吧，修水站可苦。”他頭一偏，像質問我說：“它能比舊社會的罪苦嗎？”我還有什麼說的呢？接着社員白金錫又來了，像對我打氣地說：“老楊哥，這可是為子孫栽萬年福根的大事情，無論怎樣也要把水引上塬啊！”白金錫是村里有名的“大力士”，在解放前，年輕輕的就給財東家搬轆轤幾乎要了命。他為了啥？為的自己也能苦掙下一塊水澆地。在舊社會，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如今要建立抽水站，水從村子後邊過，比起他想的一小塊手搬轆轤的水澆地，不知要強多少倍呀！白金錫報名參加修水站剛走，回鄉學生趙淑琴又來了。這姑娘論年紀只有十六、七歲，腦子里可經常盤算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兒，報名參加修建抽水站，她比誰都積極。經過幾天的準備工作，我帶着全大隊自動參加修抽水站的一百二十名社員出發了。到了工地，迤山、下廟兩個大隊來參加修抽水站的一百三十多名社員，按時也開來了。華宋、舊縣兩個大隊編的大車隊，也趕時送來了石頭等物資。當時雖然是數九寒天，疙疙瘩塬上塬下，到處熱氣騰騰。在四、五里長的工地上，我們和迤山、下廟，開展了比速度、比質量的連環賽。趙淑琴領着婦女打夯，号子聲壓倒了其他隊。劉紅飛老漢一會做土活，一會幫別人修理筐子，一天到晚手脚不閑。白金錫干起活來一個頂兩個，挑土用大筐，拉土車子裝得滿。每天收了工，他比誰都走的晚，把社員忘記拿的工具，裝上架子車拉回來，第二天又拉到工地。那時候他像不知道乏，每天比誰都起得早，不等天明他就叫醒了大家。大家給他起了外號叫“工地叫鳴雞”。

赶春节前，整个土方工程都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工地上的另一支修建队伍是来自附近各工厂的工人。这支十七人组成的队伍由老师傅带领着，架线、安装机器，更是忙碌，他们也按时完成了任务。

一切工作都就绪了，几千双眼睛都等着看疙瘩庙塬上的第一次冒水。开始安装的是八十四节磁管子，坡度长，压力大，一上水接口就憋炸了。我们一连接了四、五次，还是不行。以后公社高书记来了，和我们一起反复研究，最后把磁管子改装成胶皮管子，问题解决了。水终于按人的心愿爬上了疙瘩庙高塬，顺着干渠往东流，流向支渠，流向黄土高塬，滋润着地里的禾苗。

水上疙瘩庙高塬真是乐得人人心里开了花，娃娃撵着水头跑，年轻人一蹦三尺高。七十多岁的单四长老汉，一边点头一边说：“共产党可真是新圣人，水上高塬，人定能胜天哩！”

四

一九六三年，收罢麦子种上秋，这是一个近百天的大旱。

有了电，给我们今年的抗旱助了大威。抽水站，黑明马达不停。水，送上了塬，浇了塬上的平地，又由塬上一台一台往下浇，塬下的水往上浇，上下会合，把我们大队能浇到的三百多亩棉花和秋田齐齐浇了三遍水。这还不算，抽水站送上塬的水还浇了四个大队十个生产队的棉秋田七万多亩。

在一个多月的抗旱当中，天旱最严重时期还要算“三伏”天，早上浇水中午干。为了保住粮棉丰收，一连十二个昼夜，

塬頂上、半塬里、塬根底，白天，层层都是抗旱人群；晚上，台台电灯明，到处是人声。战胜天旱，保住丰收，是全体社員的共同意志。吃飯家里送，休息打了盹，也不知社員从哪里来的这么大干劲，电力抽的水把能浇的地都浇完了，他們还不甘心，到处搜寻可浇的地。一队庙后有八亩棉花地不平，不好浇，社員們搬来了轆轤，一連挪了三个地方，浇完八亩棉花不算，又浇了一亩紅苕。二队社員看到以后，也在西沟埝上搭起轆轤，把五亩不好浇的棉花浇了一遍。

托公社的洪福，感謝国家的支援，給我們送来了电，战胜了天旱，夺得了丰收。

娃呀，千萬不敢忘本

郭清儀

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提醒了我，千萬不要忘記對孩子的階級教育，尤其是要讓這些福里生、福里長的娃們，永遠記住老一輩人受的苦難。在這個事情上，咱有教訓，大兒子鹿娃的事情，把我敲醒了。

解放那年，鹿娃還是個不懂事的毛孩子，到去年，他在新社會的福窩里，長到二十四歲了。這十多年，鹿娃真是在蜂蜜罐罐里長大的。前幾年，記得他結上個紅領巾，跳跳蹦蹦的，真逗人愛；加上在舊社會，因為家里窮，前兩個孩子沒錢治病，都沒有留住。到了鹿娃，那真是把他看成了寶貝蛋蛋，捧在手里怕跌了，抱在怀里怕熱着，嬌慣的了不得，凡是給娃能辦到的事情都辦了。不等娃喊冷，棉衣給穿上了；不等娃叫餓，熱飯端來了。一家人吃稀的，給娃一個吃干的；娃在書房念書，我每天叫他大給娃去送飯。聽到旁人夸奖鹿娃，我心里就像用雞翎掃；聽到誰指責鹿娃，我滿肚子不高興。這樣一來，娃順竿竿上來啦，越來越任性了，常為飯遲飯早、衣服好壞跟我耍脾氣。平時不用心念書，這里跑跑，那兒串串，我說他幾句，他就頂嘴。從學校里回到村里後，還是老樣兒。當時，我沒在

乎，覺得娃小哩，不懂事，以后长大了就好了。但是，鹿娃的性子不但沒变好，反倒愈变愈坏了。比如，他在結婚时，嫌洞房是在土窑里，不如新房好；我說：“这窑洞不錯呀，窑面子刷新了还用报纸糊的光光堂堂，炕上糊了紅紅綠綠的炕围子。”娃还是不乐意。別人家安电灯，自己窑里安慢了一点，他就嘴撇脸吊的。这些，当时我都認为是小事情，給他講講，他不听也就算了。

不拘这些小节，就会闖下大乱子。慢慢地，我发现他交往人不注意，常和那些地主、富农鑽在一起，成天說呀笑呀，你我不分。队长朱来金也給我透了风，叫我多管着娃。

有一天，鹿娃深夜才回来，我問他：“你到哪里去了？”

娃說：“和允臣聃了一会閑传。”

我提醒娃：“娃呀，那里少去，他是地主，咱是貧农，他和咱有气哩！”

娃不服气地說：“咋？地主还不和咱一样的，在一畦地里做活，到他家去一去，有啥关系？我又沒跟地主做啥坏事！”

我說：“赶你做下坏事就迟咧！”

娃他大坐在炕沿上，正往烟袋鍋里装烟，听到娃頂撞我，把烟袋一磕，訓他說：“你媽叫你少去，你就少去！咋？还不听话！”

我一看娃他大要发火，忙挡住他，悄悄地說：“不要急，咱的虫虫，咱知道他哪一头螫人。慢慢劝說吧！”

誰料想，从那以后，鹿娃更不像話了，遇到天阴下雨，或者晚上干完活，他总是鑽在“朱家大院”地主朱允臣家里，啦的怪

热火。娃为啥往地主那里跑？地主本事大，他那里准备有烟、有茶、有象棋，扑克牌，还有羊奶。年轻人一进他家门，他那妖精女人就忙给你递烟点火。朱允臣还准备有黄色的书画，专给青年人讲些鬼怪古经，什么“七侠五义”啦，“万花楼”啦，就是他在解放前吃喝嫖赌的丑事，也讲得出来，把娃尽往坏处引，脚跟不稳，就把你迷糊啦！

地主把娃往坏处引，党、团里的干部和我把娃往正路上引。地主讲吃喝玩乐，我们讲勤俭办社；地主讲“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我们就讲走集体富裕的道路；娃到地主家里抽烟喝茶，我就禁他抽烟。可是，娃听咱的话苦，地主的口甜，思想不改变。有一次，他腰上生了一个疮，队里给他派活，他不去；转眼，他跟上朱允臣去浇自留地了。我劝他：“娃，你不敢忘了疮痛。”他不理。队长看见了，批评他几句，他就和队长直顶牛，嘟嘟囔囔说了些不满集体的话。

更严重的是，那些日子总不见他回家，不知干啥去了，急得我满村里寻问。后来才知道，他听了坏分子翟俊民出的主意，挪用队里的公款做本钱，到处跑卖菜。后来胆子大了，竟和富农家的人一起走赤水县贩卖香，贩卖黄花；又到西安八仙庵去贩铁器、器皿。

这一下，我才真着了急。万万没有想到咱亲生亲养的娃做下了不利集体、不利社会主义的事！我后悔的直拍胸脯。光后悔有什么用？得想办法呀！这一回，是我先恼了。我向他提出：他要是还不改邪归正，就分家，各过各的日子，各走各的路！

家虽然沒有分成，母子俩住在一个院里，成天見面，却有一个多月沒招嘴。两个人的心沒弹到一根弦上，路沒有走到一块，我心里像刀絞一样难受。

我管不下娃了，就跑去找党支部書記赵茂林，要他茂林叔管教管教。他茂林叔給娃講了二陣子，可娃把好話当做耳旁风，吹不进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啦，党号召咱們过去受过凄惶的貧农、下中农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記得那天开訴苦大会，咱过去流的眼泪淌的血，一宗宗涌上了心，忍不住，我在众人面前哭訴了一場，心里才覺得暢快了些。

晚上，鹿娃回来了。他耷拉着脑袋，就像受了委屈似的。

我沒有理他。

他走到我身边，叫了一声：“媽！”

这一声，和往常多不一样！几年来，我沒有听过他这样亲热的叫我一声！我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鹿娃哽咽着說：“媽，我真不知道咱家过去受那样的凄惶！”

这一說，我覺得娃的心和咱的心慢慢貼近了，又生气，又难受，我的話也收不住了：“你还嫌結婚时住了土窑，娃呀，咱家从雒川逃难上来，連个破窑还住不上呢！破庙、烂草棚子，地主的馬房就是咱的家。到了集古村以后，挪了七次‘窝’，哪有咱一块瓦片呢？听你爷說，你大就出生在別人家一眼破土窑里，那家主人还嫌辱沒了他的‘門风’，你爷放鞭炮，提酒罇子，出了二斗麦，祭了人家祖先，才算把咱家香烟續下来

了。……到我进了咱家门，炕上连条被子也没有，我和你大就盖着这条破麻袋片子。”

说着，我从柜底下拉出了那条破麻袋片。

鹿娃接到手里，翻过来翻过去的看，叫了声“妈”，说不出话来，眼泪直淌。他转身走出去，把这烂麻袋片拿到自己窑里，当宝贝一样，铺到自己炕上去了。

从那以后，我没有间断过对鹿娃的教育，他问起了，我就讲。我想起了，也讲。我讲了鹿娃小时被伪保长的孩子打得鼻口流血，保长降下罪来，我还得赔罪送礼的事情：

解放前，我家几辈子没个念书的，到鹿娃这辈，我一心想把他造就成人，顶门立户。一家人挨饿受苦，在鹿娃八、九岁上，送他进了学校。有一天，鹿娃被伪保长“黑毒虫”的娃，打得鼻口流血，回到家里。我问他为啥不告诉先生？鹿娃说：“先生说我没理，少家教。”天哪，这是啥世道！我越想越气，就引上鹿娃去“娘娘庙”寻先生。谁知道这一寻不但于事无益，反倒恼怒了伪保长，说我“捣乱学堂”，当天晚上就让人把我叫到他家里，脸吊的比驴脸还长，恶狠狠地骂道：“狗日的，谁叫你一个臭脚女人跑到庙里去捣乱书房？跪下，这次非给你个厉害看不可：罚你两桶油！”我想，反正我没犯法，你把我也不能怎么样。我没言传，扭身走了。第二天我跑回娘家，告诉了我妈。我妈听说和“保长”闹翻了，忙劝我把仅有的二斤线卖了，买些酒菜给“保长”赔礼去。妈说：“娃呀，你太胆大了，跑到老虎嘴里拔牙，你不是寻着吃亏呀？快去给人家赔个不是，不然咱就不得了！”邻居们听到这件事，也都三三两两地来



劝我。没有办法，我只得忍气吞声，咬紧牙关，把准备换米的二斤线卖了，买了些酒肉，到了“黑毒虫”家。伪保长正和地主“三阎王”、狗腿子张培基抽大烟，一見我就罵：“狗日的好大胆，昨晚不言传就走了！和尚跑了，你还把寺跑了？”“三阎王”也开了腔，罵我不該“太岁头上动土”，說我“小腿别不过大腿”，又装好人对伪保长說：“她認錯了，叫她去吧！”伪保长理都不理，躺在床上只顧抽大烟。直到下半夜，他媳妇說了几句，才算放了我。回到家里，我抱住鹿娃大哭一場……

每講起过去的伤心事，我娘俩总要面对面哭一次。这不是講故事，这是給娃上課哩！打这以后，娃慢慢往好变了，主动找党支部書記赵茂林、貧农下中农委员会主任，把自己过去的錯誤作了檢討。他茂林叔和大伙对他的批評，也能听进去了。有一次，我还听他悄悄对媳妇說：“今后过日子要仔細哩！”

最近，鸡叫三遍，娃就開門上工去了，滿巷道里叫人們起来上地，赶天明还要向塬上送三回粪。村里人說：“鹿娃变过来了！”我听了心里高兴，多亏社会主义大教育哩！

說到这里，我心里不免泛上几句话：如今坏人还有，村里像朱允臣那样的地主分子还阴魂不散，想夺印把子哩！咱娃的出身虽好，但苦里生，甜里长，他自己沒受过啥苦楚，很容易被坏人拉过去。回想起来，我过去放松了对鹿娃的教育，这多危险呀！如今，我明白了一条道理：要咱下一代保住貧农的本色，只有讓娃牢牢記住过去受的苦，教育娃永远不要忘本，这才是真正的疼娃哩！

后 記

这本村史是在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根据一些貧、下中农回忆对比的材料編写成的。經過忆苦思甜以后,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許多人感到被剝削阶级的“家譜”需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有的老貧农再三建議:“想个办法把我們这些血泪仇写下来,叫青年人当書念。”于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团支部負責挑选了二十二名知識青年,組成了村史編写組,按五个生产队分片包干,着手編写,先后經過四个多月的時間,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編写村史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說“庄稼汉文化低,写書是‘老鼠啃旗杆’,咋也啃不倒。”“老虎吃天,咋下爪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編写組首先討論了編写村史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把忆苦思甜中的材料編成瓣子,初步确定了写誰、怎样写,要求大家首先做到人事真、情节实、阶级爱憎分明。同时組織大家学习了一些“三史”文章,启发思路,开闊眼界。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做个样板,又組織五个片的負責入,訪問了老貧农田春义,大家記錄,集体討論:定主题、搭架子、确定內容,一人执笔,大家修改。这样,編写村

史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明确了，“神秘观念”也就打消了。

编写队伍组织起来了，但是，光靠少数人关门做文章是写不出好材料的，于是全村又掀起了一个讲村史、写村史、编村史的群众运动。老汉、老婆，大人、小学生几乎全部卷入了这项运动。在调查访问中，许多老贫农勾起往事，伤心落泪；有的拿出了被地主恶霸讹诈的土地契约，有的拿出过去讨饭的用具，有的指着烂衣服说：“这就是我在旧社会的全部家产。”还有的让采访者看他身上被地主、恶霸摧残的伤痕。这样，村史的材料不断丰富，编写组同志的阶级感情不断加深，写作的勇气也不断增加。

由于我们编写组成员大都是年青人，缺乏阶级斗争知识，政治、文化水平不高，更没有编写村史的经验，这本书里的缺点错误可能很多，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这本书在编写工作中，得到中共富平县委、县人委、共青团陕西省委和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的帮助和指导，在这里对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集古村村史编写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